

創造十年

郭沫若 著



VON.

行印局書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7855B

創造十年

郭沫若著



現代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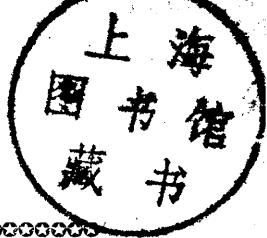
1932

創造十年

發端

創造社自 1929 年二月七日 遭了封鎖以來，已經滿了三年了。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他自成立以來的經過追記出來，我也有那樣的心事，但總牽延着，一直牽延了三年。我現在終於決了心，要費點工夫來記錄出我所知道的創造社，或者更適切地是以創造社為中心的我自己的十年間的生活。牽延了三年，使我終於起了決心的，說也奇怪，却要感謝我們中國的大小說家魯迅先生。

是本年的正月三號，一位日本朋友 K 君到我寓裏來，談到了中國的文藝，談到了魯迅先生。



創造十年。

他問我，“魯迅是怎樣的立場？”

我說，“魯迅是一位用寫實手法的作家，在前頗帶着一種虛無主義的傾向，近年聽說是轉換到左翼來了。”

“是的，”那朋友說，“我們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是稱魯迅為左翼之雄的。”

K的說話顯然是含蓄有一些鋒芒，但我們也沒有作怎樣的深談，因為我對於魯迅先生的舊作既少研究，他的轉換方向以後的新作我也還沒曾看見。

在臨走的時候，那位朋友取出了一本黃油紙封面的雜誌來，遞給我，我看時有似篆非篆的“古東多卅”的四個紅字。旁邊還有一行鉛印的標識：

“佐藤春夫編輯 古東多万 第二號

昭和六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這“昭和六年”是民國二十年，西歷1931年，

更簡切的說一句，便是去年。照那標識看來，自然是雜誌了。

K把目錄揭開，指示着“上海文藝之一瞥”下署着魯迅的給我看，他說，“這篇文章很有趣，請你留着讀一讀。”

我多謝了他，問他，“古東多万是甚麼意思？”他說，“這書的表紙背面便有解釋。”

翻開表紙背面來看，是從日本的一部字典“言泉”上引用來的一段解說，原來“古東多万”的發音是 kotodama，寫成漢字是“言靈”；照那解說直譯出來是：

“我國之言語之自由地變化，具有一種靈妙的作用之謂。國語之妙用。”

再翻到書後的“編輯餘談”來看了一下，才知道這“古東多万”用的是“萬葉假名”——日本的一部古歌集用漢字寫的日本字母——竟連日本人都



不懂，屢屢質問，問得編輯先生“不耐煩而且冒火”，所以在表紙背面才引用了那一段字典。

我看了着實暗地感嘆了一下，我對K說，“要懂一種外國文字，像在這些地方真很困難呢。老實說，我起初看見封面時，我以為你是送了我一本骨董店的廣告。”

“哈哈，我初看見的時候我是把它當成了法西斯諦的機關報的。”

“怎的呢？”

“有個卍字啦，德國的法西斯諦希屈拉派打的是這個商標。”

彼此笑了一會，K才告辭着走了，我便把我們魯迅先生的文章繙了出來，原來是魯迅的講述，由一位日本人所譯記的。據那譯記者“九月十七號在上海”寫的短序上說：

““上海文藝之一瞥”是最近在當地某處，



魯迅祕密的講演，那講演的大要在當地的週刊“文藝新聞”上連載了。然而“文藝新聞”在其立場上，顧慮到官邊，不能不多少加了一些刪削。但是魯迅又根據那連載於新聞的筆記，更把敘述弄得懇切周到，更適切地把辛辣的罵倒直言出來，改寫了這篇“上海文藝之一瞥”。本稿即由改寫了的原稿向僕講說了的譯錄。”

我看到有“祕密”，有“顧慮到官邊”的字樣，已經就虔敬了起來，我預想到我們的戰士一定是展開了一篇左翼的理論，對於上海的御用文學民族主義派一定加了“辛辣的罵倒”。我如飢似渴地把那二十幾頁的長文，一口氣讀下去，看他的確是罵了好些人，罵了鴛鴦蝴蝶派，罵了創造社，甚且對於左翼運動也沒有忘記他的“辛辣的”清算，一直讀到尾上才看見了這樣的幾句：



“以上所說之外還有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許久以前便盛行着的武俠小說之類，應該詳細解剖，可奈已經沒有時間，等到將來有機會時再講。”

就好像讀舊式的章回小說，讀到起勁處，却被“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講”的一段手法欺騙了的一樣，我的一口氣軟了下來。我鼓着勁要跳過一條三尺寬的溝，鼓得一臉通紅，仍然跳不過去，立在溝的邊上。像這樣的講演我不知道有什麼“祕密”的必要，更不知道有什麼地方要“顧慮到官邊”。在“文藝新聞”上所發表過的內容，我不曾看見。我們魯迅先生所“改寫”成的中文原稿，似乎也還沒有發表出來。我現在暫以一個准魯迅崇拜者的資格，把日譯文中罵到創造社的地方要忠實地——我特別在這“忠實地”下加着注意點——重譯成中文。前後的文脈自然要稍稍顧慮着，但我不好



便把全部都整譯出來：因為我們魯迅先生的改寫稿一定有發表的機會，即使沒有，將來也一定有魯迅先生的忠實的——又來加上注意點——崇拜者來重譯全文，我是不好把這一筆稿費替人奪掉的。

講演的開頭是說到上海過去的文藝，舊式的才子佳人派；其次是說到新式的才子佳人鴛鴦蝴蝶派。這鴛鴦蝴蝶派“因新青年的流行才漸受打擊”。“那時有易卜生的脚本之介紹，有胡適之先生的“終身大事”那樣取着俊俏的形式之婚姻問題劇出現。”以下便論到創造社來了。

“此後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出現。創造社尊重天才，是藝術至上派，專重自我，崇創作，恨翻譯，尤憎恨重譯，與同時在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其出陣最初之廣告上，言有壟斷文壇者，即指文學研究會也。”

在創造社的頭上加上了一頂瓜皮小帽，輕輕

創造十年。



地便把創造社的一羣窮小子化成了鴛鴦蝴蝶。我們魯迅先生的確不媿是紹興人，他的一枝筆實在有點刀的風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於“藝術至上派”，魯迅先生似乎很是學貫中西，大約王爾德，波陀勒爾一類的人物，又是歐洲的鴛鴦蝴蝶派罷？是的，“創造社尊重天才，尊重自我，崇創作”，這倒不是什麼罪過。無論在怎樣的社會裏，天才是不能否認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釋罷了。馬克思昂格爾斯列甯不是絕大的天才嗎？就是我們魯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學上的天才嗎？特別在“辛辣的罵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在“重自我，崇創作”的一點上，創造社的那些窮小子似乎都還沒有我們的大天才魯迅先生的那麼“專”，不信你請去嘗試一下罷，只要你有胆量敢把“先生”兩個字誤排成“老生”，或者對於“吶喊”沒有搖旗吶喊一下，你看他先生會是怎樣地慷慨，他至少是會恭維你是“才



子”的。“恨翻譯”？“尤憎恨重譯”？我自己似乎也是創造社裏面的一個人，我自己便“翻譯”過不少的東西，並也“重譯”過不少的東西啦！是的，那些東西怕沒有值得我們魯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不過不負責任的翻譯和重譯，似乎是在可“恨”可“憎恨”之例，創造社也幹過些指摘的事情，魯迅先生大約就是根據的這些罷？這好像是在說“你恨酸敗了的麵包的人，便是恨麵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阿Q式的羅輯”。至於廣告的一件，那是要請達夫先生負責的，說詳本文。

“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反對，主張爲人生之藝術，一面創作，一面重視重翻譯，並注意介紹了被壓迫民族的文學，因爲彼等小國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文字，所以差不多全部都不不得靠着重譯。而且文學研究會聲援了新青年，遂爲新敵與舊敵所夾，受了三方面的攻



擊。一方面是創造社，他們既尊重天才的藝術，以主張人生流之藝術的文學研究會為沒頭於閑事，為“俗”（此字原譯文有引用符，不知魯迅先生引用的是那一位創造社員的話），且為無能，所以一發見了一個誤譯，有時便要大賣氣力地寫一篇很長很長的專論。”

第二方面說的是吳宓所代表的論衡一派，第三方面是所謂鴛鴦蝴蝶派，在這兒魯迅先生又不費力地（？）把創造社來和論衡派鴛鴦蝴蝶派歸為了一類，而使文學研究會承繼着新青年和“終身大事”的正統。似乎創造社之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新敵”，是因為該研究會，聲援了新青年。是的，魯迅先生到底不媿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員之一人，在這些地方却很能替本店發賣膏藥。“貨真價實，只此一家，”——只有文學研究會是文學的正統，是最革命的團體。我們在這兒來高呼幾聲口號：



革命的文學研究會萬歲！

擁護文學的正統！

打倒一切反動的文學團體！

擁護我們的文壇總司令魯迅先生！

反對文學研究會的就是反革命！

反對魯迅先生的就是反革命！

是的，還有一個“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也是該得高呼幾聲萬歲的。我們貴大民國的貴大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壓迫民族”了。我們貴被壓迫民族的貴民族主義的文學呢？？？在這兒我很抱歉，可惜我們魯迅先生沾染了點子章回體的小說派頭，要等到“下回分講”；於是乎讓我們的“萬歲”也就不好明目張胆地叫出來，我們須得學學我們的先生“顧慮到官遷”啦。打個折扣，叫他媽個半聲



罷。好的，我們再來呼叫起來：

“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文學卍！”

在這兒要加一個注解，這個屁股上的卍字，就和“古東多卍”的屁股上的那個字一樣，是當作“萬”字在使用。“萬歲”的一半自然就是卍，但有聰明的讀者定要把它連想到法西斯諦，那也是他的自由。

是的，創造社那一批“反動派”——這個罪狀不自今日起，據魯迅先生的“一瞥”看來，從與文學研究會反對以來便已經是反動了的——是的，創造社那一批“反動派”真真是罪該萬死!!!公公然敢反對“聲援新青年”“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文學研究會，要指摘他們的誤譯，真真是罪該萬萬死!!!哼，你們不知道像“雅典主義”和“手式戲”一類的翻譯，不正是中華民國的國寶嗎？你們不知道



那些名譯，縱不“百世”，也會“萬年”的嗎？我“魯迅先生”正告你們：文學研究會者人生之人生也，藝術之藝術也，如此之如此也，這般之這般也；“俗”云何有？豈是“無能”？“無能”者天下之大能也，“俗”者不俗也。“錯誤”之僅僅“一偶”便足使汝輩之“專論”做出“一篇”，誰能誰不能哉？——好了，我摹倣我們先生的筆調似乎有點不類，然而不類者類也。好像通，又好像不通，然而不通正是大通。此亦一“阿Q式的羅輯”。

“創造社的這番起事，在表面上看來是勝利了。數多的作品既投合於當時的自稱才子輩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幫助，勢子遂盛。勢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務印書館，也就把創造社的譯著來出版了——這是說的郭沫若張資平兩先生之原稿也。自此以來，據我所記得的，創造社便再沒把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



之誤譯來審查，來寫專論了。在這樣的地方，
不好說得，豈不就是才子加珂羅茨基式乎？”

（日本文的珂羅茨基Gorotuki譯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費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輩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們魯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樣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靈的推想和記憶，便把一羣人的罪狀在“一瞥”之中宣佈了出來，這是何等折獄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這兒也隱隱洩漏了一點天機，他在上面罵創造社攻擊文學研究會的誤譯，在這兒把文學研究會的五個字寫成了商務印書館。哦，原來文學研究會就是等於商務印書館！文學研究會的一些“君子大人”（這是魯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為是和“才子痞棍”相對），特別是屬於文學研究會的我們的魯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沒有受過“大書



店”的買賄的！（至於說到我和商務印書館發生買賣關係的詳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與創造社無涉，我要在本書中提供些事實出來，在這兒暫不贅述。）

“却說，因為新上海到底不是舊上海之敵，創造社員在凱歌聲裏終自覺得自己替自己的出版書店寫商品，雖是種種的努力，然從老板一方面看來，就和眼鏡鋪的 Show-window（門面玻璃窗）中裝飾着的紙紮人物之活活活活的眼睛一樣，不外是以廣招徠的廣告而已。”

這一段把創造社員敍得又如此有自覺：因為就到現在也還有很不少的人在替書店老板寫商品，在 Show-window 中做着廣告人物，而自己却在揚揚得意的！

“於是乎才希圖獨立出版，書店老板便把



他們向裁判所告發了。”

這一句話却要算是天外的奇文！這兒所說的“書店老板”自然就是泰東書局的趙南公。幸好趙南公還沒有死，創造社的幾個人也都還活着的，創造社設出版部時，原來趙南公是提起過訴訟的嗎？老實說，我對於我們魯迅先生這位大“大人君子”的腦筋不免有點懷疑。魯迅先生或者不會是有意的捏誣，因為受書店老板告發，倒不是什麼大不名譽的事；我想怕是腦筋中的記憶有點混線，在這兒把新青年社和創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羣益書局獨立時，書局的老板提起過訴訟，這是人衆皆知的事體。

“後來終竟獨立了，一切的書籍大加改訂，改印刷，新開起店子來，然而舊老板方面也永遠地用着舊板，一味的印刷，販買，年年鬧着甚麼‘紀念大廉賣’。”



這幾行倒很近於事實，甚麼“紀念大廉賣”——這是九州萬國凡百商行所慣用的騙錢調門，自然不限於上海，不限於上海的書業，不限於秦東；然而這種極普遍極陳套的現象，落到我們大小說家魯迅先生的手裏是怎樣地“着手成春”了！因為這個現象一局限到這兒來，便是說：創造社的作品狗錢不值！

“在作為商品上雖是怎麼也忍耐不過，然而獨立了也沒有如意地賺出錢來，創造社的人們之走頭自然是朝比較有希望的，革命的策源地，廣東跑去了。於是乎便有‘革命文學’這個東西出現。然而怎樣的作品也沒有。在上海呢，連那樣‘革命文學’的名字都還沒有出來。”

這段的首兩句，我是很忠實地翻譯出的，然而意思是摸不準確，不知道魯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樣。不過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創造社的幾



個“流氓痞棍”想賺錢沒賺成，又才跑去革命。所謂“革命文學”也就是那幾個“流氓”所想出的騙錢的幌子。我們這位“左翼之雄”的魯迅先生的唯物的解釋真可要算是超馬克思主義的。但可惜那幾個“流氓”所鬧出的事實和先生的推論全不相符。創造社出版部的獨立是在1926年的四月一日，流氓的一員成仿吾是在1925年的六月到的廣東，當的是廣州大學的理科教授。還有幾位流氓便是郭沫若郁達夫，和一位新入流後又折了伙的王獨清，是以1926年三月十八日從上海出發往廣東的。這“三一八”是一個紀念日，在這兒自然是用不着我來做“宣傳大綱”的，幾個流氓剛好在這個紀念日上動身，所以這個日期也就留在了我的腦裏。我記得那天在下雨，在黃浦灘碼頭上送我們上船的有一位樓建南。走的不只我一個人，又還有送行的人做見證，可恨這個日期不好自由創作。



就這樣我們在這兒還是應該痛罵那幾位創造社的痞棍，他們爲甚麼那樣早的便跑向廣東去了，沒有停一下造些事實出來和我們魯迅先生的“一瞥”相符，使得我們的“大人君子”又來形同捏誣的自由創作了一下。

“到了前年(譯文中說的是“一昨年”大約是指1927年)，‘革命文學’這個名詞才旺盛了起來，主張它的人是由‘革命的策源地’回來了幾個人的創造社的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學之旺盛了起來，不消說是有它社會的背景，是因爲一般的民衆和青年們中有了那樣的要求。從廣東開始北伐的時候，一般積極的青年都奔走於實際運動在那時還沒有甚麼顯著的革命文學，然而到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地鮮明了起來。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大地屠殺共產黨



和革命羣衆，活剩下的青年們又入了被壓迫的境遇。在這兒，革命文學才在上海成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之旺盛了起來，從表面上看來是和別國不同，不是由於革命之高揚而盛，而是由於革命之挫折。（這兒的革命兩個字有點混線）其中雖也有幾位舊文人投了指揮刀又來幹筆墨的舊業，有若干的青年由實際活動趕了出來，不得不借此以謀生路，然而實際上具有社會的基礎，新分子中極堅實而正確的人多所存在。然而這時候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看來，是還沒有經過十分適切的計劃，錯了的地方怎麼也很多。（沫若案：最大的錯處就是罵了魯迅先生）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的社會並沒有加以細密的分析，在蘇維埃政權下才能夠運用的方法，便想機械地拿來運用。（這大約是責備



那時的運動過激了的意思，在這兒正表示着魯迅的認識之極不正確。蘇維埃政權成立後的文藝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文藝是只有純粹的戰鬥。)第二，他們，特別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東西，以一種極左的兇惡的面貌，簡直好像是只要革命一到來，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鑿殺乾淨，使人對於革命只是懷着恐怖。(這一節不知道是根據成仿吾的那一篇文章，恕區區淺學，指不出出處來。)其實革命決不是殺人的東西（阿彌陀佛），而是活人的東西（再來一個阿彌陀佛）。像這種教人以‘革命之可恐怖’（這句話原有引用符，未詳出處）而自行痛快的態度，這也不好怎麼說得，只好說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毒。”

這一段文章說得倒還風涼，不過先生的苦心



我們是不好看過的。便是1927年連到1928年的革命文學運動，有好些新分子是很堅實而正確，只是創造社的幾位舊人都是投機的家伙，而且帶着“極左的兇惡的面貌”，反使革命生了障礙。就這樣，我們魯迅先生自始至終是要把創造社的幾位流氓打進阿鼻地獄裏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們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後他們還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學革命運動中沒有他們的份子。在以後的革命文學運動中也沒有他們的份子。我們的魯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領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過，那是在這樣說的：“中國的新文學中無論革命的與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魯迅一個人的！”

是的，我們的魯迅先生的確是天上地下最偉大的一個創作家，他的小說是創作，他的批評是創作，他的講演也是創作，他在“一瞥”之間便替創



造社創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歷史。(須要注意：“才子”者輕薄之謂也。)

魯迅的一瞥是很長的一瞥，他以下還把近年來的左翼文學運動“瞥”了一下，在這次的運動上最可慶幸的是我們的魯迅先生在榜上有名，所以他也說得像煞有介事。不過他敘述創造社的地方就停止在這兒，以下的我不便再多事徵引了。創造社遭了封鎖的一節，魯迅先生是絕口沒提的，當然這在“大人君子”看來是那痞棍集社的惡貫滿盈了。日本有一位“左翼作家”和暴力團的團長一樣的前田河廣一郎從前到過一次上海，因為創造社的人沒有歡迎他；待他回國之後聽說創造社遭了封鎖，他便大大地稱快，在他的機關報“文藝戰線”上做了一篇痛罵創造社的文章，說是中國的Ultra派（即魯迅先生所說的極左派）被中國社會清算了。我看這位日本的“左翼之雄”實在趕不上我們



中國的“左翼之雄”，因為像那樣鼓睛爆眼地表示出自己的立場來，何如閉着眼睛連不加以“一瞥”的高妙呢。

總之我是應該感謝魯迅先生的，我讀了他那篇一瞥，才決心要來做這部“十年”。但我在這兒還要附帶着聲明一筆。我這“十年”並不是小說——記得國內另一位大小說家宣言過我是沒有做小說家的資格的：因為我的筆太直，不曲，沒有像魯迅先生的那樣曲。是的，這層我自己是很承認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說，那我實在是不配做小說家。據說小說是“寒帶”，那嗎只適宜於 Eskimo 那樣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謝不敏。

還有，我這“十年”也不好就說是歷史，因為自來的歷史其實就只是小說，是由階級的立場或個人的私怨所寫出的小說。像魯迅先生的那篇一瞥，



那才是真正的歷史，是上海最近二三十年的文藝史——至少可說，是史料，後代的文藝史家一定要在那兒取材的。所以我這部“十年”也不敢僭分地說它是歷史。

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呢？——說本色些，就說它是一個珂羅茨基的自敘傳之一部分罷。

1

1918年的夏天，我由日本的第六高等學校畢了業，昇進了九州帝國大學，由岡山轉到了福岡。

福岡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島的中心都市，在島的北端，沿着博多灣的海岸。市街是由兩個舊市併合而成，西段是福岡，東段是博多。大學的醫學部在博多市外，背面是臨着博多海灣的。這博多灣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地點，它是六百五十年前元世祖的大將范文虎征伐日本時，遇着大風全軍覆沒了的地方。（日本史家稱爲“弘安之役”，當西歷



1281年。)當時的遺跡在那沿海一帶很是不少，有所謂“元寇防壘”，“元寇斷首台”，“元寇紀念館”。紀念館中蒐存着元軍所遺留下的兵器及服用器具之類。

市面盡頭處有一帶大松林，沿着海灣就和圍牆一樣，怕在五六里以上。日本人稱爲“千代松原”，在古書上又稱爲“十里松原”；這“十里”怕是中國人替它取的名字，因爲日本的里數一里是要當中國七里的。松原中離大學後門不遠處有一座大神社，叫箱崎神社，供的是日本人的守護神八幡大明神。那種神社在日本國內隨處都有，從前侵略中國海邊的倭寇，中國的古書上記載着他們在船上打着“八幡大明神”的旗幟。今年的上海事件，把閘北化成了一片焦土的日本兵也打着“八旗大明神”的旗子，日本的報上還拍了一些照片下來，這是他們自己意識着就是倭寇，同時也就可以見得



日本人信仰八幡神的程度了。

日本的神社是有等級的，就像官有官階，學有學級。那箱崎神社是所謂“官幣大社”，用學制來譬比，就是所謂“國立大學”。神社面着海，但由社門走向海岸，相隔還有五六百步路的光景，一直成爲一條甬道，兩邊是松林，道旁夾立着無數對的石燈。

我到了福岡之後是住在離大學後門不遠的一家性質與“當舖”相當，但規模較小的“質屋”裏面。時候是八月下旬，學校還沒有開課。有一天中午時分，我很早地吃了午飯，爲逃避午後所易起的慵倦和睡意，我跑出寓所去，想在松林裏面去散步。正走到箱崎神社前的通道上，我無心之間遇着由海岸上走來的張資平。

“哦，你怎的到這裏來了？”

“哦，你也怎的到這兒來了？”



差不多是同時叫出的兩人的聲音。

張資平本是一高預科時的同學。那時候的日本的高等學校是分成三部的，第一部是文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醫科。一高裏面爲中國留學生特設的預科也就準依着分爲三部，但是學醫的人少，又加以和文科的性質相近，一三兩部是合班教授。如像物理化學博物一類的工課，因爲講堂大，便是一，二，三，三部合班教授的。資平學的是理科，我學的是醫科，因爲不同班的關係，彼此雖沒有甚麼往來，但也同了一年的學，差不多天天都在見面的，一年的預科畢業了之後，他分派到熊本的五高，我分派到岡山的六高，彼此便足足分別了三年了。

“我是來進這兒的醫科的，你是進這兒的工科嗎？”

“那裏！我們還沒有畢業呢。”老張的梅縣的廣



東官話說得分外激越。

“怎的還沒畢業呢？”

“我們五高的校長很頑固，他說我們是因爲排日回國的，他不准我們補攷。我們說別的高等學校都補了攷，爲甚麼我們又不可以補攷呢？他說：‘你們又要愛國，又要誰憑照啦，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他這麼說我才記起了他是被派到熊本的，熊本也是九州島上的一個都市，離福岡只有半天功夫的火車路程。他因爲學校還沒有開課，便一個人到福岡來洗海水澡來了。

原來在那1918年的五月，日本留學界爲反對“中日軍事協約”的事體，曾經起過一次很劇烈的全體罷學的風潮。在那次風潮上還有一個副產的運動，便是有一部分極熱心愛國的人組織了一個誅漢姦會，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認爲漢姦，



先給他們一個警告，要叫他們立地離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對待。這個運動在當時是異常猛烈的，住在東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此而離了婚的也很不少。不幸我那時候和安那已經同居了一年有半，我們的第一個兒子和孫產後已經五個月了。更不幸我生來本沒有做英雄的資格，沒有吳起那樣殺妻求將的本領，我不消說也就被歸在“漢姦”之例了。但好在我是住在鄉間，“武力”的滋味我倒還沒有領略過。

全體罷學的抗爭支持了有兩個禮拜的光景，所反對的協約沒有因而取消；更連發表也沒有發表，於是乎便又生出了全體回國的決議。這一決議下來，凡是有錢在手裏的人回了國的也就不少，不幸像我這樣的“漢姦”每月所領的三十二圓的官費是要養三個人口的，平時所過的早就是捉襟見肘的生活，更那有甚麼餘錢來做歸國的路費呢？沒有



錢便失掉了“愛國”的資格，“漢姦”的徽號頂在頭上，就好像鐵鑄成的秦檜一樣。我這人的淚腺似乎很發達，自來是多眼淚的人，當年我受着這樣的懊惱，我自己在無人的地方真不知道流過了多少的眼淚。但說到回國上來我自己也是很有經驗的人。我初來日本的第二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條逼着要中國承認的時候，我在那五月七日的一天和着幾位同學也曾回過上海一次，那時候我也是熱心愛過國來的人，我在回國的時候還做過這樣的一首律詩：

“哀的美頓書巴西，衝冠有怒與天齊。

問誰牧馬侵長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夢，當頭一棒破癡迷。

男兒投筆尋常事，歸作沙場一片泥。”

在那時慨當以慷地回了國的男兒在上海的客棧裏滯了三天，連客棧附近的街道都還沒辨清楚，



又只得怏怏地跑回日本。誰個料到隔不一兩年我又變成了“漢姦”呢？

“回國後到底得到了甚麼結果沒有呢？”

“那有甚麼結果呢？跑北京的代表們聽說是段祺瑞親自接見過他們一次，嘉獎了他們要他們回到日本安心求學，說政府是決不做有損國體的事體的。這一部分的代表有的早回來了，有的留在北京在運動做官，又有一部分南下到了上海，和派到上海的代表們合在一道，現在在辦着救國日報，空空洞洞地只是一些感情文章。我看他們通是一些政客啦！”

“真正愛國的人怕也很不少的罷？”

“受犧牲的是很不少，特別是一些年紀較小的朋友，他們很熱心，四處去賣報，去宣傳。但那樣的生活能夠支持好久呢？能有多大的影響呢？要救國總怕還是要有實際的學問才行罷。”



老張很雄辯，大約也是因為落了一年第，所以特別地憤懣。我自己是有過一番經驗的人，自己的愛國心覺得也並不比誰惡劣，“假使中國的政府真正能夠同那一國開戰，跑回去當兵倒還有些意思。不然只是空跑啦。”我對他這樣說。

兩人在那通道旁邊的一座石燈下談了好一會，老張問我吃了午飯沒有，他說他要回寓去用飯。我也就跟着他到了他的寓所，原來就在鄰近的村落裏的一家新修的下宿屋裏面。他是住在樓上的。進了他的住房，六鋪的草席上連矮桌也沒有，只是有一個藤手篋，在手篋旁邊散着幾冊書本。我順手拿了一冊來看時，是當時以淫書馳名的“留東外史”。

“你怎麼在看這樣的書呢？”

“怎麼，不好嗎？我覺得那寫實手腕很不壞啦。”



我沒有再說甚麼，看了一下書的內容是舊式的章回體；我又把書給他放還原處去了。

等資平吃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又走到海邊上去。

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面，社前的通道通向海濱的地方，展開了一片銀白的沙原。臨海處西側有水族館和築港事務所，東側有一座城堡般的西式建築的大旅館名叫抱洋閣。自歐戰開始以來，西歐的資本家因受戰事的影響一時遭了挫折，日本的資本主義便乘着這個機會勃發了起來。那時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財政上採取積極政策的政友會的原敬內閣，對於產業熱也特別加以煽動，於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種各樣的小規模的工場，它們的最大的消場不消說就是我們偉大的貴中華民國。中國便替日本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Narikin)——暴發戶來。那些暴發戶一有了錢，



痛頭的便是怎樣來把錢消費的方策。依着經濟上的鐵則，他們自然要向着規模較大的再生產的方面去灌注，同時是向着享樂一方面的揮霍。物價便如受着魔術的呼遣一樣，暴漲了起來。所以在這日本的“成金風”吹煽着的時候，日本的企業家自然是遇着了名實相符的黃金時代，一切的無產階級和中小商人倒也還沒有夢想到失業和破產的危險。在這時候最受着打擊的是沒有營業本領的中產人家和沒有筋力出賣的智識階級，日本的官公吏和教職員等增加了薪水的是在這個時候，中國的官費留學生，高等學校級的每月由 32 圓增加成 43 圓，大學級的由 48 圓增加成 72 圓的，也正在這個時候。抱洋閣和築港事務所對峙着的箱崎海岸，就是那時候的“成金風”的標識了。

博多灣中那時正有築港工事在進行着，是商辦的有限公司所經營，打算把博多灣浚深起來成



爲海港，好推進福岡附近的石炭產業，以奪掉長崎港的位置。博多灣的外貌很是像一個湖水的，在東北角上有一個細長的土股名叫海中道一直伸向海中，就像縮小了的意大利半島一樣，把外海的玄界灘和內部的博多灣隔斷了。博多灣真是風平浪靜的，比太湖的湖水還要平坦。

“令人有點不相信啦，元軍的幾百艘戰艦，說是在一夜之間通通沈沒在這裏了。”

“那時是遇着二百十日的大風啦，遇着大風的時候，浪子是異常猛烈的，這個時期不久要到了，你是可以經驗的啦。‘二百十日’你曉得麼？是從春分起算的第二百零十天，正是夏秋之交，北半球的空氣寒冷了起來，和南太平洋上在夏天晒得灼熱的空氣生出猛烈的對流，便起那股大風。”

資平到底不媿是學理科而且打算學地質學的人，他這樣啓蒙地對我說。



抱洋閣前面停着好幾部汽車，有好些一看，便可以知其爲“成金”的人，帶着“藝伎”在那兒進出。有時也挾着些帶四角帽的大學生在裏面。聽說那裏面有海水浴池可以男女共浴，又還有好些娛樂的設備，如像台球之類，時而從樓上的窗口中於男女的笑聲之外也雜着些撞球的聲音。

兩人在濱海的一座石造的燈台旁邊把衣服脫了，便向海裏走去，海水是滿潮的時候，但是那博多灣真是“遠淺”，在水中走了很遠很遠，依然還是可以踏着海底的。那隻淺海機在將近灣心的地方刮拉刮拉地在運轉機械。運轉機械的發動力似乎用的是煤油，待我們在海裏鳧了一會之後，想是風頭轉換了，本來是很清潔的海水，一海面都浮起了煤油，在陽光中反映着種種的虹彩，更還挾着一些煤烟。糟糕！糟糕！兩人怱怱忙忙地又趕快朝岸上逃跑，望着抱洋閣的臨海的大樓，一些尋着快樂的



男女，坐在樓頭暢飲着皮酒。

上了岸，把衣服穿好了，向着右手的松原角上停放着的兩尊大砲的地方走去。砲是日俄戰爭時的捕獲品，是塗着紅油漆的。這種廢物的捕獲品，日本國內的無論神祠佛寺學校官衙，大抵都是有陳列的，一方面以誇耀他們的戰功，同時並喚起國民的軍國主義的觀感。

在兩尊大砲附近的松樹腳根上坐着，納了一會涼，又談了一些東西南北的事體。但在這時有一番話使我永遠留在記憶裏的是，資平談到了國內的文化狀態來。

我是三年沒有回國的人。又住在鄉下，國內的新聞雜誌少有機會看見，而且也可以說是不屑於看的。我那時候最感不平的是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東方雜誌和小說月報，那是中國有數的兩大雜誌，但那裏面所收的文章，不是政談，便是連篇累



牘的翻譯。而且是不值一讀的翻譯，小說也是一樣，就偶爾有些創作，也不外是舊式的所謂才子佳人派的章回體。報章的亂七八糟，就是現今也還是沒有脫出舊態，那是可以不用說的了。隔了三年的國內的文化情形，聽資平談起來也還是不斷的嘆氣。

“中國真沒有一部可讀的雜誌。”

“新青年怎樣呢？”

“還差強人意，但都是一些啓蒙的普通的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點和字數比較起來還要多。”

“丙辰學社(注)出的學藝雜誌名譽還好嗎？”

(注)中華學藝社的舊名，是丙辰年(1916)一部分留學日本的學生所發起的。陳啓修鄭貞文周昌壽許崇清等爲其初期的主要分子。



“那和新青年比較起來又太專門太複雜了。陳啓修的政治論文被蔡元培看中了，聘去做了北大的教授，他便不再做文章了。許崇清的哲學論文，和蔡元培大打其官司，老陳從北京寫信到上海，叫社裏的人不要再做反對蔡老頭子的文章，大家都很不滿意他。我看中國現在所缺乏的是一種淺近的科學雜誌和純粹的文學雜誌啦。中國人的雜誌是不分質，烏涅白糟地甚麼都渣在一起，要想找日本所有的純粹的科學雜誌和純粹的文藝雜誌是找不出的。”

“社會上已經有了那樣的要求嗎？”

“光景是有的。像我們住在國外的人是不滿意的一樣，住在國內的學生也很不滿意。你看新青年那樣淺薄的雜誌，不已經是很受歡迎的嗎？”

“其實我早就在這樣想，我們找幾個人來出一種純粹的文學雜誌，採取同人雜誌的形式，專門收



集文學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話。科學雜誌我是主張愈專門愈好的，科學雜誌應該專門發表新的研究論文，像淺近的科學，我想各級學校有各級的教科書和參攷書，不已經夠了嗎？似乎是用不着辦雜誌的。像“學藝”裏面所收的科學論文專門翻譯講義的鈔本，我最不贊成。”

“出文學雜誌很好，但你那裏去找同人呢？”

“據我所曉得的我們預科同班的有一位郁達夫……”

“哦，不錯，不錯，老郁是會做詩的，聽說他常常做舊詩到神州日報上去發表；聽說他也在做小說呢。”

“對的，我想他是可以來一個。我還曉得一位我們在岡山同過學的成仿吾，他去年進了東大的造兵科，恐怕他今年也回了國，他也是很有文學趣味的，他的英文很好。他似乎也可以來一個。你可



還認得些甚麼文學上的朋友嗎？”

“我可沒有的。比我們早的同學如像文範村吳君毅都在“學藝”發表小說的翻譯，但他們恐怕不肯和我們一道。比我們後的同學我可知道了，到熊本的人是一個也沒有的。”

“在大高同學（注）的系統以外怕還有些人材罷？”

“有或許有，但我們可不知道。”

數來數去可以作為文學上的同人的還是只有四個人，便是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和郭沫若。

“我想就只有四個人，同人雜誌也是可出的。我們每個人從每月的官費裏面抽出四五塊錢來，不是便可以做印費嗎？”

（注）指日本帝國大及高等學校之出身者而言，該出身者們自稱為“大高同學”，有大高同學俱樂部。



資平很贊成我這個辦法，他約定就以我那兒爲中心，待學校開課了以後，訪確了仿吾和達夫的消息再策進止。

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談話，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實際上我和資平發生交誼的是從那兒起頭，我知道他有文學上的趣味的也是從那兒起頭。所以我一想到創造社來，在我自己的一方面，我總覺得應該以這一番談話爲它的受胎期；我這部“創造十年”要從這兒敍起的，也就是這個原故。

在海岸上談遊了一會，日脚漸漸偏西了，我約資平到我寓所去吃晚飯，他也就樂於同行。從那大砲的處所穿進松林裏走向我寓居着的“質屋”，是只消要兩分鐘光景的。

“我們在研究自然科學”，我一面走着，一面這樣說，“只是在教我們觀察外界的自然；我只想由



我們的內部發生些甚麼出來，創作些甚麼出來。”

“要創作，不也還是先要觀察嗎？”

資平這樣地回答了我，我當時覺得他似乎沒有懂得我的話，但到現在想來，這兩句話正是兩人當時的態度不同的地方。資平是傾向自然主義的，所以他說要創作先要觀察，我是傾向浪漫主義的，所以要全憑直覺來自行創作。我現在覺得他的話是比我更有道理了。無論是怎樣深淵的精神活動，沒有外界的素材是不行的。

進了我的寓所，我替資平把安那介紹了。資平到這時候才知道了我是娶有日本老婆的，他回頭使用中國話來對我這樣說：

“你把材料提供給我罷，老郭，我好寫一部留東外史的續篇。”

我聽了他這話時，覺得是受了一番小小的侮辱。我的心裏在這樣想：“這家伙太不客氣，這家伙



的趣味真是下乘!”我心裏雖是這樣想着，但沒有說出口來。待我看他倒本沒有侮辱我的意思，反覺得他這人的自信力很強，他直覺到我是不會做小說的人，要叫我把材料提供給他。

在這次會面後，不兩天，資平便回了他的熊本，大學也就開起課來了。

2

在大學開課不久的九月下旬，有一天午後，我從學校裏回來，安那背着和兒在樓下燒茶，她對我說：“樓上有幾位稀客來了。”

我急忙地跑上樓去，看見了三位來客，一位是成仿吾，一位是陳君哲，還有一位是我不認識的大學的同學。君哲把那位不認識的同學向我介紹了，是六高出身的大學的四年生徐誦明。君哲也是六高出身的人，和仿吾是同年級，比我早一年進的大學。

原來仿吾也是因為風潮回了國，這回是同着



一位同鄉的老先生，盲了目十年的人，到福岡來就醫的，他到君哲那兒去，聽說我也在福岡，他便隨着他們到我住宿處來了。

我和仿吾相識是在1915年的夏天，我初進六高的時候。仿吾要比我年青得三歲，但他的學級却早我們一年。他學的工科，在高等學校裏是屬於二部。我們在岡山算同了兩年的學，也同住了將近兩年。他很有語學上的天才，他對於外國語的記憶力實在有點驚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勸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進了名古屋的第八高等的時候，和幾位朋友同譯過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邊也擗助過謄錄和校對的工作。他自從有過那樣一番根底之後，他在高等學校的三年間是沒有置備字典的。做一位高等學校的學生沒有外國語字典，這在中國的學生看來或者不甚稀奇，但在對於日本的高等學校有些經驗的人，他至少是會



驚異的。日本的高等學校的功課，有一半乃至以上便是學外國語言，有第一外國語，第二外國語，甚至像我們學醫的人在第一的德語，第二的英語之外，還有第三種的拉丁語。一個禮拜的外國語時間在二十二三個鐘頭以上。加之日本人教授外國語的方法又是很特別的，他們是特別注重讀。教外國語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學士，本來並不是語學專家，又於學生們所志願的科學是沒有涉歷的，他們總愛選一些文學上的名著來做讀本。上課時的情形也特別不同，不是先生講書，是學生講書。先生只是指名某某個學生起來把原書讀一節，接着用日本話來翻譯。譯錯了時，或者讓別的學生改正，或者由先生自己來改正。接着又指名第二個人讀下去，譯下去。指名的方法，有的先生是挨着座次，那倒還可以偷懶，不輪到自己名下時可以不必準備。但有的先生全是任意，沒有一定的。因此



學生的自修時間差不多就是翻字典的時間。日本人還好，他們是用本國話來譯外國文，又加以朋友多，可以拚伙，很可以省些氣力。中國學生便是用外國話來翻譯另一種外國文的，一班之中大抵只有自己一個中國人，或者至多有兩個人的光景，因此是吃力到萬分。你看在這樣的學生生活中能夠不用字典的人，是不是一種驚異？

但是仿吾是很木訥的人，他很少說的中國話是一口湖南的新化腔，初和他會面的人，真不容易聽懂。他到日本的時候年紀很小，但他對於中國的舊文獻也很有趣些涉歷，我們在岡山同住的時候，時常聽見他暗誦出不少的詩詞，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體。大抵仿吾的過人處是在他的記憶力強，在我們幾個人中他要算是頭腦最明晰的一個。

他因為風潮回上海去了，在他的意思是很不想再轉來的，直到九月的尾上，各學校已經早已開



課了，才在上海遇着他的同鄉那盲了目十年的陳老先生。我們要記得蔡松坡也是湖南新化人，是死在福岡病院裏的。大約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那陳老先生知道了福岡的醫科大學裏有一位日本的有數的眼科博士，他已經是上了六十以上的年紀了，帶着一個兒子和一位管事遠遠地從他的家鄉出來到了上海，更打算到福岡去就那位名醫，想仗他的力量使自己盲了十年的雙目，於萬一的希望之中或可以重見天日。他們到了上海遇着仿吾，便拉他一同渡日，要他替他們做翻譯。

我所住的房間就是那“質屋”的質庫的樓上，面積只有一丈見方的光景，人立起來便可以抵着望板。只有東北兩面各有一堵鐵格窗，看來很像鳥籠，也很像監獄。但就是那樣的樓房，每月也還要我們六塊錢的房金。仿吾大約是看見了我們住的地方逼隘了，當他說到陳老先生們住在旅館裏，每



天的耗費太大，一個人每天要七塊錢，四七便是二十八塊，起居飲食都不方便，他們打算在外面找一間房子來自行開火食的時候，他便向我提議，好不好讓我們夫婦和他們同住，就由我的老婆替他們管理家政。

正在這樣商議，安那燒好了茶，措着孩子送上了樓來。我便把仿吾的意思向她說，不消說她是立地便承應了的。因為那時候日本的一斗米要管七塊錢，兩個人一個月至少也要吃十塊錢的米。我還有一件至今想起都還令人憤恨的事，是在六高畢了業的時候，曾經到過一次東京，向經理員預支了兩個月的官費：因為轉入大學之後第一學期要繳四十圓的學費，又要買參攷書，醫科所用的參攷書多是德文書，因為歐戰的關係，書籍不能輸入，就買舊書都要比原價貴到五倍以上。所以在初入大學時，預支學費是成了一般的通例。預支時原約的



是按月攤還，但最可恨的是那時的四川經理員，綽號叫張麻子的，他從八月份起便和我整扣起來。好在我預支時在七月，是照的舊額 48 圓，從八月起便增了費額，所以我在八月底算就僅僅得到二十四圓的增額。寫信去質問並求通融，他欺負你是住在鄉下的人，給你一個不置答覆。於是便弄得來把買好了的參攷書又拿去進當舖，——好在當舖就在樓下——在九月將近一個月中連吃飯都是在節省着的。但誰個料到在這樣意外的地方才遇着救星呢？所以當仿吾一提議，我在心裏早就是喜出望外的，一向安那說了之後，她也歡喜得幾乎流出了眼淚來，她只說，怕的是那老先生不高興，她是沒有不贊成的。

仿吾得到了我們的同意，便辭去了。隔不一會他又一個人轉來邀我們出去找尋房屋，原來那陳老先生聽說我們願意和他們同居，也是異常的高



與。所以在瞬刻之間事情便定奪下來了。我們便到箱崎神社前去找到了家房子，是有樓的，樓上有四間居室，樓下也有兩間。仿吾和陳氏一門定住在樓上，我們一家三口便住在樓下。把租約議定了，第二天我們就遷徙了去，於是乎我的老婆便成爲了陳氏一門的家政婦，我便成爲了聽差。但我當時是怎樣感激的呀！漂母的一飯原值得韓信的千金，況我和我的老婆是在出賣氣力，我們是並沒有甚麼羞恥的。

和仿吾同居在一處，我把月前和張資平兩人的擬議不消說是向他提說過，他也很贊成，但他覺得是人手不夠。據他的意見，東京的留學生能把中文寫通順的都沒有好幾個人，更說不上甚麼文學。他主張慢慢地蒐集同志，不必着急。

仿吾和我們同住了有兩個禮拜的光景，我白



天是要進學堂去上課的，自然不能夠陪他；他和那陳老先生父子特別是那位管家似乎也不很說得上來，他的生活便很有些無聊。我們勸他回東大去繼續學業，他起初很遲疑，覺得已經決意丟棄了的東西，自己又低首下心地繼續起來是很可恥的一樣。但他也經不住我們人多口衆的勸解，終於決心再住東京。他動身的時候是在一天晚上乘的夜車，天氣已經漸漸寒冷了下來。我記得他是披着我的一件襪袍(Mantle)去的，到了東京之後又郵寄轉來。

陳老先生所打算就的眼科醫生是學校的大西教授。那是很有怪癖的人，由醫學上的表現來說，是有點癡癩性的人物。他在德國留過十二年的學，在日本的眼科中是數一數二的國手，在日本醫界中也怕是數一數二的怪人。

他的逸話很多。



有一次聽說是有一位日本的陸軍大將或是中將找他療治眼疾，走進了他的診察室裏，向他舉手行禮。

他叫着，“把帽子脫了！”

那將軍遭了他的叱咤很出乎意外，但也很倔強地回答了一句：“皇國的軍人是不脫帽的。”

大西聽了便跳起來，連忙把那將軍推出了門去，不讓他說出二句話來。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進我的診察室的人是要脫帽的。”

像這樣的逸話在學生中很多傳說着，是真是假雖不得而知，但大家都怕他，特別是他名下的助手，怕得他就和老虎一樣。因此他那一個教室裏，助手是寥寥無幾的，也怕是因爲眼科不甚當道的原故。

陳老先生來找他，學校裏的老同學們爲他介



說，但大家都很戰戰兢兢地深怕觸犯了那怪教授的逆鱗。中國人的舊禮節也是不脫帽的，因此陳老先生頭上的那頂瓜皮小帽，又成爲了大家的憂慮的焦點。那叱咤將軍脫帽的一段故事也有人在他面前提說過，意思是要那老先生注意，和大西見面時把瓜皮小帽脫了。那老先生倒還很通方圓，據他說：“入鄉隨鄉”，脫帽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據我在旁邊所親眼看見過的說來，老先生住在病院裏的時候，大西教授每天是要來診察一次的，老先生有好些次便沒有脫帽，怪教授也沒有發過一次脾氣。我想，大約他是看見陳老是上了年紀的盲人，又不遠千里地走到海外來就他，他也是在感着意氣的罷？

陳老先生的眼睛據診察的結果是白內障，(Cataract)，假使舉行外科手術時，或許有復明的希望。老先生的熱心真可佩服，就是要略略見血的



外科手術，他也甘願膺受。在行手術之前的準備是很慎重的，血液的檢查，小便的檢查，各種內科疾患的有無之檢查便費了幾天。食餌的調節更特別嚴格，這一層似乎很把那老人苦了不少。湖南人愛吃辛辣的食物，就是上了六十歲的陳老先生每餐沒有薑，沒有辣椒，也都是食不甘味的，但怕的會激起了老人的腎臟病，這辛辣的食物却是最嚴禁的食餌。不過那老先生也很能忍耐，因有復明的希望在後頭，醫生說甚麼他也就唯唯聽命。他時常愛這樣說，他的眼睛將來復明時，能夠看見我們，他是很高興的。

起初受種種診察的時候是住在寓所裏，遇必要時再到學校裏去，後來決定了行手術，便移進病院裏去了，我和陳老的兒子和管家三人便輪流地在病院中陪他過夜。行手術的時候因為有課，可惜我不會看見，據說大西教授很得意，說他的手術進



行得很順暢，復明的希望或許是有的。

天氣一寒冷起來，學校裏的人體解剖實習便開始了，一個禮拜有三次都是在下半年。八個人解剖一架屍體，屍體是分成八部，頭部，胸部連上肢，腹部連下膊，脛連腳，左右各一人，餘下的背部是歸頭部的人解剖的。第一學期是解剖肌肉系統，第二學期是解剖神經系統，在約略四個月的期間要把這全身的兩項系統解剖完，因為左右是對稱的，所以一個人便須得輪解着八個屍體。屍體是用防腐劑福爾馬林 (Formalin) 注射過的，全身纏着裹帶儲在解剖教室的屍庫裏。八個人去抬出一個屍體來，陳在鋅板製的長條桌上，就給圍着吃西餐的一樣，拿着刀子和鉗子來便坐着吟味；起初一兩次倒還是一個囫圇屍，後來便分得成七零八碎了；最後是像幾頭人熊，各人抱着一節骨頭。福爾馬林的臭



味倒還不甚惡劣，但到時間過久了，裹帶的保障已經不嚴密，屍體上要發起黴來，天氣一熱時更要腐化，甚至鑽出些蛆蛹來。這樣敘述着好像很惡心，但在解剖着的人看來實在好像在抱着自己的愛人一樣。特別是在頭蓋骨中找出了一根纖細的神經出來的時候，那時的快樂真是難以形容，或者可以說是得着了愛人的一縷情絲罷？

屍體的來源是刑務所，因此所解剖的屍體便都是犯人，有的是絞死了的，在頸項上還留着絞索的痕跡，但大概是病死的多，得肺病死的人很不少。日本人是具有文身的習俗的，有些屍體上全身都施着朱色和藍色相間的人物畫，畫得異常工整。

在這樣怪奇的骨絡特斯科的（Grottesque）霧圍氣中我最初的創作慾活動了起來。

我幻想着我所解剖着的一個屍體上，在胸部有一個拙劣的裸體女人像的文身，旁邊也歪斜地



寫着“濱田愛子”四個字。同我解剖着的一個日本學生便嘩噪了起來，“哦，這是齋藤寅吉的屍首啦！”接着便談起了一段盜屍的故事。

那濱田愛子是離福岡不遠的昔年日本的遣唐使所出入的唐津地方一家名門的女兒，在三年前的夏天在唐津海灣中行海水浴時淹死了。黃昏時分屍體打上了海岸，因為要到明天警官才能來檢驗，在當晚便停寄在海岸上的一個棚廠裏，但到第二天來，那屍首突然不見了。

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在社會上生了很大的掀動，警察方面不消說是加緊的偵察，費了將近一禮拜的工夫都沒有着落，後來是有一位漁師的行跡可疑，那漁師自那屍首不見以來，白天沒人看見過他，只有在晚上偶爾出面，購買多數的冰塊。他的漁船每天都不見，要說他每天出去打魚去了，但又不見他打捕過甚麼魚回來。這漁師就是那齋藤寅



吉了，他在三年前死掉了妻子，一直到現在都還是獨身的。警察方面得到了這個線索，對於這人的行踪也就特別注意起來了。結果是在一天夜裏，那漁師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裏。有兩個偵探早就埋伏在那附近在等候着他的。看見他挑着一担空魚籃來放在門外，走進門去了；停不會又由屋子裏走出，挑着空魚籃，走上市去。兩個偵探便尾隨着他，看他到冰店去買了好些冰塊來盛在魚籃裏，但這回他沒挑回家却是向海岸上走去。兩個偵探又跟着他到海岸，在星光中發現了他的漁船是停在岸邊上。有一種異樣的奇臭。只聽見那漁師上了船對着空洞洞的漁船在說：

“小姐，我回來了！濱田家的小姐！……”

偵探聽見了，便急忙地掩上前去，跳上了他的漁船。那漁師看見有人來襲他，便順手提着一把切魚的長尖刀向爲首的一位偵探當心地刺去，把那



位偵探刺中了，他同時也被第二個偵探捕獲着了。

那位漁師的確就是那盜屍的犯人，那濱田愛子的屍首赤裸裸地藏在那艙板下面，雖然浸雜着好些冰塊，但已經是半腐的程度了。屍體經檢查的結果，很狼藉地在死後受了凌辱。受了重傷的一位偵探不久也就死了。就這樣，那漁師便犯了幾重的大罪：盜屍，屍姦，拒捕，殺人。後來經了判決是受了絞刑的。——

這就是我所幻想出的漁師齋藤寅吉的故事。但我的幻想還沒有結束。

故事的全體我是採用着歐洲舊式的小說體裁，全由一個日本學生口中談出的。煞尾是我聽了那番故事之後，我把那齋藤寅吉畫有裸體女像的——那自然是他在監獄中思慕着濱田愛子所自行刺墨的了——胸上的一幅皮膚割了下來，盛在酒精瓶子裏面，在課畢之後攜回了寓所。自己覺得很



疲倦，便倒在草席上休息。突然之間有人在我的耳畔叫：

“喂！還我的愛人來！”

我睜睛一看，才看見一架骷髏立在我的房門口。我不禁大吃一驚。但是這一驚不消說只是一個夢。

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篇創作的梗概，題名就叫“骷髏”。我自己苦心慘淡地推敲了又推敲地把它寫在了紙上，草稿也更易過兩三次。我自己不用說是很得意的。那陳老先生聽說我做了這樣的一篇小說，叫我把原稿唸給他聽，他很稱讚我，說是落尾的一個夢收得最好。我在當時真是不揣冒昧，公然把那篇最初的創作投寄到東方雜誌社去過，不消說是沒有登錄，隔不了許久“骷髏”仍然寄還到了我自己的手裏來，是我把它火葬了的。

陳老先生的眼睛受了手術之後，經過是很良



好，所擔心着會併發的疾病甚麼也沒有，但是失了的明總是恢復不起來。大西教授每天上午要來診察一次，要拿着手指在他眼前搖動，問他看見甚麼沒有。要把他的頭掉向有窗戶的一面，問有沒有甚麼白色的影子可以看見。但那老先生的空洞洞的一雙眼睛總是甚麼也沒看見。我在下課時去看他，或者在病室裏留宿的時候，也時常看見他愛自行伸一個指頭在眼睛前面搖動，或者把頭掉向有窗子的一邊去望望，但總是搖搖頭。教授的意思是假使有絲毫的模糊白影可以看見，那嗎網膜上的視神經末稍還沒有退化，第一次的手術沒有完全，還可再行手術使效果增強起來。但是終竟連絲毫的影響也沒現出，結論是怕是末稍神經已經退化了。那盲老一聽見這樣的話是很失望的，再受手術的勇氣也就消滅了。在病院裏住了四個禮拜的光景，依然在黑暗的世界中又回到我們的共同寓所來。



在十一月的中旬，他們便整頓起行裝回國去了。我總忘記不了的是那老先生對我們說過的這一句話：

“我能夠睜開眼睛看見你們一眼，我是怎樣的高興呀！”

這一句話他說過的不僅一次；在未行手術以前說過，在手術無效以後也說過。我是把他們送到門司上船的，在臨別的時候他也把這話來返復了一兩遍。

3

起初在箱崎神社前租定那間大房子的時候是先下了三個月的定錢的。陳氏父子在十一月的中旬走了之後，我們還在那兒住到了年底，在當年的除夜我們才搬到了附近臨海的一家小屋子裏面去。搬家是在夜裏，因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兩人自己手提背負地搬運了一兩次，也就搬空了。那時我的感傷率性大動了一下，做過好幾首絕詩，有幾首我還記得，把它們寫在這兒：

十里松源負稚行，耳畔松聲並海聲。

昂頭我見天星笑，天星笑我步難成。



除夕都門去國年，五年來事等輕烟。
壺中未有神山藥，贏得妻兒作掛牽。

回首中原嘆路窮，寄身天地太朦朧。
入世無才出未可，暗中誰見我脛紅？

一篇秋水一杯茶，到處隨緣是我家。
朔風欲打玻璃破，吹得爐燃亦可嘉。

這些最足以表示我當時的心境——矛盾的心境。自己好像很超脫，但在事實上却很矜持；自己覺得是很熱心的愛國志士，但又被人認爲了“漢姦”；在無可如何之中便只好得過且過，算好倒還沒有落到自暴自棄的程度。這沒有鬧到自暴自棄的程度的，或者也怕是沒有錢的關係，有一些人要表示出自己的風塵潦倒，便要寫出滿紙的醇酒美人，一些不假思索的青年也就爲之洒雪出無限的同情的



眼淚，其實那所謂醇酒美人是要以錢為前提的。

轉瞬便是1919年了，綿亘了五年的世界大戰已經告了終結，從正月起，在巴黎正開着分贖的平和會議，同時“山東問題”也鬧得甚囂且塵上來了。我的第二篇的創作“牧羊哀話”便在這時候產生了出來。做那篇小說時是在二三月間，學校裏正在實習着顯微鏡解剖學的時候，我一面看着顯微鏡下的筋肉纖維，一面構成了那篇小說。那在結構上和火葬了的“枯骸”完全是同母的姊妹。我只利用了我在1914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鐵路渡日本時，途中經過過朝鮮的一段經驗，便借朝鮮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鮮人的心裏。那全部的情節只是我幻想出來的，那幾首牧羊歌和一首怨日行，都是我自己的大作。我在縱貫朝鮮的鐵路上雖是跑過一天一夜，但那有名的金剛山我並不會去過，我的關於金剛山的智識，只是看過一些照



片和日本文士大町桂月的金剛山遊記，所以那小說裏面所寫的背境完全是出於想像。

那篇小說寫成了之後，因為“枯骸”嘗受過一次絕望，我不敢再作投稿的冒險了；但我想發表它的心事也並沒有拋棄。那時候我的一位長兄還住在北京，在司法部裏做事情，我便把那小說寄給了他，請他改削，萬一有可以發表的地方，便請他在報上替我發表。我的長兄寫信來責備了我一番，說我正在求學的時候，不應該沾染文墨上的事情，應該好好的學些本事，將來可為國效力。我的小說，他一字不易地又給我寄回來了，問我那首怨日行是從那位朝鮮人的詩集裏抄下來的？

不久之間“五四運動”的風潮便澎湃了起來。那在形式上是表示為民族主義的自衛運動，但在實質上是中國自受資本主義的影響以來所培釀成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對於舊有的封建社會之決死的



抗爭。自從那次的運動以來，中國的文化便呈出了一個劃時期的外觀。

在那年的六月，在福岡的同學有幾位集合了起來組織過一個小團體，名叫夏社。這夏社是我所提議的名字，因為我們都是中國的人，結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會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學家裏。我們的目的是抗日，要專門把日本各種報章雜誌的侵略中國的言論和資料蒐集起來，譯成中文向國內各學校各報館投寄。由幾個人的自由的捐助，買了一架油印機來做爲我們的宣傳的武器。但是這個團體結成以後，同學的人都不會做文章，只讓我和陳君哲兩個人去擔任。君哲只做了一篇東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只剩下我一個人做了油印機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我在暑假中也發過好幾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寫臘紙，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的。



因爲在做這種義務的通信社的工作，國內的報紙便至少不能不訂閱一份。我們訂的是上海時事新報。那個報紙在五四運動以後很有革新的氣象，文藝附刊的學燈特別是風行一時。訂報是從九月起頭，第一次寄來的報紙上我才第一次看見中國的白話詩，是康白情的一首“送甚麼人往歐洲”。詩裏面有“我們叫得出來，我們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當稍有出入)的一類話。我看了不覺暗暗地驚異，“這就是中國的新詩嗎？那嗎我從前做過的一些詩也未嘗不可發表了”。我便把我1918年在岡山時做的幾首詩，“死的誘惑”，“新月與白雲”，“離別”，和幾首新做的詩投寄了去。這次的投機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學燈上登了出來；看見自己的著作第一次成了鉛字，真是有種說不出來的陶醉。這便給與了我一個很大的戟刺，在1919的下半年和1920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



個詩的創作爆發期。

我自己在小時本來就是喜歡唸詩的人，因為我們的母親愛從口頭教我們暗誦唐宋詩人的五絕七絕。在國內的中學校肄業的幾年間，科學方面的教員們通是些青黃不及的資料，不能夠喚起科學上的興趣，我自己也就只得在古詩古學裏面消磨。這不幸的幾年間構成了我日後的一個怎麼也難克服的文學的傾向。

我初到日本來的時候，是決心把這個傾向克服的。在那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是國家主義者，那時的口號是所謂“富國強兵”，凡是稍有志趣的人，誰都是想學些實際的學問來把國家強盛起來，因而對於文學有一種普遍的厭棄。我自己是在這種潮流之下逼着出了鄉關，出了國門的人，雖是有傾向於文藝的素質，然而存心地要克服它。這就是我所以要學醫學的原



因。因爲受着時代潮流的影響既鄙棄文學，同時又鄙棄法政經濟之類的學科，而自己的科學上的基本智識却沒有堅實的根底，對於數學尤其有點畏難，所以避開了理工科，而檢取這條折衷的醫學的路徑。但不料我在一高預科時無心之間和印度詩人太戈兒的作品接近了。那時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從學校裏拿了幾章英文的油印錄回來，是從太戈兒的新月集中選出來的幾首詩，是“岸上”，“睡眠的偷兒”，“嬰兒的世界”等篇。我把來展讀時，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風味，和向來所讀過的英詩不同，和中國的舊詩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區別。從此我便成爲了太戈兒的崇拜者，凡是他的早期的詩集和戲劇我差不多都是讀過的。我在岡山的時候便也學過他，用英文來做過些無韻律的詩。辛夷集開首的題辭便本是1916年的聖誕節我用英文寫來獻給安那的散文詩，後來我把



它改成了中文的。

我們準備學醫學的人，第一外國語是德語，日本人教語學的先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學士，用的書大多是外國的文學的名著，例如我們在高等學校第三年級上所讀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敘傳“創作與本事”（*Dichtung und Wahrheit*），梅里克（*Mörrike*）的小說“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 nach Prague*）。這些語學功課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學傾向助長了起來。我得以和德國文學特別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詩歌接近了的，便是在這個時期。

因為喜歡太戈兒，又因為喜歡歌德，便和哲學上的汎神論（*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起來——或者可以說我本是有些汎神論的傾向，所以才特別喜歡有那些傾向的詩人的。我由太戈兒的詩認識了印度的古詩人伽畢爾（*Kabir*），接近了印度



古代的“烏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我由歌德又認識了斯賓諾若(Spanoza)，關於斯賓諾若的著書如像他的“倫理學”，“論神學與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間接地讀了不少。因為和國外的汎神論的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年少時分所喜歡的莊子發現了。我在中學堂的時候便喜歡讀莊子，但只喜歡那文章的汪洋恣肆，那裏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國外的思想參證起來，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貫通”的程度。我在高等學校第三年上曾經起過一個野心，想做一部“莊周評論”，把想論述的詳細的目的，寫給北京的長兄去過，但只同樣地遭了他的斥責。

在大學的二年上，正當我在開始向學燈投稿的時候，我無存心地買了一本有島武郎的“叛逆者”。那兒所論的是三個藝術家，便是法國的雕刻家羅丹(Rodin)，畫家米勒(Millet)，美國的詩

人恢鉄曼 (Whitman)。因此又使我和恢鉄曼的“草葉集”接近了起來，他那豪放的詩調使我開了闊的作詩慾又受了一陣暴風的煽動。我的“鳳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等詩，便是在他的影響之下所做成的。

但使我的創作慾爆發了的，我應該感謝一位朋友，編輯學燈的宗白華。我同白華最初並不相識，就由投稿的關係才通起了信來。白華是研究哲學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汎神論的傾向，這或者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時候，但凡我做的詩，寄去了他無有不登，竟至學燈的半面也有整登着我的詩的時候。說來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詩的工場一樣，詩一有銷路，詩的生產便愈加旺盛起來。在 1919 年與 1920 年之交的幾個月間我幾乎每天都在詩的陶醉裏，每每有詩的發作襲來就好像生了熱病一樣，使我作寒冷，使我提



起筆來戰顫着有時候寫不成字。我曾經說過，“詩是寫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便是道的當時的實感。但到1920年的四五月間白華到德國去了，學燈的編輯換了人，我的詩潮從此也就消涸了。

我得以認識田壽昌的是因白華的介紹。田壽昌和宗白華都是當時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是五四運動以後所產生出的新人。壽昌也在日本留學，那時還在東京高等師範讀書。他那時已在介紹着俄羅斯文學，又在議論着詩人和勞動問題。據我所知道的他是受了日本文壇的影響，同時不消說也就是間接地受的俄羅斯革命的影響。1917年俄羅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國的勞工運動上和文化運動上有一個劃時期的促進。日本的思想之一角顯著地呈出了左傾色彩的，便是從那時候起頭。在當時比較進步的雜誌“改造”和“解放”，繼續發刊了。



壽昌由白華的介紹和我開始通信，後來在1920年的三月尾上，他利用着春假竟由東京到福岡來訪問過我。他來的時候正逢着我第二個兒子博孫誕生後才滿三天，我因為沒錢請用人，一切家中的雜務是在自己動手，他看見了我那個情形似乎很感着了沒大的失望。他那時候還年青，還是昂頭天外的一位詩人，不知道人生為何物。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樣。當他來了的第三天上我公然陪着他到福岡附近的名勝地太宰府去玩了一天，第二天也陪着他遊玩了福岡市中的名勝，把產後僅僅五六天應該保持絕對安靜的安那連帶着兩個孩子丟在了家裏，後來弄得奶子斷了，生出了種種的病痛。

孩子因為斷了奶的關係便不得不用人工營養；營養又不很得法，因此又發生出了食餌中毒的症候，只得抱進大學病院裏就醫。先生說，孩子恐

創造十年。



怕是不能夠保的，只有用最後的手段飢餓療法來調治，要等到中毒現象的熱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進病院的一間小小的病室裏，守着一個發着高熱的因飢餓與痛苦而啼哭着的半死的嬰孩。時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園中有寂寞的雞冠花映着寡白的秋陽。白天守了一天，到晚來又眼睜睜地守了一夜，我那首“密桑索羅普的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裏做出的。那在痛苦的人生的負擔之下所榨出來的一種幻想。由葡萄中榨出來的葡萄酒，有的人會謳歌它是忘憂之劑，有的人又會詛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曉得那是它自己的慘淡的血汁。孩子在第二天的清早熱度退了，算是好了起來。那首副產物的夜歌，後來因為壽昌翻譯了王爾德的“沙樂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寫寄了給他。

壽昌來訪的結果是產生了一部三葉集，所蒐集的便是白華，壽昌，和我的通信。但他對我是很



很的失望。他回東京時，路過京都，和鄭伯奇見面時，伯奇問他見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說了一句“聞名深望見面，見面不如不見。”這是後來伯奇對我言及的，但我相信絕對不是假話：因為壽昌對我也露過這樣的口氣。當他初來的時候，我正在燒水，好等產婆來替嬰兒洗澡，不一會產婆也就來了。我因為他的遠道來訪，很是高興，一面做着雜務，一面和他談笑，我偶爾說了一句“談笑有鴻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來有產婆”。他說這話時，或者是出於無心，但在我聽話的人却感受着不小的侮蔑。後來在三葉集出版之後，他寫信給我，也說他的舅父易梅園先生說我很有詩人的天分，但可惜煙火氣太濃重了。當時的壽昌大約是嫌我太不高，太不自重，往來的是產婆下女，關心的是柴米油鹽，這樣是會把詩藝之女神駭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沒有想到我假如有錢，誰去幹那樣的事體；不消說



更沒有想到使我們不得不愁鹽愁米的社會，更是怎樣的社會。三葉集出版之後頗受了一時的歡迎，壽昌便又食指欲動起來，又曾約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葉集，這個提議是由我拒絕了。

在學燈上投寄詩稿的時候，我也投寄過一兩篇小說，有一篇是“鼠災”，寫的是我的唯一的一件嘩嘍的學生裝放在破了角的藤籠裏面被耗子咬壞了，我和安那勃谿了一場的一段故事。那全篇用的是心理描寫，寫得頗暗淡，比較我那“牧羊哀話”和火葬了的“枯體”，要算是進了一境的創作。可惜我自己沒有存稿，別的人也沒有替我保存着的。(注)

那篇“牧羊哀話”，我起初是在學燈附刊上看

(注)假使有人有1919年九月以後及1920年四月以前的學燈的人，這篇文章一定可以找出。



見了有一種“新中國”雜誌在北京刊行，看那廣告上也登載着杜爾斯太的短篇小說的翻譯，我也就大着胆子投寄了去。這回也搭響了。那雜誌的編輯先生登時回了一封信，稱讚我的小說“筆酣墨飽，情節動人，決於本誌第七期登載”。但自從接到那封信以後便沒有得到消息，後來隔了許久，由我的詰問才得到了兩本雜誌的報酬。那“新中國”究竟是那一系的刊物，那位編輯先生究竟是誰，我到現在也還不知道。

4

自己本是傾向文學的人，受着時潮影響，反乎本性地到日本來學習醫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針採取的是灌注主義，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學識灌進學生的腦裏，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在高等學校的時候倒還沒感覺着甚麼，因為那兒的工課一半以上是語學，也可以說就是文學。進了大學情形便迥然不同了。天天鬧的是“姆士苦魯士”（Musculus 筋肉），“奈爾烏士”（Nervus 神經），“欺爾苦拉穹”（Circulation 循環），“勒斯披拉穹”（Respiration 呼吸），並沒有多麼道理，只是烏士魯士拉穹沙穹



的死記些外國名辭。一個腦筋成爲一個世界漫遊者的皮篋，縱橫狼藉地貼滿了各個口岸各種文字的旅館招帖。

在我自己還有一種身體上缺陷，是我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得過一次重症的傷寒，兩隻耳朵是得了中耳加達兒的。這種疾患的症候是耳鳴重聽，原因是由高熱的關係使鼓膜窪陷了，在傳播聲音的機構上生出了障礙。在高等學校時，因爲那兒班上的人數少，每班至多只四五十個人，教室不大，這種症候倒還沒感覺着怎樣的困難。進了大學，特別是醫科大學，每班的人數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講義都是口授筆記，因此自己的不健全的聽力便感受着沒大的痛苦。

就這樣在身心兩方都感受着痛苦，在進大學後沒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覺着我自己的學醫是走錯了路。1919年的暑假中，我早就有想改入文



科的心事，但反對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着生活上的壓迫的，她認定醫學可以作為將來的生活的保障。而我自己所受的身心上的痛苦，她是沒有身受的。像那種眼睛所看不見的痛苦，你就訴說出來，別人也只把你當成神經過敏。因為有了她的反對，於是乎我的牽怒便是恨她，甚且唾棄着一切的科學。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的便是在這個時候。

我在 1919 年的夏天，便零碎地在開始作浮士德的翻譯，特別是那第一部開首的浮士德咒罵學問一段獨白，就好像出自我自己的心境一樣。我翻譯它時，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那場獨白的翻譯最初是在那年的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發表過的。第二年春間經宗白華的勸誘，我又曾把那“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開首一場“風光明媚的地方”翻譯了出來，後者也是在學燈上發表過的。



就在宗白華往德國留學的時候，我自己却是想跑回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我的那篇“鳳凰涅槃”便是象徵着中國的再生。“眷念祖國的情緒”的“爐中煤”便是我對於她的戀歌。“晨安”和“匪徒頌”都是對於她的頌詞。特別是“匪徒頌”，那是憤慨於日本新聞界的捏誣，那時候的日本人稱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學生為“學匪”，我感覺着無限的憤恨。為抗議“學匪”的誣讒，便寫出了那首頌歌。但在五四以後的國內的青年，大家感覺着智識慾的驅迫，都爭先恐後地跑向外國去的時候，我處在國外的人却苦於智識的桎梏想自由解脫，跑回中國去投進我愛人的懷裏。我那時候想回中國去也並沒有多麼大的野心，就像太戈兒的園丁集裏的那個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園丁一樣，我是只想跑回中國去，在那



兒的中小學校裏當一個國文教員便心滿意足了。

1920年的七月十日，我率性放下了決心，別離了安那和兩個孩子，跑到門司去想乘船回到上海。那時候有一位朋友在門司養病（就是殘春中的賀君），我去看他時，他的病也快要脫體了，打算在七月底退院回國，約我等一下和他同道。我自己想到在上海並沒有熟人，地方也不熟習，在1915年的五七雖然回到那兒去過一次，但只在旅館裏滯了三天，甚麼地方都沒有去過，對於那未知的上海也不免隱隱地含着一種恐怖。樂得有伴，我也就承應了，又由門司折回福岡。折回福岡時是七月十九日，就在那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張東蓀的來信。

張東蓀是當時的時事新報的主筆。信裏說他們有幾位同志，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共學社，打算翻譯海外的名著。浮士德正是名著之一，因我零碎地



翻譯過一些，他便勸誘我從事全譯，不則另外担任一兩種譯述。條件是在時事新報上登着廣告的，並且登了許久，售稿或版稅都聽隨自便。

我得到這封信時異常的高興，安那不用說也是喜出望外的，我便立地寫了一封回信，接受了前方的提議，著手浮士德的全譯，把回國的計畫暫時中止了。

西洋的詩劇，據我看來，恐怕要算是最無理的一種文學的形式，最當散行的對話都用韻文表現，結果實不外是一種文學上的遊戲。浮士德這部詩劇，單就第一部而言，僅可稱爲文字的遊戲之處要在對成以上，像那“歐北和酒吧”，“魔女之廚”，“瓦普幾司之夜”及“夜夢”，要算是最沒有詩意的地方。那些滲雜在詩劇裏面而濫竽詩名，僅是在有韻調的鏗鏘而已。在這些地方譯得最吃力，最不討好，假如要用散文譯出時，會成爲全無意味的一些



骸骨，用韻文譯出來，也不外是下乘的遊戲文字而已。在這些地方我覺得元代的雜劇，和以後的中國戲曲，唱與白分開，唱用韻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敘事，比之純用韻文的西洋詩劇是要較近情理的。

譯浮士德的第一部費了有四個禮拜的工夫，我的初稿是用毛筆在日本的“改良半紙”上寫出的，因為塗抹得厲害，我又工整地謄寫過一遍，結果是將近一個暑假的時間都為此消費了。第二部更長，更難譯，難譯的原故是因為那兒的遊戲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全劇的構成過於支離，而那裏面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對革命（這個革命的意義與現代的不同的思想，是使我最難忍耐的。因此我便改變了初志，只譯出第一部來印行，第二部不譯。這個辦法並不是由我創始，浮士德的英譯有三十種以上，僅譯第一部的在二十種以上，把第二部全譯了的不上十種。演浮士德的人，也僅僅是演第一



部的。因此我便寫信給共學社，提說僅譯第一部的意思。不知道是那封信失掉了，還是共學社的人看見我不想譯完，便以為無可出版的價值，信去後，我一直沒得到回信。不久學校又開起了課來，我只好把譯稿收拾起來，放在一個日本式的一個“茶龕”下小小的壁櫥裏，等有機會時再來譯第二部。回國的念頭也同時寄放着了。

不幸在這兒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災”。學校開課之後大約有四五個禮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禮拜日想把譯稿取出來整理一下，同時也想借着禮拜和每日夜間的餘暇來試作第二部的翻譯，以好使工作告一個結束。待把小小的壁櫥打開，放在壁櫥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見了。那壁櫥原來有一個窟窿和旁邊的一個櫥子的地板相通，有高客先生把我的譯稿拉去做窠去了。紙是改良半紙，異常柔軟，但那高客先生們還嫌不如意，



把紙頭咬得來真是和粉一樣碎。這個災難使我失望不小，因為那是我費了將近一個暑假的勞力譯出來的東西，每天清早四五點鐘便起床，連吃飯的時間都疼惜着譯了出來，才成了這樣的一個下落。被咬壞了的部分就是那“街坊”以前的各場，那在第一部中要算是最難譯的部分。假使我的底稿還存着，都還可以安慰一下，但那些底稿在第二次的清寫稿錄出時，已經先先後後消費到毛房裏去了。就這樣，第一次受了黃金幹先生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的批判，使我那部譯稿便成爲一架殘骸。而在第三次還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對我說：“這定是說你不應該做文學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馬便受着這樣的打擊。”

翻譯了浮士德對我却還留下了一個很不好的影響。我的短短的做詩的經過，本有三四段的變化。第一段是太戈兒式，這段時期在五四以前，做



的詩是崇尚清淡，簡短，所留下的成績極少。第二段是恢鉅曼式，這段時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詩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紀念的一段時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熱失掉了，而成爲韻文的遊戲者。我開始做詩劇便是受了歌德的影響。在翻譯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後，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在那年的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僅僅發表了一幕，就是後來收在“女神”裏面的那一幕，其餘的通成了廢稿。“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後來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個影響之下寫成的。助成這個影響的不消說也還有當時流行着的新羅曼派（Neo-romanism）和德國新起的所謂表現派（Expressionism）。特別是表現派的那種支離滅裂的表現，在我的支離滅裂的頭腦裏，的確是得到了它的最適宜的培養基（Nährboden），妥勒爾的“轉變”，凱惹爾的“加勒市



民”，是我最景仰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多少是崇拜歌德的，特別把歌德的“由內而外”（“Von Innen nach Aussen”）的一句話做爲了標語，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譯過了之後的我，更感覺着了骨肉般的親熱。但這一個影響却把我制限着了，我在後來要擺脫它，却費了不小的努力。

記得是北京的劉半農博士，他在語絲上嘲罵過我，說我是“上海灘上的詩人，自稱歌德”。我在前雖然沒有自稱過我是歌德，但我和博士先生一樣委實是崇拜過歌德來的人。博士先生的說我“自稱歌德”是罵我不配，但我現在可又進了一步，我敢於這樣說，像歌德那樣的人是值不得我們崇拜的——在博士們看來，或者又會說我是在“自稱歌德以上”，那倒可以說是近乎事實。歌德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他的努力，但他的成績也實在有限，他和他同國同時而稍稍後出的馬克思比較起



來是怎麼樣？那簡直可以說是太陽光中的一個螢火蟲！他在德國是由封建社會轉變到資產社會的那個階段中的詩人，他在初期是吹奏着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號手，但從他做了隈馬公國的宰相以後，他老實退回到封建陣營裏去了，他那貴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實在有點薰鼻。詩人海涅罵過他，說他只曉得和女人親吻——用紅樓夢上的話來表現時，便是只曉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他老先生的確是可以稱爲德意志的賈寶玉。

我雖然不會自比過歌德，但我委是自比過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實際上就是“夫子自道”。那裏面的屈原所說的話，完全是自己的實感。“從早晨起來，我的腦袋便成了一個灶頭；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囱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霧，飛起火星，我的耳孔裏還烘烘地只聽着火在嘯；灶下掛着的一個土瓶——我的心臟——裏面的血水沸騰



好像要乾涸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跳。”在當時我自己的生理狀況就是這樣的。我在目前也多少還是這樣，但我沒再有那時那樣的狂妄，要叫着“破滅！破滅！我歡迎你！我歡迎你！”的話了。我知道這樣的一點點身體上的苦痛，比較起在鐵鎖之下呻吟着的朋友們，在火線上再接再厲的朋友們，所受的苦痛，算得甚麼！但我當時實在是有些燥性狂的徵候，領着官費，養着老婆兒子，實際上不外是一條寄生蟲的我，而他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樣，就好像天高地闊都沒有自己可以容身的地點一樣。

我從前做過的一些古事劇或小說，多是借着古人的皮毛來說自己的話，這層也就是西洋賈寶玉所給與我的惡影響了。我們知道“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就是歌德自己的化身，“威廉邁斯達”中的威廉，也不外是渥爾夫剛他自己。



“女神之再生”是在象徵着當時中國的南北戰爭，共工是象徵南方，顛頊是象徵北方，想在這兩者之外建設一個第三的中國——美的中國。但我自己的力量究竟是太薄弱了，所表現出來的成果僅僅是一副空架子。這篇詩劇的初稿我寄給鄭伯奇看過，又由伯奇轉寄了給達夫。達夫用德文做過一首詩給我，我把來寄到民鐸雜誌去一同發表過。可惜我手裏沒有民鐸，達夫的詩我也不能記憶了，我僅記得是兩節詩，每節四行；那八行詩的價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詩劇之上的。

5

南國月刊的二卷一期（1930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多蒙田壽昌爲我保存了一封舊信：

“壽昌：

你近來做了些甚麼趁心事？還好麼？你我已久不寫信了呢！你做的“Violin and Rose”，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國雜誌已經停寄了，所以我至今還未入目。你其餘的一些計畫，已經完成了麼？我在年假中也做了兩篇短短的戲曲。一篇是“湘累”，是把屈原姊弟優孟化了的，不久在學藝雜誌上當得披露。一篇是“女



神之再生”，現在還在伯奇那兒，將來擬寄往李石岑君在民鐸上披露。

成仿吾君你近來會過沒有？他去年有信來，說有幾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要約你和我加入。他曾經和你商確過莫有？他來的信上說：‘新文化運動已經鬧了這麼久，現在國內雜誌界底文藝，幾乎把鼓吹的力都消盡了。我們若不急挽狂瀾，將不僅那些老頑固和那些觀望形勢的人囂張起來，就是一班新進亦將自己懷疑起來了。’他這個意見，我很具同感，所以創刊底建議，我也非常贊成，不消說我們創刊雜誌另外還有多大的目的和使命了。京都方面底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間擬往京都——我昨天寫到此處便住了筆，今天往校內去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來，我纔知道他已經



和你商量過來。其後的進行怎麼樣了？

我等你來信，再商量以後的辦法。

沫 若， 十八日。”

這“十八日”是 1921 年的正月十八日。那時正是我的煩悶達到絕頂的時候，我說“二月間擬往京都”，便是想改進那兒的文科大學。這次的計畫也沒有成爲事實，是遭了仿吾的反對。仿吾的意思是，研究文學沒有進文科的必要；我們也在談文學，但我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學上的基礎知識。他這些話却把我想轉學的心事克服了。

仿吾自從同着那位盲目的陳老先生來過一次福岡之後，他和我是在常常通信的。當我 1919 年與 1920 年之交正猛烈地爲作詩慾所襲迫着的時候，我凡是成就一首詩，是用複寫紙謄錄出來，一份寄給宗白華，一份便寄給仿吾。仿吾最喜歡我那首“讀 Carlyle: ‘the hero as poet’ 的時



候”的“雪朝”，但他不高興那第二節，說是“在兩個宏濤大浪之中那來那樣的蚊子般的音調”。但那首詩是應着實感做的。那是落着雪又刮着大風的一個早晨，風聲和博多灣的海濤聲，十里松原的松濤聲，一陣一陣地起來，把銀白的雪吹得彌天的亂舞。但在一陣與一陣之間却因為對照（Contrast）的關係，有一個差不多和死一樣的沉寂的間隔，在那間隔期中便連簷雷的滴落都可以聽見。那正是一起一伏的呂律，我是感應着那種呂律而做成了那三節的“雪朝”。我覺得要那樣才能形成節奏，所以我對於仿吾的意見沒有採納。仿吾尤喜歡的是“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的那一句，他在 1921 年的年頭所做的處女作“流浪人的新年”，開首的幾行中便引用了那一句。

仿吾開始作新詩，據我所知道的是從 1920 年起頭。當宗白華還未去國時，他有兩首詩我替他



寄到學燈去發表過，一首是“澎湃的黃海”，他宣言着我們達到了我們的“Sturm und Drang”（狂飈突貫）的時代，他在那年的暑假在房州洗海水澡，便做了不少的詩寄給我，我替他集成“海上吟”，在創造季刊的創刊號上發表了的便是那時候的作品。仿吾初期的詩和他的散文是形成着一個奇異的對照的，他的散文是勁峭，有時不免過於生硬；他的詩却是異常的幽婉，包含着一種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讀他的詩，絕對連想不到他在學造兵科，在和大大炮戰車打交道的人。但他和我一樣是在煩悶着的。他爲甚麼要學造兵科，我不曾聽他自己說出過他的理由，但我們是很容易推想得到的，那也不外是富國強兵的時代潮流之影響。他後來爲甚又終於把造兵的本職拋棄了：這我也不曾聽他自己說出他的理由，但我想他的文學趣味的抬頭縱不是全部的原因，總要算是重要的一個。



1920 年的下半期他在研究杜爾斯太。達夫寫信來對我說過，說他的研究最徹底，他打算把杜爾斯太的全部的著作都拿來讀它一遍。但這項研究在後來似乎中輟了，因為隨後我也不會看見他提到杜爾斯太來過。他和達夫同在東大。張資平那時候也在東大的地質科。我說的能夠信任的幾位朋友，便是指的他們。田壽昌和他們的交際要算是出於我的介紹。那個“想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的計畫，便是博多灣上的舊議的復活了。據仿吾先後寫來的信，說他們在東京在達夫的寄宿處開過兩三次會，第二次壽昌出了席，討論的結果是壽昌自行担任在國內找出版處，並要邀約些國內的朋友來參加。第三次開會時壽昌沒有出席，出版處的消息也沒有下文。

“京都方面底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便是說的鄭伯奇穆木天張鳳舉徐祖正諸人。伯奇那時



還在京都三高，我和他的交際，又是由壽昌介紹的，自壽昌來訪之後，他便在和我通信了。

我聽了仿吾的勸告打消了轉學向京大的念頭，但我的煩悶是並沒有因而打消的。我在二三兩月間狂到了連學堂都不願意進了。一天到晚據在樓上只是讀文學和哲學一類的書籍。我讀了佛勞伯爾的“波娃麗夫人”，左拉的“制作”，牧白桑的“波南蜜”，“水上”，哈默森的“飢餓”，波弈爾的“大餓”，還有好些易卜生的戲劇。浩普特曼的戲劇，高綏華士的戲劇。愈和這些書接近，便愈見厭棄醫學，回國的心事又抬起了頭來。

當在這樣煩悶而動搖着的時候，仿吾也和我一樣在煩悶而動搖。他是學造兵科的人而要澈底的研究杜爾斯太，單是這一點已經就可以知道他的矛盾。他在東京是和他的一位同鄉李鳳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處私立大學學法政的人，在



1921年的二月畢了業，先回上海去了。泰東圖書局在那時打算改組編輯部，要分成法學文學哲學的三科。李鳳亭任法學主任，李石岑任哲學主任，是已經約定了的。李鳳亭便推荐仿吾為文學主任。於是仿吾也就決定了回國的計畫，並把臨到頭的畢業試驗拋棄了。他決定在三月尾上由神戶乘船動身，船在四月一號可以抵門司。我得到這個消息：便急轉直下地也決定了在四月一號到門司去和仿吾同船回國。

我是在晚上動身的，那時候我家裏還稍稍出了一點悲劇：便是我們在海上住了兩年多的房子，在我決定了走的三月三十一號的那一天，屋主來領了房金，同時說他的房子要改造，限我們在一禮拜之內要搬出。這到後來才知道只是一個口實，實際上是另外找到了一家願多出一倍房金的墊客。那房子是一樓一底，樓上有兩間房屋可住，底



下是日本的漁家式的建築，一邊是牆壁，一邊是廠放着的，雖也是兩間的間隔，但並不成爲房屋。我們起初租賃下來的時候，是每月六元的房金，把我們趕走之後，所新招的一家人聽說是每月十二元。在我已經決定了走時，而我留在後邊的家族却要被人驅逐，這使我的決心不免又動搖了起來。在這兒我是應該感謝我的安那的。她平常雖是阻當我，不要我改學，不要我回國，但她看到後來就像成爲狂人的一樣，滯在家裏幾月不進學校，她也就決心讓我把醫學拋掉，回國去另外尋一種出路。她的性格比我強，只要一起了決心，便沒有甚麼遊移，在我動搖着的時候，反是她來鼓勵着我執行了既定的計畫。

由福岡到門司只有兩個鐘頭的火車，我動身時是在夜裏，因爲在白天時兩個孩子看見我走，是會要啼哭的。安那在夜間煮了些紅豆飯，燒了一匹



鯛魚來替我餞行。這是日本民間的很有古風的習慣，凡是表示喜慶或祝賀的時候便要用這些東西，和中國的民俗很是相近。紅豆飯不消說是取其紅色。鯛魚在上海市上稱爲銅盆魚，也是一種紅色的海魚。

走的時候天在下雨，安那說要送我到箱崎車站上去，我阻止了她，怕的是兩個孩在夜間醒了來沒人照顧。

丟着一妻二子在後邊，雖說是回國實際是等於出外飄泊的我，我的不值錢的眼淚和那晚的夜雨一樣，是淋漓地洒雪過的。我最放不下心的，便是我走之後，剩下的家裏人在一禮拜之內不能不另尋巢穴。

安那安慰我，他說，“在村上很有些熟人，在你回國之後暫時還有官費可領，我們的事情你可不用擔心。只希望你回國去努力，有了職業時，我們



便回來跟着你。”

就這樣同安那住了四年另三個月，纔第一次要作長久的分離。我在夜雨中從十里松原穿過，到箱崎車站去搭夜車，我心中的感覺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陣的一樣——不是說自己很勇敢有視死如歸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兇莫卜。

在門司的船上遇着了仿吾，天色也晴起來了。海灣中的海水呈着濃藍的顏色，有好些白鷗在海上翻飛。在晴明的自然中，與久別的舊友重逢，夜來的憂鬱已被清冷的海風吹送到太平洋以外去了。我那時候自己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覺，眼前的一切的物象都好像在奏着生命的頌歌。仿吾搭的是三等艙，他在自己的舖位旁邊另外替我空下了一個舖位。同時他還替他的友人護送着家眷，那是搭着二等艙的。

在門司時的天色異常清明，但不料船一出海



時便起了風雨。我是愛暈船的人，睡在那黑黢黢的三等艙中一動也不敢動。仿吾很強，他時而要跑到二等艙去照拂友人的孩子們，時而又跑到三等艙來和我談話。仿吾隨身帶了不少的德文，雷克郎車(Reclam)版的屠格涅甫的小說。他的杜爾斯太的研究又已經轉換成屠格涅甫的研究了。我睡在船上算得到機會把屠格涅甫的“父與子”，“新時代”等讀了一遍。

船到上海的那一天是四月三號，天色又晴起來了，但是風浪還沒有止息。我醉心着想在船頭上去看海中出日的光景，忍着眩暈地跑上船板上去，好容易把那光景目驗了一下，但幾乎把自己的肝臟都吐了出來。我那“歸國吟”中的“海舟中觀望日出”的一首便是寫的是這個時候的情景。

船進黃浦江口以後，那兩岸的風光的確是很愛人的，時節是春天，又是風雨之後晴朗的清晨，



黃浦江中的淡黃色的水，像海鷗一樣的遊船，漾着青翠的柳波的一望無際的大陸，真是一幅活的荷蘭畫家的風景畫。幾年來所渴望着的故鄉，所焦想着的愛人，畢竟是可以使人的靈魂得到慰安的處所，靠在船圍上呈着一種恍惚的狀態很想跳進那愛人的懷裏——黃浦江的江心裏去。但這個幻覺不一刻便要像滿盛着葡萄酒的玻璃杯碰在一個岩石上來了。

船愈朝前進，水愈見混濁，天空愈見昏濛起來。楊樹浦一帶的工場中的作業聲，煤烟，汽笛，起重機，香烟廣告，接客先生……中世紀的風景畫，一轉瞬間便改變成爲未來派。假使那些工場是中國人主宰，那面未來派的畫幅是中國人畫出來的，又或者是自己不是生在中國的人，或者也未嘗不可以陶醉一下摩登的風物。然而不幸的是我自己和那在岸上活動着的和乞丐相差不遠的苦力兄弟



們是同屬於所謂黃帝的子孫，神明之遺裔！那時候我還沒有階級意識，我只有民族意識，看見自己的同胞在異族的皮鞭之下呻吟着的，除非是那些異族的走狗，誰也不能夠再閉着眼睛做夢。美好的風景畫被異族塗炭了！

到了上海了。這兒我雖然是再度的劉郎，但勝於是初到了外國的一樣。那時候的上海女人正流行着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短到肘拐以上，流行着長大的毛線披肩，披在肩頭上可像反穿着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却又有極長的袖口，長得快要驢過膝頭。那些長袖男，短袖女，一個個帶着一個營養不良栖栖遑遑的面孔，在街頭竄來竄去。在古語的“走肉行屍”中令人感受一種新鮮的感覺。街上跑着的汽車，電車，黃包車，貨車，怎麼也好像是一些靈柩一樣。我的不值錢的眼淚，在這時候率性又以不同的意義流瀉了出來。



我隨着仿吾和他所送的友人家眷坐在馬車上先到了一家公館。那公館是誰的，是在甚麼地方，我不知道，後來我也沒有問過仿吾。在那公館裏面吃了一會茶，不記得又是取的怎樣的路徑，同仿吾兩人到了馬霍路的泰東書局的編輯所。到了編輯所，昏昏濛濛地會過一些人，談過一些話，那時的詳情我已不能記憶了，只是記得自己感覺沒有着落。我們從一些人的話中，知道了所謂改組編輯部的事情原來才是一場空話。擔任法學主任的李鳳亭已經任了安慶法政學校的教職，擔任哲學主任的李石岑還是在編輯着學燈和民鐸，聽說不久有人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的消息。仿吾所當擔任的文學主任却自來有一位姓王的人擔任着的，那姓王的人也十分高興地歡迎我們，說是他得了很好的兩個助手。這樣一來，在我倒是出於自動，沒有甚麼，在仿吾要算是等於落進了一個騙局。



到了編輯所已經四五天，仿吾的任務依然沒有決定，我自己也沒找着出路。仿吾是領了歸國路費的，他那時還有餘錢，便在四月八號約着我去遊西湖。

遊西湖時的心境和經過，我有“西湖遊紀”的幾首詩留存了下來；仿吾的一首長詩“由長沙寄沫若”也敘述到了這件事情的追憶。

去時我們乘的是晚車，到南站時，天上有赤色的晚霞，有大而明朗的長庚星出在西邊，由車頭上冒出的蒸氣在那紅色晚景中映成紫色。我那時候在思念着我離別了八年的母親，同時又在擔心着留在日本的妻兒。火車是由南而北的奔跑，我的心思是在東西的緯線上梭織。我們坐的是二等車，車上有幾個中國人，好像是上海的政客，帶着了兩名伎女在一枝角上，大事吃嗑。在中國的火車上沒有特設的食堂中，就在客車中便可以叫番菜嗑酒。那



幾位先生一面和伎女開着玩笑，一面牛飲着皮酒，男的女的都在吸香菸，吸得一個車箱都是昏天黑地的。把酒菜吃嗑了之後，他們又打起撲克起來，又鬧又笑，特別是那兩位伎女鬧得厲害。同在車上的有好幾個西洋人，都沉默着在拿着一些文件校閱，在他們心目中似乎除掉自己之外，沒有身外的世界。又有幾位日本人在高談闊論，時而帶着極輕蔑的眼光望着那一羣吃喝賭博着的中國人取笑。因為我和仿吾都穿的是日本帝大的制服，他們大約是把我們當成日本人去了，有的遠遠用眼睛來向我們示意。我的不值錢的眼淚，在這裏又湧了起來。我憤恨的自然是我們中國的貴同胞太不爭氣，同時是連想到中國的政局，中國全體的局面，以及在國際上的形勢都是那個樣子：車中的情景便是時局的一幅縮寫圖，凡是自己不能夠抱一個伎女在懷裏的中國人，想來是誰都會痛哭流涕的。



到杭州時是半夜，我們投宿在清泰旅館裏——這座旅館我不妨在這兒給它登一個廣告：但我恐怕現在已經是沒有的了。進了旅館使我第一件感着驚異的是杭州的清靜，連那穿長衫戴京帽的茶房都很斯文，就好像那兒的小學教員一樣。

第二天清早起來，吃了早飯之後，便去遊湖。我們在杭州那時是沒有熟人的，只買了一份地圖來做鄉導，決定沿着湖的西南岸走去先遊雷峯塔。這個路向便是一個頂外行的路向，在圖上看來不很長的一段湖岸，走起來却是費了半天的工夫，而那一段湖岸在西湖是最沒趣味的一段。並且我們的沒有經驗還鬧了一個小小的笑話，我們不知道在西湖裏面只要有錢隨處都是可以吃嗑的，我們照着日本的“遠足”式的辦法，備辦了一些乾糧。我們所備辦的乾糧又有些特別，我們因為“素心饅頭”的名目別致，又聽茶房說有甚麼“素鷄”，“素火



腿”。以爲那冠在頭上的素字是清潔的意思，便拿了兩塊大洋叫茶房替我們置辦；於是一個人一塊錢的乾糧便是荷葉兩大包。挾着兩個大荷葉包子走了半天的路，真真是再別致也沒有的西湖遊，但有火腿和鷄肉在手中可以犒勞，倒也不覺得有怎樣的厭煩。走到雷峯塔，正是所謂“日午當空塔影圓”的時候，兩個人都感覺着口渴，而同時肚子也有點餓了。於是在塔下的草地上坐下，把荷葉包子解開，把那“三素”來賞心。誰知所謂“素心饅頭”才是甚麼內囊也沒有的麵包，所謂“素鷄”“素火腿”才是一些豆腐皮。“三素”嚼在口裏，倒也沒有怎樣的難吃，只是愈嚼愈見口乾，嚼不上半個饅頭，怎麼也難吞下喉去，只得又把荷葉來包好了。

在雷峯塔下停着有一隻湖船，船中的矮桌上放着一個茶壺，那誘引我們把沿湖走路的計畫拋棄了。我們坐上了船，把船家的那壺冷茶傾向肚子



裏，比吃了兩大杯冰淇淋蘇打水的還要快意。船家把我們搖到北岸，在湖濱公園近處的一家小館裏吃了中飯，我們把我們的“三素”送給船家去了。

在西湖北岸遊了一下，參拜了一些英雄英雄的墳墓，沒感着多大趣味地便折回了旅館去。

第三天逛了一回孤山，遇着了一番微雨，雨中的西湖很給與人一種寂靜的感覺。回頭又到湖濱公園去過，遇着了幾位畫畫的女子，想來怕是杭州女子師範的學生。

“un dane!”我這樣用日本話對仿吾說。

“un da!”仿吾也回應了我一聲。

我在這兒對不住我們那天看見過的幾位女同胞，要把這個隱語解說一下。這是日本學生所慣用的隱語，un 字是由德文的 unshoen 省略下來的，意思便是不美。反過來遇着好看的女人時便說一個 shoen，但這德文的 shoen 字正確的發音



當如中國的“薰”字，日本人沒有這個音，他們所發出的聲音都像中國的“香”字。

杭州在一下過雨之後，街頭的道路就和黃海一樣。兩位初到西湖的外國回來的學生，在西湖裏費了兩天工夫，到第四天上來便遇着那黃海樣的杭州，把所有的迷戀都打斷了，便怱怱忙忙地又折回上海去。就那樣我們也說是去遊過西湖的人，也做了些遊西湖的詩，西湖的好處連邊際都沒有摸到。

6

仿吾在東京接到的信上是說聘請他當文學主任，月薪一百元。但他到了編輯所已經半個月，沒有給他聘書，也沒有說上月薪的話。那書店的老板趙南公——其實趙南公並不是泰東書局的老板，那書局是政學系的人辦的，趙南公只是經理，後來政學系的幾個分子成了“大人物”，沒有再管書局的事，那書局於是乎便成爲了宋朝的江山——看見了我的商品價值還不壞，他便把我一同留下，但我也始終沒有接過他的聘書，始終沒有正式地受過他的薪水。仿吾在上海住了兩三個禮拜，看見那



書局情形沒有容納下我們兩人的地位，他便決心回長沙，把上海的事情留給我辦。仿吾說，長沙有一座兵工廠，廠長是東大的同學，他到那兒是有事可做的。

在仿吾去後的我，住在德福里中，更好像飄流到孤島上的魯濱孫一樣了。那位姓王的大編輯聽說是天津的什麼學堂的出身，身上穿的是西裝，手中拿的是一根打狗棒，腳上穿的是一雙響鞋。他的脚步好像羚羊一樣，走得很快，與其說走甯可說是在跳的那樣程度。他每天起床得很遲，一起床便在樓上高叫茶房打水。吃飯，差不多沒有一次不聽他吵菜不好的。每天上半天要到某女塾去教英文，去上課時總愛塗一臉的雪花膏，打一身的香水。他那雙響鞋由樓上響出大門，出了大門還可以聽見好一段的聲響。當他回來的時候也是一樣，在大門外好遠便聽見他的響鞋聲，大門如是關着的時候，



總要用他的打狗棍來在門環上打得滿響。一進門之後又是“茶房呵，水呀！”的叫起來了。他那枝打狗棍，和樓梯的欄杆是很有仇恨的，無論他是上樓或下樓，那棍子總要在欄杆頭上出氣。先生的專長是英文，一部歸化了日本的一位外國人原名爲 Lafcadio Hearn，日本名爲小泉八雲（Koizumi Yakumo）的文學概論，便是他的寶典。他一高興時便捧着朗誦。誦讀倦了又進房間去按按一架 Baby-organ（囡囡風琴）。再不然便拉長腳在床上宰予起來。編輯所裏的人對於這位先生都有點不高興，特別是那位每天要被他叫打好幾次水的以廚房而兼茶房的司務尤其恨他，當面叫他是王先生，背面便叫他是“亡八蛋”。爲要更具體地表現他的憤恨時，他愛把右拳來加在左膊上歪着嘴做出一種哭聲，據說那王先生初來上海時便中了梅毒，被一位不高明的醫生打六零六號把手膊打腫了，



睡了一個禮拜。

我是和八蛋先生同住在一間屋子裏的，因此我也很感覺着不便。我們在日本讀過書的人，有一種不好的習慣，便是在嘈雜的地方不能用功，那八蛋先生的英文朗誦和囹囹風琴的獨奏，尤其是使我痛頭的資料。但因為他是主任，我是食客，我也不好干犯他的自由，每當他在編輯所裏的時候，我使用毛巾把頭包着，把兩隻耳朵遮蓋起來，別人問我是否頭痛，我也就答應是頭痛。

在編輯所裏面有一位四川人鄧均吾，這要算是我在馬霍路遇着的一粒砂金。他很年青，在當時怕只有二十三四的光景，但他的態度極其冷靜，就像是一個冷靜的結晶體一樣。他沒有喜怒哀樂表現出來，但一眼看來便可知道他不是呆子，也決不是胸有城府的人。他本是由吳芳吉的推荐，出來任上海某女學的英文教員的，在他未到上海之前暫



時由那八蛋先生替他代理着。但等他到了上海，那代庖的先生才霸佔了別人的位置不肯退還，他樂得也就給我一樣，滯在編輯所裏當了幾個月的食客了。這件事情也是使我憎恨那八蛋先生的重要的原因。

八蛋先生當時在編輯着一種雜誌叫着“新的小說”，是白話文流行時的一種應時的刊物。在初似乎也還銷了一些，但到後來西洋鏡拆穿了，已經遭了一般讀者的唾棄。書局方面聽說我們要出純文藝的刊物，便有意思要我主編，我已經替它改了一個名字叫着“新曉”。但那八蛋先生却仍然把持着不肯放手，我也就讓他去主持，我自己做起我自己的事情來了。

我開始是編纂了我的詩集“女神”，其次是改譯了那本“茵夢湖”。“茵夢湖”的共譯者是我的同學，那小說的初稿是他譯成的。他對於五四以後的



中國的新體文沒有經驗，他的初譯是採用舊時的平話小說體的筆調，譯成了一種解說的體裁，失掉了原作的風格。因此我便全盤給他改譯了，我用的是直譯體，有些地方因為牽就初譯的原故，有時也流為意譯，但那全書的格調我覺得是沒有損壞的。我能夠把那篇小說改譯出來，要多謝我遊過西湖的那番經驗，我是靠着我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夢湖”的情趣再現了出來的。

那時候上海灘上正是舊書新式標點流行着的時候，亞東標點了紅樓夢水滸等書很風行一時，秦東看了眼紅也想照辦，我便勸他們標點“元曲”。這個提議立地也就見諸實行起來，但把那位八蛋先生却苦着了，他把那詞曲中的文句標點不斷。我自己為填塞提議的責任起見，照着西洋歌劇的形式改竄了一部“西廂”。這項工作在當時已經很不滿意，現在想起來是尤其無聊，並且可惜了那部缺了



一册的明刊本，那和金聖嘆批本的內容大有不同，却被我把它塗毀了。

在這兒我應該追溯到我們和文學研究會發生糾葛的起源。

就在我同仿吾回上海的時候，文學研究會的鄭振鐸也由北京到了上海。那時也就是文學研究會由醞釀期向實行期突進的時候。

我的西湖紀遊的那幾首詩，是在學燈上發表過的。因此便有好些已知未知的朋友知道我回了國，振鐸也就是其中的一人了。振鐸的名字我是在時事新報上時時見到的，共學社的出版預告裏面有他的名字，學燈裏也常見他的名字。我記得1920年的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中，文藝欄的四個人是周作人，魯迅，郭沫若，鄭振鐸的順序。魯迅的是“髮的故事”，我的是“棠棣之花”，周鄭二位的是



翻譯，內容我不記得了。在我們由西湖回滬之後的不幾天，接着振鐸寫來的一封信，約我在一天禮拜日在半淞園會面。

仿吾在這時候才告訴了我一件事情。

原來振鐸他們在要發起文學研究會的時候，有一封信寄到東京田壽昌處，約他和我加入。這封信壽昌沒有轉寄給我，同時也沒有答覆，就在這兒種下了一個與文學研究會未曾合作的因子。那封信仿吾是在壽昌處看見的，他那時說過壽昌很多不是，那樣的消息都沒通知我一聲。

半淞園的方向，在我初到上海的人，自然還不知道，是趙南公的兒子送我到西門，由西門改換中國電車坐到了那兒的園門口。在那兒遇着了振鐸，沈雁冰，和編輯着時事新報的青光欄的柯一岑。一岑和李石岑到馬霍路來看過我，他是認得我的，我和振鐸雁冰算是初次見面了。



見了面彼此都很慇懃，特別是振鐸，他和我談話的機會最多。我記得他穿的是一件舊了的雞血紅的華絲葛的馬褂，下面是愛國布的長衫。他的面貌很有些希臘人的風味，但那時好像沒有洗臉的一樣，帶着一層暗暮的色彩。他伸出來和我握手的手指，就和小學生的手一樣，有很多的墨跡。那時候我覺得他很真率，當得德國人說的 *Unschuldig*，日本人說的“無邪氣”。

雁冰所給我的第一印象却不很好，他穿的是青布馬褂，竺布長衫，那時似乎在守制的光景。他的人矮小，面孔也纖細而蒼白，帶着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背是微微弓着的，頭是微微埋着的。和人談話的時候，總愛把眼睛白眨起來，把視線越過眼鏡框的上緣來看你。聲音也帶着些尖銳的調子。因此我總覺得他好像一隻耗子——我在這兒要特別加上一番注腳，我這只是寫的實感，並沒有包含罵



人的意思在裏面。

柯一岑的印象沒有甚麼特別可說的，我只記得他的面孔平板，嘴唇微微往上翹，有點朝鮮人的風味，只是沒有朝鮮人所共有的那種可憐的茫沒的情況。他穿的是青哩嘰的學生裝，我聽雁冰稱之為“勞動服”。

三個人將近玩了一天，中飯是在園子裏面用的，是振鐸付的錢。吃飯的地方是在一個臨池的亭子上，因為是禮拜，在園子裏還有好些人在用中餐。飯後我同振鐸坐在那臨池的欄杆上，望着池裏的敗荷梗。

“我們不久要在時事新報上出一種文學週刊”，振鐸對我說，“希望你能夠合作。”

“我已經看見過你們登出的廣告，”我回答他，“我自然是要盡力的幫助。”

“你率性加入我們的組織不好嗎？”



“沒有甚麼不好的，只是我聽說你們最初發起文學研究會的時候，寫過信給田壽昌，並邀我同加入發起人之列。……”

“是的，有那麼一封信，那時沒有得到你們的回信。”

“那信我並沒有看見，壽昌沒把信給我看。他沒答覆你們，想來他怕是沒有合作的意思。現在我又來加入，覺得對不住朋友，好像賣了壽昌的一樣。所以我看最好是在會外來幫助你們了。”

“好的，總之請你幫助好了。”

當天談的話自然很多，在園子裏遊玩了好些辰光，還在園外的田野中逍遙過好一會，一面走着，一面暢談，但那臨欄的一節話要算是那天的談話的核心，那一節話我也記得最為明晰。在田野裏盤遊到了天色行將就暮的時候，一岑要到報館裏去，雁冰也好像有別的事情，我們便同坐電車到



西門，在那兒握手告別。一岑在臨走的時候說過這一句話，“你今天很會有一些詩產生出來啦，”但不幸那天的遊興我却沒有紀在詩裏。

振鐸看我不熟習上海的路徑，怕我走錯路，他從西門還陪我坐了好一節的電車，坐到一處很繁華的十字街口，他陪我下了車，指示着和乘來的電車道成正交的路線對我說，“你乘那一路的電車往西首走，走不好遠便是新世界，新世界前面左手邊上有一個大跑馬場，在那跑馬場門口的電車站上下車，便是馬霍路口了。”

他送我下車的地方就是先施公司前面，浙江路和大馬路成正交的那個十字口，這自然是後來才知道的。那時我很感謝他的慇懃，但我不知道他那時是不是已經住在閘北，如是已經住在閘北，那他乘浙江路的電車也正是必由之路，他和我同了一節路也不必就是專於爲我了。不過他的確是陪



我下過車，他那時候的厚情，我始終是懷着謝意的。

竣後振鐸也還到馬霍路來過幾次。有一次是同着葉聖陶來的，是在晚上。振鐸把聖陶介紹了，聖陶捧着我的手，十分懇切地說了好些話。但可惜振鐸向我介紹時，我沒聽得明晰，聖陶的蘇州腔，我連百分之十都沒有聽懂。我待他們走了之後，才問編輯所裏的人，那位王主任吃驚不小地向我說：

“那便是鼎鼎大名的葉聖陶，你不認識嗎！？”

我聽見是聖陶，也很後悔，覺得自己太木訥，沒有盡量地多多談些傾心的話。聖陶的小說，我最初是在青光欄內讀過他的“他與她”，覺得他的筆致是很清楚的，雖然並不深刻。

我自從那次以後便沒有和聖陶見過面，他留在我腦裏的第一印象，³是矮小而樸質的和藹可親



的，一位青年。

又有一次，振鐸是同着朱謙之來的，那時似乎還有李石岑同路。是到編輯所來商量謙之的“革命哲學”的出版。那時我同趙南公正坐在天井裏面吃茶。他們來了，起初是只和趙南公談話，我沉默着坐在一邊，謙之也是沉默着。我看他怕只有二十歲的光景，穿一件毛藍布大衫，一雙圓頭的布鞋，頭髮最異樣，那周圍的毛邊是剃光了的，就像在頭上頂着一頂圓形的氈帽。振鐸代他說，他的“革命哲學”在商務不好出版，問過別家書店，也都不敢承印。要望泰東替他印行。

南公沒說二句話便答應了下來，回過頭請他們和我商議。到這時候，謙之才知道了我是郭沫若，他從椅子上一跳而起，跳到我的面前，一雙手把我的手抓着。



“沫若，呵，你是沫若！”

他那一雙有些可怕的眼睛就像要迸出火來的一樣。

在五四以後，凡是從事於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陣營裏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樣，這樣相親愛相敬慕的程度，不是個中人是絕難想像得到的。

謙之聽說我是住在秦東，他也就決定把行李搬來同住，等到他的“革命哲學”之出版。

就在謙之住在秦東的時候（是七八月之交），振鐸也到馬霍路來過好幾次。他那時在編輯學燈，在“女神”出版時，那首序詩他曾替我發表過，同時也發表過那集子中所未曾發表的一兩首。我有一次還做過一首兒歌，也蒙他拿去發表過的。（這首詩我沒有保存下來，意思是孩子要到海邊去，孩子的媽媽不讓他去，孩子望他海外的爹爹趕快回來，帶他到海上去玩耍。不消說是我思念自己的兒子，



託爲兒童的情緒所做出來的。)又有一次，我把王維的“竹裏館”那首絕詩寫在紙上：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這是我從前最喜歡的一首詩，喜歡它全不矜持，全不費力地寫出了一種極幽邃的世界，我從前是很愛把這首詩來暗誦。振鐸看見了這首詩，他以爲是我做的，他這樣地問過我：

“你還在做舊詩嗎？”

在初回上海的時候，少年中國學會的左舜生也到馬霍路來過。那時少年中國學會另外出了一種雜誌，叫着“少年世界”，要出一期“日本研究號”，向我徵文，我早做了一篇“日本之煤鐵問題”寄去。因爲那篇文章不很滿意。我便寫了一封信去，請把原稿退還。左舜生便親自到了馬霍路來。來時是在



晚上，他告訴我少年世界雜誌已經印好了，不日便可出版，那篇文章不好再抽出了。

同時又談到了些別的事情。

“聽說你們要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啦。”他這樣說着，使我很是驚異，因為這個我們還不會對國內的人說過的消息，怎麼他會知道了。他又說，“壽昌在二月間有信來，託我在找出版處，我也奔走了幾家，中華書局不肯印，亞東也不肯印；大約商務也怕是不肯印的。”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仿吾們在東京開第三次會議時，為甚麼壽昌沒有出席，以及找出版處的事件之所以沒有下文的原故。

自己留在上海的使命是要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這是始終在腦子裏盤旋着的一件事情。“新曉”既由那位八蛋先生把持着了，我的意思便是在“新



曉”之外另出一種刊物，這層是得到了趙南公的同意的。當時我也暗暗地感謝趙南公，因為我聽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話，像那時的未成形的創造社，要想出雜誌，在上海灘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秦東來承印，這當然是可以感謝的事情。但我一個人留在上海，周圍同住的沒有一個可以幫助我的人，雖有一位鄧均吾，但他的能力也是很薄弱的。仿吾回長沙後連信都少有寄來，在日本東西二京的一些朋友，通一次信來回至少要兩個禮拜。起初要主編“新曉”，寫信給各地的朋友，得到同意時，局面又已經變了。就這樣我滯在上海由四月初間達到六月中旬，雜誌的事情沒有弄出一個眉目。我便想到無論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須得去巡訪各地方的朋友們，定出一些具體的辦法，雜誌用甚麼名字，是定期還是不定期，定期時期限的長短，每人可擔負的稿件的分量，這些都是應該商量



的問題。於是我在七月初旬便決定再往日本。

這次我往日本的來往路費，是趙南公送我的，他送了我一百塊錢，還送了我的老婆一隻金鐲，是買成四十三塊袁頭。這一百四十三塊錢就算是我在編輯所裏住了三個月，編譯了三四本書的報酬了。但當時的“流氓痞棍”性似乎還沒十足，領了那點錢我覺得似乎還多領了的一樣。

7

離別了三個月，首先是回到福岡。我留在福岡的妻兒是被家主驅逐出了從前的舊居的，新遷的地方離舊居不遠，但我是不知道那個所在的。我走到舊居近處問以前相識的鄰里，問明了地址，又才案照着去探尋。原來新遷的住居是在箱崎町的街道上，背着海岸，和海岸相隔還有兩三家漁家。後面有一方空地，有新的木板牆圍着。我先隔着那木板牆看見大的一個兒子和孫，一個人孤另另地坐在那空地當中掘土。頭上的頭髮很長，好像是自從我走後不曾剪過髮的光景。就單只這樣的一個情



景已經就使我的眼淚流了出來。我又轉到街頭的前門去，前門才是鎖着的。我也並沒有甚麼驚異：因為我想到安那一定是揣着第二個兒子出外去買東西去了。我在門口佇立着不一忽，安那果然揣着孩子買了些小菜回來。她看見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為我走得很倉卒，臨行時我是沒有通知她的。

新居是平屋，結構和舊居的樓下相同，可說就是舊居削去了樓層的那樣。我們本來是沒有什麼家具的，我的一些書籍又已經運回了上海，看起來真真是家徒四壁。這些不消說又是催人眼淚的資料了。

我那“淚浪”的一首詩，被已故的“詩哲”罵我是“假人”，罵我的眼淚“就和女人的眼淚一樣不值錢”的那首詩，便是在這一天領着大的一個兒子出去理髮時做的。我們繞道在以前的舊居處纏綿了



一會。那兒還沒住人，僅僅有兩三個木匠司務在那兒修繕。我也就走進去，在那樓上眺望了一回，那時候的眼淚真是賤，種種的往事一齊襲來，便又逼得“淚浪滔滔”了。

我回福岡僅僅住了一天，第二天便動身往京都。在車上過了一夜，到京都時已經是第三天的上午了。我先到三高去訪問伯奇。他那時正在試驗，我在會客室裏坐了好一會才等到他出來。他和我雖通過很久的信，但是初次見面，他信上寫的字跡異常纖細，就像姑娘們的筆跡一樣，那知一看見他才是一個矩形的面孔，身裁比我還高，我覺得他可以稱爲東方的奧登堡。伯奇對我也一樣地感覺着一種意外，他領着我去找一位舊同學李閃亭時，他這樣對我說：“從信上得來的想像和實際的印象又不同，文學的要素是不免有誇張的啦。”因爲我做過“死的誘惑”那一類的詩，我寫給他的信上也每



多悲哀的話頭，因此在他的想像中以爲我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肺結核沒到三期，怕至少是到了二期的。

伯奇在試驗。我便不好攪擾他，便在李閃亭的寓裏住下。這李閃亭是岡山六高的舊同學，進的是京大的經濟科，要算是河上肇的弟子。在岡山時我們同住過兩年，因為他是第一部，我們常常叫他是“曼大林”（Mandarin 中國官僚），他很高興。進了京大，京都的同學們又稱他爲“中國馬克思”了。但這位“中國馬克思”到頭還成爲了“曼大林”，他後來是孤軍派的中國青年黨的一員健將，做過長沙法政學校的校長，1927年客死在上海的。

我暫時寄寓在“中國馬克思”的寓裏，不幸我得了急性腸加達兒，那天整個的下午不能行動。那時我對於馬克思學說還是門外，夜間我同“中國馬



克思”並枕睡着的時候，我扣問過他，馬克思學說的精髓究竟是怎樣？他對我說了些“唯物史觀的公式”，說了些“資本主義的必然的崩潰”，又說了些“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得似乎並不怎樣地摸捉着精髓，我聽得也就千真萬確地沒有摸捉着頭腦。他勸我讀河上肇的個人雜誌“社會問題研究”，我在當時並沒感覺着怎樣的必要，他這個勸誘，我並沒有立地照辦。

第二天病算好了一些，我應着張鳳舉的招待，到他寓所裏去茶話。我同閃亭去時，鳳舉又到近處去把當時在京大研究着的沈尹默先生請了來。沈先生那時候怕將近五十歲了，他帶着一付茶片眼鏡，眼睛好像很不好。臉色很蒼白。那蒼白的臉色配着茶片的眼鏡，怎麼也好像是日本的一位按摩。

鳳舉替我介紹了，說起我們要在上海辦一種純文藝雜誌的意思。



沈先生的第一聲是“上海灘上是談不上甚麼文藝的。”

我聽見了這一聲，微微地感覺着一種驚異，我不知道爲甚麼在上海灘上便不可以談文藝。文藝究竟是該在甚麼地方談？揣想沈先生的意思自然是舍北京而外沒有甚麼地方說得上的，這一層也就引起了我的一種反抗心。北京我從前也是到過的，我覺得像那樣暮氣沉沉的地方倒未見得配談文藝。我這些話自然沒有說出口來，我覺得說是多事——其實照現在看來，就是那樣的作想也已經是多事了。沈先生所說的文藝是大學教授的文藝，講研究要唐鈔宋刻，講做作要古月荒城，這自然是以北京爲宜，上海灘上是說不上的。這兒有一個階段不同的階級意識，就如貴族們之鄙視資產家一樣，北京城的文士每鄙視“上海灘上的詩人”。這種思想，明白地說，就是封建思想。北京城是中國的



封建社會之結穴，蟠居在這座古城裏的大人君子或準大人君子，要想超克這種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話一不投機，結果是把雜誌的說話丟在一邊去了。談了些京大所藏的中國古書，談上了元曲。我發表了我的中國劇曲在文學構成上優於西洋歌劇的意見，鳳舉說他沒有研究，沒有加以贊否。沈先生也是沉默着的。鳳舉又說到廚川白村（京大的文學教授）稱讚過我那首“死的誘惑”，——因為大阪的新聞翻譯過——說是中國的詩已經表現出了那種近代的情調，很是難得。我聽了這話，其實並不知道他是在稱讚，還是在蔑視。

談不好一會，便同閃亭從鳳舉那兒退出。那時京大附近的飯堂很多，都是以學生為對象的。用中飯時，在飯堂裏遇着了伯奇，那天的下半年伯奇陪着我去訪問過一次穆木天。木天那時是三高的二年生，他是在專門研究童話的，一屋子裏都堆的是



童話的書。我覺得他自己就好像是童話中的人物。他人矮，而微微有點胖，圓都圓的一個臉有點像黃色的番茄（tomato）。他見人便是笑謎謎的，把眼睛眯成一線，因此把他那豐滿的前額和突出的兩個臉墩便畫成了兩部分，他特別像番茄的地方也就在那兒。他是吉林人，愛用捲舌音的他的北方話的聲音也特別是幫助了他的天真爛漫。我覺得他的姓穆而名叫木天，真是名也名得好，姓也姓得好。那時聽說他是參加了周作人先生的“新村”的，我也覺得像他這樣童話式的人也恰好和“新村”相配的一樣。

伯奇那天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訪問廚川白村，我却是謝絕了。我這人，用我們四川話來說，怎麼也是有點“不帶貴”。不知怎的，我總有點怕見上人。凡是所謂大人名士，我總是有點怕。外國的大人名士不用說，就連吾們貴國的我都是只好退避。



三舍的。在這些地方或者也就是不能受人抬舉，十年如一日地只當着“流氓痞棍”的原因的罷。

到了第三天，我覺得在京都想會面的人，已都會了面，雖然所想討論的事情並沒有說上，但已覺得無可再逗留的一樣。我便決意再往東京。閃亭，已故的“中國馬克思”，勸我到晚上乘夜車去，他說那樣要方便一些，到東京時是清早，省得許多麻煩。我聽從了他的話，他便陪我去遊過一天琵琶湖，京都近旁的一個大湖。那湖的規模比西湖大，水也比西湖深，有小的蒸汽船在裏面通行。湖畔也有好些古刹。有所謂“近江八景”是仿照着“西湖八景”所擬定的，到過西湖的日本人有的說是比西湖還好，但這個比喻似乎有點不倫。因為西湖的好處是在它的小巧玲瓏，就像規模放大的庭園；琵琶湖那樣宏闊的大湖，是沒有這種風味的。

在琵琶湖遊了一天，晚間在大津市乘車東上。



坐在夜車裏，自己不免又把雜誌的事情來縈想着。怕是只有出季刊的可能的，能夠寄稿的人至多不上十人，又多是有學校纏着，而且散處在四方。一年要出四期，怕已經很費事的。季刊用甚麼名目呢？誇張一點的便是“創造”，謙遜一點的可以命名為“辛夷”，名目太誇大了，要求實質相副，是很費力的。書局方面拿不出稿費來，這是一件很大的困難。……這些都是在縈想中的問題，但想來想去總沒有着落，最大的希望是到東京後，要靠幾位有力的友人來決定。

到了東京，先走到達夫的下宿處去看時，他得了病，進病院去了。我又跑到病院裏去看他，是駿河台的杏雲病院。

我和達夫已經五年不見了，在未見面之前只疑他的病很沉重，我在想像中描畫着我那位本來是很瘦削的友人怕已經是骨瘦如柴的了；他那蒼



白而又帶着一層暗灰色的面孔，怕已經是面如土色的了。但一進病室時，他是坐在病床上的，帶着紅紅的臉色。

他見了我，便立起身要和我握手，我急忙勸他安靜着沒動。我問他是甚麼病，他說是胃病，但我同時懷疑起來，爲甚麼得了胃病就要進病院呢？我疑心他是肺病，他不肯說出實話。

我那天談了一天。並陪他去登臨過一次在病院附近的舊俄羅斯教會的尼哥拉斯圓堂——這是東京的名物，在大地震時已經毀滅了。他住的病室似乎是頭等，在一間前室中擺着一尊鋼絲床，一隻角上有洗面池等的設備。隣接着的後室是三鋪席面的日本式的小房間，是看護婦或患者家族們的寢處。我那晚便是在那兒的草席上睡的，同時還有兩個看護婦睡在我的左右兩邊。——這樣一寫出來，好像是很風流的一種境遇，達夫在第二天清早



也說過些風流的話頭，但其實我就和睡在豬圈裏的一樣。那兩位看護婦，有一位可真像是一條白肥豬，她那一雙肥白的手各個手指節都呈着眼窠；又有一位好像是腎臟有甚麼病患的光景，面孔上帶着偻促的暗灰色，並且有點浮腫。達夫有一篇小說叫“友情和胃病”的，便是寫的那時的事情，那位密斯(?)白肥豬被我們達夫先生描寫成了楊貴妃一樣的。

達夫很熱心，他所講的主要的話，是他明天或後天便要退院，退院之後他便要創作了。他已經做成了三篇東西，便是“沉淪”，“南遷”，“銀灰色的死”，他打算要拿來出一個集子，退院之後便要寄給我。並說他的“銀灰色的死”寄往學燈已經四五個月還沒發表出來，叫我回上海之後給他要回。雜誌的名目他贊成用“創造”，月刊季刊都不論，每次他可以担任一兩萬字的文章。



我看見他這種熱情，覺得到東京的目的是已經達到了的一樣。他能否在一兩天之內退院還是未知數，資平他們都還有試驗，不好多費他們的辰光，在東京方面的事情我便要他做個中心，退院之後把大家召集起來商議一下；最好督促着大家在暑假之內努力做些文章，好使雜誌在年內或來年的正月出版。他和田壽昌那時還不十分熟習，我在東京該做的事情便只有去訪問壽昌了。

第二天適逢是禮拜，清早在病院中和達夫離別了，便往東京郊外去訪問壽昌。壽昌住的地方就是仿吾從前住過的月印精舍。那個地方，我起初以為是僧寮或者道院，原來只是幾個留學生共同組織的“貸家”。壽昌和他的漱瑜是特別住在一間小房間裏的。他們那時的戀愛已經是在所謂“純潔的”以上了。他們同住的人在精舍裏面養了一些雞，我到了，在吃中飯時便蒙他們殺了一隻雞來款



待我。午後壽昌約過去會佐藤春夫，我謝絕了。又約我去會秋田雨雀，我也謝絕了。不拜訪名人的我的“不帶貴”的脾氣在壽昌面前又來發揮了一下，其實我所拜訪的壽昌，在那時候已經是名人了的。他那時雖然還是高等師範的學生，但那兒的學課他已經老早沒有去上了。只是他說晚間要引我到銀座去領略些咖啡店情調，這倒是對於我的一個很大的誘惑。

我在 1914 年初到東京來的時候，預備入學試驗的最初半年住在小石川的偏僻地方，我不曾到銀座過一次。在一高預科的一年是青年矜持期的絕頂，不說銀座的咖啡店，便連淺草的電影館都沒去過。以後便分派到鄉下去了，在暑假期中雖然偶爾有到東京的時候，但像那銀座的咖啡店，實在是受了禁制的樂園。“咖啡店情調”！這是多麼誘惑人的一個名詞嚟！我聽說那兒有交響曲般的混



成酒，有混成酒般的交響曲，有年青侍女的紅脣，那紅脣上有眼不可見的吸盤在等待着你的交吻，在等待着用另一種醇酒來使你陶醉，那兒是色香聲聞味觸的混成世界，在那兒能夠使你的耳視目聽，使你的脣舌掛在眉尖，使你的五蘊皆充，也使你的五蘊皆空。這樣的一種仙境能得深有研究的壽昌來做鄉導，這真是我到東京來的一種意外的收穫了。

咖啡店情調要到晚間才能領略，午後壽昌引着我在代代木松林盤桓，追憶到了一年以前的千里松原內的散步和大宰府的遨遊。他談到了漱瑜最近和他鬧過一次閒氣。他說他和“康月昭姐”——這位女士據說是廣東人，壽昌是這樣稱呼她的——太親密了，漱瑜有一次便對他說要和他分離，免得成爲了他和月昭姐兩人的交誼之障礙。他說漱瑜是在摹倣歐洲某一位作家的戲劇裏面的女



主人公，可惜這位某作家的名字忘記了，我的貧弱的外國文學的智識，也沒有這個典故的儲藏。

好容易到了晚上，吃了晚飯後，漱瑜說要到某姐處，叫我們等她回來之後再往銀座。這個禮節自然是應該遵守的。不一會漱瑜回來了，壽昌先走去迎接她，他們好一會都沒有進來，我也走去看時，看見漱瑜坐在門道上帶着一個很不愉快的臉色。

“怎的？生了病嗎？”我問她。

“是的，我肚痛。”

“最好是趕快休息的好了。”

這樣一來所謂咖啡店情調已經飛到別一個太陽系統裏去了。

第二天漱瑜的病算好了，她和其它同住的人都去上課去了之後，那時候有一種表現派的電影叫“格里格里博士”，在神田某戲館開演，是不可不看的，壽昌留着我定要把這場戲劇看了再回福岡。



他和我兩人便坐在電車進東京市去。起初是倍着他到上野，因為他要去會一位美術學校的朋友。那朋友是住在一家臨着背街的樓房上的，下面好像是汽車行，走到了那兒時，壽昌在樓下叫了一聲：

“老王，在家嗎？”

“是老田嗎？你上來。”從那樓上有湖南人的聲音回答出。

壽昌叫我在下面等着，他跑上樓去了。剛好上去又跑了下來，又叫我走。我們在上野公園裏逛了一下，快到吃中飯時候，他又拉我到本鄉去會他的一位“劇友”。

原來那位“劇友”就是屠模，本是我在岡山的同學，但不幸我們在岡山時，為了一些小事是有點不和睦的。他是武進的人，有演劇的天才，壽昌和他的交際便是由演劇而來。他在帝大學植物學，但他那時正在熱心製造香水，進了他的房間，一房都



是香氣，隨處都是香水瓶。中飯是在他那裏用的。用了中飯之後他要去上課，我們又才分了手。

壽昌又拉着我走，在大學前面的街道上，就給兩個夢遊患者一樣走來走去，進過好幾家舊書店，在幾家書店店頭也立讀過一些雜誌，不知幾時已經走到了萬世橋。是電影快開演的時候了，我主張坐電車去。兩人上了電車，我拿出一張五圓的老頭票來買電車票，車長找不起，我的零錢，却又不夠，坐下一站路，車長又把我們放下車來，意思是讓我們把錢換了再坐電車。我到這時候才知道我們的壽昌是囊空如洗，他是連坐電車的零錢都沒有的。我這個太不聰明的腦筋，也才悟到了在早他爲甚麼要到上野去會那位“老王”，爲甚麼到中飯時又去找屠模，爲甚麼幾次不坐電車。說不定昨天晚上漱瑜說是去會某姐，也怕是去借錢，因爲錢莫借到，所以才肚痛了起來，讓我們的咖啡店情調也就成爲



了畫餅。腦筋太遲鈍的人，就是在享樂上都是沒有資格的，我假如早悟到了他們是沒錢，我自己雖然也窮，但還有從書店老板那兒領來的路費，一小時的咖啡店情調或者是可以領略的，可惜我就在那一次把機會失掉了，自有生以來一直到現在終還不曾把我們的“咖啡店情調”領略過一次。——我這樣寫來倒不是要誇示我是一位道學先生，也並不是想否認我之為“流氓痞棍”，不過我這個“流氓痞棍”諉實是一位胆小的家伙，凡是沒有經驗的地方，我是沒有膽量一個人去走的。自然在這兒也有一種東西在說話，那種東西多的便是膽量十足的人，那種東西一缺乏不怕就是想要以“咖啡店情調”來款待我的壽昌，反因我而得到一番夢遊患者的經驗。

那場“格里格里博士”的影戲，所描寫的是一種狂人的心理。開首是瘋人病院的場面，是現實的



情景。接着是那院裏的兩個患者在談話的光景，以下便是夢幻境了。

德國的某一個都市有一對青年同愛着一位姑娘，在一次的節日，他們三人同往市中觀看種種的遊樂。有一位格里格里博士利用着一位夢遊患者在市上營利，說是能夠判斷人的吉兇禍福。那兩位男子和他們的共同的愛人也就進了那位博士的齋館。館裏是一座小小的戲場佈置，正面一段高壇上立着一個細長的木匣。壇下圍着座席，觀光的人已經坐滿了。停不一會那格里格里博士走了出來，字幕上表現出了他的說話，就是說他要向着看官們開示他的能知人吉兇禍福的夢遊患者。他把木匣揭開，裏面立着一個人，就和乾槁了的屍首一樣，眼睛閉着的。博士向看官們發問，有沒有人要扣問自己的吉兇。那對男子中的一個便要立起身來，幾次都被他的友人和愛人拉着了，但他終於是立起



了身來。他問的是知不知他幾時會死。在這時候那博士讓那夢遊患者把眼睛睜開來，那眼睛徐徐地睜開，睜得璧圓，放出一種可怕的兇光，直射着那問者的面孔。患者的口奇怪地動了幾下，字幕上表現的是：“你呀，你今晚就要死！”說了又把眼睛閉了。

三位愛人大笑了起來便各自退了席。那料得那質問者的一位在那天晚上就了寢之後就由那格里格里博士的夢遊患者潛去暗殺了。另一個男子揣想到是那位遊方博士在作怪，便要替他報仇，經了幾多轉折，得到了一些實證，便率領着人去逮捕。博士和夢遊患者逃跑了起來，他們緊緊地追趕着他們，便追進了最先現出來的那座瘋人病院裏。銀幕上又是現實的景象了。一些狂人仍在那病院的中庭遊散，有一個像死屍一樣的人閉着眼睛立在一邊，便是那位夢遊患者；又有一個女的患者像垂着眼簾的白蜡觀音一樣，是那兩位男子所共愛



的一個愛人；格里格里博士是那兒的院長；不用說談出這番幻想出來的人也是患者中的一個。

走出影戲館時滿街都已經上着電燈了。壽昌問我再到咖啡店去不，我却也早已經回到了現實界來，只是買了一些西洋點心，促着他趕快回去安慰他的漱瑜去了。

跑到東京，混混沌沌地便過了三天，到第四天清早又和壽昌告了別，我是決定轉回福岡去了。因為想買幾本書，便又打算跑到東大前面的書店裏去漁獵。坐在電車裏自己覺得真是無聊，跑到東京來了一趟，也就和在京都混了幾天的一樣，真是空洞。自己也會了一些朋友，但好像所當解決的問題，一個都沒有得到解決。朋友們自然大家都在答應要做文章，但那不是和幾個月以前未回國時的情形是一樣嗎？未知數依然還是未知數，X 依然還



是X，問題是沒有進展得一步的。想到達夫說要退院，覺得最可靠的還是只有他，他的寓所本就在東大附近，我便決心再往他那兒去探望一次。

他果然是在我會見了他之後的第三天退院的，我再在他的寓所見面時，他已經在做他的“友情和胃病”了。

這一次的重逢才會見了好些朋友。會見了資平和何畏，是別的東大同學們在學校裏把他們找了來的。無心之間也會見了徐祖正，他在我到京都的時候，已到了東京，那時好像是和達夫同住一個館子裏。就在那天的下午，在達夫的房間裏聚談了一次，大家的意思也都贊成用“創造”的名目，暫出季刊，將來能力充足時再用別的形式，出版的時期愈早愈好，創刊號的材料，就在暑假期中準備起來。這個會議或者可以說是創造社的正式成立，時候是1921年七月初旬，日期是那一天我不記得了。

8

到日本去往返了一次，費了三個禮拜的光景，在七月中旬又跑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之後很不愉快的是“新曉”的預告中登出了我的名字。那位主任先生乘着我不在的時候，把我鎖好了的書案的抽箱打開了來——因為他和我的書案是相同的形式，鑰匙也是相同，把我的兩篇舊稿取出了。一篇是我早已譯就的葛雷的“墓畔哀吟”，另一篇是名叫“Love Lane”的隨筆。Love Lane 是靜安寺路上的一個小巷，離馬霍路不遠，華名用的是那幾個字，我不記得了。那個名



字在那時候我覺得很有詩意，地方也很幽邃，直譯出來便是“情人弄”或“愛情弄”。我住在馬霍路時，在晚間每愛到那兒去散步；每次總要遇着好幾對逍遙着的西洋人的男女，大約都是些“情人”。我自己的“情人”呢？時常是我自己的影子，那篇隨筆便寫的那種情趣，那原稿後來是失掉了。

八蛋先生不得到我的許可，便任意開揭我的抽箱，攫取我的文字，把我來做他所編的“新曉”的幌子，這是使我大不愉快的。編輯所裏的人都勸我登報聲明，於是在學燈的一角上，在我回滬的第二天便有我的啓事。啓事也並沒揭明，只是說有人假借我的名義在外面招搖而已。這樣含糊的文字自然有爲它注釋的活着的脚，上海雖大，大家也就曉得我爲的是那“新曉”的事情了。到這時候那太聰明了的書店老板才知道了我和那八蛋先生是不能合作的。他見了啓事便跑到書店裏來，談了些和衷



共濟的話。有人向他談到了私揭抽箱的一件，他拿着也就沒有辦法了。“新曉”停辦的話似乎就是在這個時候說出來的，他說以後便不出“新曉”，專出“創造”。

從那時以後書店老板便把對於他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他遇着人便在罵他，罵他編纂了三個月連一本小雜誌都編纂不出；罵他太不負責任，做出了些對不住人的事情。這樣一來弄得那主任先生的響鞋，響得愈見焦燥，但是臉上的雪花膏却少塗了，香水也少打了。有一天清早，他還睡在床的時候，有一位娘姨跑到編輯所裏來叫醒了。他。

“王先生，太太叫把這架風琴拿回去。”那個囡囡便被她抱下了樓，坐着黃包車走了。

原來那架風琴是P公館的東西。P是組織泰東書局的一個人，家眷住在上海。有一位成了人的女公子在學英文，編輯主任由書店老板的介紹在担



任着那兒的家庭教師。風琴是從那兒借來的。P家對待西賓似乎很有體節，往常每每有雞鴨和清蒸鼈魚之類的食品送到編輯所裏來。大家都稱王先生爲未來的駙馬，王先生亦隱隱以此自命。囹圄風琴一被搬走之後，於是乎駙馬公的希望也就隨着朵奶孀向空中消逝了。用所謂春秋的筆法來說，或許這一段姻緣是由我拆散了的，但是當年的那位密司P，假如看見了我這篇文章，她就和我們的“創造”沒有被“新曉”污辱的一樣，我倒要請她多謝我的。

這時候文學研究會的人又來提起過加入的事情。在七月中他們要在上海開一次大會，在開會之前的兩三天，李石岑寫了一封信給我，傳述振鐸他們的意思，要我加入文學研究會，並限我在一天之內答覆。（有人說過就像是袁的美頓書。）石岑那時已經進了商務編譯所，學燈是讓振鐸在編纂的，他不消說也是加入了研究會。但他的提議，我却以同



樣的理由拒絕了。

暑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和我同住在編輯所裏。他蒐集來的資料是王獨清由法國寄來的一首長詩名叫“支那”，和一部“新月集”的翻譯。“支那”似乎是恢鐵曼派，但對不住我們的“情調詩人”，我在原稿中便替他毀棄了。“新月”却替“支那”報仇，叫我流了好幾斗汗水。“支那”既不能採用，伯奇礙在他們的友誼上，始終要叫我賞玩“新月”；於是乎在那上海市上的100°F以上的炎熱之下替他渲染起來。那部“新月”除掉一些單語單字外真可以說一鉤“新月”。

當年的上海市的確是炎熱得不堪，有時候熱到了一百度以上。坐在那馬霍路的樓上就使一事不做，也像麵包烤在烘爐裏，汗水不斷地迸出。但是在吃別人的飯自不能不努力地做點事情，倒是做着事情反可以把炎熱忘記。那時候我在開始翻



譯“少年維特之煩惱”，伯奇在翻譯“盧森堡之一夜”。伯奇是從法文翻譯出的，那書在描寫性的一方面很有些露骨的地方，英譯本大概都替作者刪削了。伯奇爲此頗受礙難，我勸他全譯，但顧慮着世評，或者也怕是顧慮着他們“少年中國學會”的同人的指摘，終於把原文刪節了好些。

號稱爲編輯所的地方，絲毫組織也是沒有的。本是一所二樓二底的弄堂房子，樓下做了堆棧，五六個人通雜住在樓上。做工·會客·睡覺·在那兒是三位一體。中國人的客，有事來商量的很少，無事來消遣的很多。客一來總是高談闊論，起碼總要坐上兩個鐘頭。編輯所裏有五六個人，平均每人一天作算有一個來客，你一天的工夫便要整個地替你費掉。在這種環境之中譯事是很不容易進行的，創作的機會更是沒有，本是有燥性狂的煩悶者在上海不免又煩悶起來了。因此我們便有拿着工作暫



時到鄉下去做的計畫。就在七月的下旬，我們便到過一次鎮江。

我們先去遊了金山，登過那金山寺的塔。塔是木造的，塗着紅色。塔下的進門鎖着，要繳若干錢，和尚才來替你打開。登上塔去的眺望當然是一個壯觀，可惜我的記憶已經完全消逝了，我只記得塔壁上縱橫狼藉地有無數的題名，也有些西洋人的題名雜在裏面。

焦山是有定期的小蒸汽船往還的。坐船上了焦山，一山都是寺院，那些寺院的和尚就和四馬路上的野雞一樣，專門在做拉客的生意。我們是初到，自然是外行，在開始走進的一個寺院裏便投入了他的羅網。大和尚拿了些茶點來款待我們，又展示了那寺裏所藏的寺寶。他聽說我們是來避暑的，便愈見慫恿起來，我們要到山上去遊玩，他便遣了一個“小童”來跟着我們。他所稱的“小童”其實是和



魯智深相差不遠的巨漢，任隨我們走到那兒，那漢子都在我的後面跟隨着。各個寺院都是有所謂“寺寶”，看了便要你出錢。我們兩個寶貝看過的“寺寶”也很不少，但只有焦山寺的“無惠鼎”還留在我的記憶裏，連“瘞鶴銘”的所在我都是模糊影響了。

漢子又把我們引回了他的寺院，那兒已經替我們預備下了一桌很豐滿的素菜，和上海的素菜館子功德林的上等席面相差不遠。菜雖號素，用的通是暹名，而且還爲我們備下了一些“素酒”。我們見了，不是酒的事，只是愁的事了。我們不知道這一席的款待究竟是要我們付多少錢。我們一面用素餐充着飢腸，一面用日本話訴着愁腸，我很感覺着焦山這個名目到不媿是座焦山。把飯吃完了之後，結果是拿十塊硬洋來抵塞，故意用了硬洋的也是因爲十塊硬洋比一張十元鈔票來得更更有實感。但是那大和尚倒還客氣，他說我們施舍得太多了。



這一句話真是天來的佛音，才把我們從焦愁解脫了。我就是到現在也還不知道，究竟那十塊錢是給得太多，還是給得太少。假使是少了，而能使那大和尚不說話的，怕或者是我們的日本話奏了功效，那禿頭大師怕一定把我們當成了帝國主義者了。

但是，十塊大洋！這在大和尚看來或者不會多，而在我窮小子却不算少，我帶去想在鄉下住一個月的費用已經用了三分之一。焦山，避暑，還是滾他媽到阿鼻地獄裏去罷！不用說我們就在那天也就退回了鎮江。

遊了一次焦山，花了十幾塊大洋，換來的是在這兒再寫幾行賣錢的文章。

焦山的北面，峙立在江岸上的是北固山，那山上有有名的甘露寺。我們遊了金焦二山之後北固山沒有再去了。但我想起了小時候讀過的一首唐詩，便是王灣的“次北固山下”。那開首兩句是：



“客路青山下，行舟綠水前。”

這青山綠水的幾個字隔了二十幾年才使我感受了驚異。我想在唐時的北固山上或許會有一些林木，而揚子江裏面的紅水斷不會是綠化的了。大約那位王灣先生也是一位大天才，大創作家，他在夜裏泊舟，並沒看見山，也沒看見水，只是按照着自己腦筋中的觀念做出了那篇傑作；不然他或者便是一位紅綠盲，不能辨別水色，也不能辨別山色，只沿用着通常的習慣語，言水必冠以綠，言山必冠以青。

由鎮江折轉到無錫。我們要到無錫的，是因為住在那兒的朱謙之寫過一封信來，說那兒的惠泉山有希臘的風味，比西湖還好。我們聽了他的話便也到了那兒的惠泉山，那兒的確是有“希臘的風味”，並且不是古典的希臘，而是現代的希臘。山是一座童山，山下叢集着一些頹廢的節孝祠，謙之和



他的朋友們便是住在一座節孝祠裏面的，那兒倒還好，比西湖還好的好處，便是可以少花錢。我們到的時候，謙之已經到了南京，便由他的朋友們招待我們，我們也在那家節孝祠的一間樓房裏住下了。

那間樓房擺設着有兩尊木板床和一張方桌，平常像是做泥人的匠人住的地方，隣接的空廠的樓房裏沿着樓壁還陳列着好些未上彩色的泥人。匠人們是回去了的，爲甚回去了的原故，在當時我也聽人說出過一般理由，但我已經沒有記憶了。我想或者怕是各處的商場被西洋囡囡佔領了的原故。樓房頭上直接露着瓦頂，白天很是可以納暑，晚來蚊蟲的大軍逼着我們只好在帳子裏面過籠城生活。就這樣在那兒住了有一個禮拜的光景，工作絲毫也不能做，並連逼在近旁的太湖都不曾去過，又只好“逃之天天”了。



逃回上海之後，仍然還是住在馬霍路的樓上。但在我避暑去了的期間中，有一位尊客來訪問過我。那便是商務印書館的元老之一人高夢旦先生。夢旦先生來訪問我，這個異數的光降，就好像漢光武訪問嚴子陵，或者是像亞烈山得大王訪問皮匠，把編輯所裏的人都震驚了。特別受了驚惶的是書局的老板趙南公，在我回到編輯所時，南公老板來看我，他說夢旦一定是想找我進商務的編譯所的。他同時也向我提出了一個消息，是安慶法政學校的校長光明甫給他寫了一封信來，請他代聘一位英文教習，月薪是每月二百塊大洋。他的意思是要我去擔任，遙領着他的編輯。但我這個不識抬舉的天生成的“流氓痞棍”，却沒有膽量去拿那一筆大錢。我自己自然也是學過英文的人，但我的英文僅僅能夠看書，除掉參攷着日本文或者德文的譯本也勉強能夠繙譯繙譯之外，要講說幾句“不落肯的



因革利徐”，我連上海的茶房都還趕不上。錢自然又何嘗不想拿，但恐怕上了課堂立地便會被學生哄掉。我這位胆小的“痞棍”在那時候才推薦了達夫，因為達夫的英文程度的確是比我高明，他那時還是東大的三年生，學的是法制經濟，學那種工課的人平常是可以不必上課的，只要在試驗之前把別人鈔的講義借來或買來——日本的苦學生多有鈔講義來發賣的人——準備一下，試驗便可以無事的渡過去。達夫先生的頭腦很好，我相信他有這樣的本領，所以便推薦了他。我並且說，達夫來也可以遙領泰東的編輯所，比起我來是更要拿手的。

我在當時已經是在準備退路了。住在日本的時候，就像要發狂的一樣想跑回中國，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學校的國文教員也自誓可以心滿意足的我，跑回上海來前後住了三四個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裏的一樣，又在煩燥着想離開中國了。我



深切地感覺着我自己沒有創作的天才，住在國內也不能創作——已經三四個月了，所謂純文藝的雜誌仍然沒有一點眉目弄出。像我這樣沒有本領的人，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筆吃飯養家似乎是太僭分了妄想。因此我又想到還是繼續我的醫學的安全些，世間有很多不怕死的病人，吃飯想來大約是不會成爲問題的。

南公聽見我說達夫可以遙領編輯所的話，他很詫異。“怎麼樣？”他這樣問我，“你是打算進商務嗎？”

“笑話！你未免神經過敏！我是打算暑假過後折回日本的。”

“爲甚麼呢？剛剛架着步勢，爲甚麼就走呢？”

“不行，在上海不能創作。”

“到鄉下去怎樣呢？”

“鄉下也是一樣，這次跑到鎮江和無錫去，花



掉了幾十塊錢，得到的便是這樣的一個教訓。”

“我在這樣想，想把編輯所移到西湖，讓你在西湖去做文章，跑印刷和管校對的人就留在上海。你看這個計畫怎麼樣？”

我在心裏笑了一下，趙南公在他的煙癮過足之後本來是很可以想些妙計的，但在我以為妙的，少有看見過他實行，而他所實行着的我却是很感不妙。我住在他的編輯所裏，差不多是在唱獨腳戲，跑印刷所，管校對，差不多都是我一個人在攪。“哼，他要把我移到西湖，”我在心裏這樣想着，但我對他說，“西湖還是一樣。西湖我同仿吾也到過一次，終竟是不能安定的。中國沒有可以使我們安定的地方，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感覺着頹敗，感覺着厭迫。”

“怎麼樣呢？雜誌呢？”

“自然要辦，唯其要辦，所以我才要折回日本。



我在那兒多少還可以做些文章，同時有達夫先生回來兼顧，你是可以不用愁的。”

“把你的日本夫人和公子們接回來怎樣呢？”

周到的南公老板想到了這一層，他定然是以爲我的性慾不能發洩，所以才想回日本去。用佛樂依德派的精神分析術講來，一切的煩燥都是由於性慾的不滿足，那我們的老板倒很可以算得是一位精神分析術的大家。但他却沒有想到我一個人白吃着他的飯，好像是奴隸，又好像不是奴隸，已經是有點難耐了。

“他們回來是愈見使我累贅的。總之，達夫很好，只要他肯回來，那便甚麼都不會成問題。”

談這些話的時候是在八月中旬的上午。我們就在那天決定了去請郁達夫回來，先由我寫了一封信徵求他的同意。高夢旦先生那兒我却摹倣了一次孔二先生的辦法，便是“陽貨歸孔子蒸豚，孔



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我聽說夢旦先生白天是在商務編譯所裏的，我便跑到他的公館裏去投了一張回拜的名片。但在這兒我要聲明一句，我並不是比夢旦先生爲陽貨，比我自己爲孔丘，只是我自己的怕見上人的怪癖使我取了這樣一個滑頭的辦法罷了。

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裏面本來是有好些同學在那兒做工的，如像鄭心南（貞文）先生，周頌久（昌壽）先生，何公敢先生，在當時的薪水雖然沒有歐美留學生的多，但在實際上已經是不可缺少的中堅人物，他們每肯到馬霍路來看我，我也時而到閘北去訪問他們。有一次我不記得是因爲什麼事體，到商務編譯所裏去會我的那幾位同學。那時候夢旦先生正在隣室裏會客，他聽見同學們在和我談話，便特別跑過來和我見了一次面。那老先生的態度異常誠懇，人很魁梧，聲音很宏朗，神彩於質



樸之中帶着精幹的氣味，我一看見了他，便覺得和我父親的面貌很相彷彿。那天他說到他日前來訪我的意思，是他有一位姪子得了腎結核症，想到福岡醫大去就醫，要想扣問我些那邊的情形。我是談到我不久要轉回福岡的話，夢旦先生便決定了讓我回福岡之後再送他的姪子渡日，好託我照料。

大約是帶着爲我餞行的意思罷，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岡的前幾天，夢旦先生下了一通請帖來在四馬路上的一家番菜館子裏請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適博士，第二名便是區區，還有幾位不認識的人，商務編譯所的幾位同學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伯奇那天愁他沒有衣裳穿，他便穿了我在上海用兩塊半錢縫就的一套佛蘭絨的西裝，我是穿的夏布長衫。這要算是我們自有生以來的最大光榮的一天，和我們貴國的最大的名士見面，但可惜我這個流氓，竟把那樣光榮的日期



•

都忘記了。

那時胡適大博士受了商務印書館的聘，聽說就是夢旦先生親自到北京敦請來的，正在計畫着改組商務編譯所的大計畫。大博士進大書店，在當時的報紙上早就喧傳過一時。我聽說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間愛去散步的那 Love Lane 的第一號，是商務印書館特別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頭大馬車由公館裏跑向闡北去辦事的。這樣煊赫的紅人，我們能夠和他共席，是怎樣的光榮呀！這光榮實在太大，就好像連自己都要紅化了一樣。

博士到得很遲，因為凡是名脚總是在最後登台的。——光榮到絕頂的是，他穿的也是夏布長衫。他那尖削的面孔，中等大的身裁，我們在那兒的像片上早是看見過的，只是他那滿面的春風好像使那滿樓的電氣風扇都掉轉了一個方向。夢旦



先生和我們介紹着，他慇懃地和我們握手。

夢旦先生說，“這是沫若先生，我們沫若先生很有遠大的志向，不久還要折回日本去繼續學業。”

我臉上的肉不免麻了一下。

“很好的，”這是博士先生的第一聲，這三個字好像是他的習慣語，我以後便聽見過他說過無數次，“很好的，我們就等郭先生畢了業之後再作商量了。”

在“商量”之上冠了一個“再”字，自然是爲我的事情已經是商量過的。商務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嗎？老實說，在上海的書業界上做事情，除掉商務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更好的地方，這點智識我早是有的。假如在我和泰東發生關係之前，商務早有找我的意思，那我不費俄頃的遲疑，或許早就是唯命是聽的；但我不幸的是一回國後，便和泰東發生



了一種關係，發生了一種主奴的關係。我要想“朝高枝飛”嗎？這個行爲是 something like “革命”的。

在博士和我握手的時候，何公敢這樣說：“你們兩位新詩人第一次見面。”

博士接着說道，“要我們郭先生才是真是的新，我的要算舊了，是不是啦？”

他這樣的一問，我沒有摩準確是怎樣的意思，但至少是感覺着受着了一種要求，便是要求我談出一句客氣的話，這話却沒有立地構想得出，我只含糊地笑了一下。

就席的時候，夢旦先生並沒照着西洋的禮節，他是坐在那長餐桌上手一邊的正中，胡博士坐在他的左手，我是坐在他的右手。博士時時隔着夢旦先生和我打話，在席終用茶點的時候，夢旦先生率性把我讓在了他的左手去，和博士並坐了起來。談的話很零碎，我現在也只能零碎的記得一些。



博士說過，“我們的朋友陶孟和的夫人最近把海涅的詩選譯了，將來要作為世界叢書的一冊出版的，她把那首‘Du bist ein[e] Blum[e]’譯得真好。”

我聽了他說出這一番話，才知道博士先生也懂得一些德文。但他的德文發音好像很有點“不落肯”。

他又告訴我：“某君（這位先生的名字恕我忘記了）譯了 Drinkwater 的“林肯”，不久便可以出版，那部戲劇寫得異常之好，把古事寫得和新事一樣。”

他回頭又問我：“你近來有甚麼新作沒有呢？”

那時候“學藝雜誌”上正在發表着我的一篇未完成的戲劇“蘇武與李陵”的序幕，我便問他看過沒有，正打算說出我要做那篇戲劇的大旨和細節時，他已經插斷了我說：“你在做舊東西，我是不好



怎樣批評的。”

此外還談了些事情，我無庸縷述了。但我在這兒要敘述一件我們的大博士對於我的一件小小的奉仕（service）。我那時候也在吸香菸，在電氣風扇之下擦了幾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過去，順手又取了一個酒杯來打橫，把左手的拇指和無名指挾着酒杯邊，食指和中指挾着火柴匣，那樣酒杯便成了一個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我也着實地佩服着他：究竟不愧是我們的博士！

散席的時候，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國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

9

安慶學堂的事情，達夫早有回信來願意擔任，便給他匯了些路費去，他是九月初頭上回來的。他回來之後有四五天的光景，我又轉回日本。這一次泰東送了我一張二等客艙的船票，另外又送了我六十塊錢。我動身的一天，朋友們把我送到匯山碼頭上船。送行的有達夫，伯奇，均吾，還有一位新認識的朋友畢瑞生。

上了船在二等客艙的食堂裏開了幾瓶啤酒來飲御送行的朋友，但待我一要搜錢包來付賬的時候，我的錢包不知道幾時已經被扒手扒去了。真是



要命，急得我這個背時倒兆的“流氓痞棍”幾乎流出了眼淚來。我那錢包裏面不消說泰東送我的六十塊錢是放在裏面的，另外還有上海的朋友託我到日本去買醫書的一百塊錢。足足的一百六十塊錢就那樣便無翼而飛了。船又臨着快要拔錨的時候，身上一個錢都沒有，到長崎上了岸便是問題。在這時候我才知道朋友是可多謝的，達夫連忙把他的錢包搜了出來，傾了五十塊錢給我；畢瑞生也儘他身上所有的搜了二十七塊錢出來。這些錢在後來雖是由泰東抽出來還了的，但在那咄嗟的時候，全不顧慮到自己而能傾囊相助的友人，不是很可以感謝的嗎？

我離開上海的時候不用說把上海的事情是移交了給達夫。伯奇因為有別的事情留在上海，他可比我遲得兩個禮拜。他留在上海的期間，一切的事情自然也可以和達夫商量。但他們兩人的勇氣的



確是比我十足。在我回到福岡之後，第一次送來的上海報上便登載着“創造季刊”的預告，計算起日期來，就在離開上海後的第三天。預告上說着季刊準于明年元旦出版，並說得有在十幾年之後都還使我們的魯迅先生不能忘記的有人壟斷文壇的一類話。那一方面使我佩服着我們達夫的勇氣，同時也使我感覺着分外的不安。我在上海滯了將近半年連不敢登出的預告，達夫接事僅僅三天，便把它登揭出來了。旗鼓一聲張了便不能不有實質來相副，我始終是感覺着我們同人們的力量實在並不充足。還有那“壟斷文壇”的話，我也覺得打草驚蛇，而且不免有些誇張；因為那時候的中國那裏有甚麼“文壇”？更那裏說得上甚麼“壟斷”？但把“壟斷文壇”的字樣一揭出來，於是文學研究會的朋友們便居然“壇”起來，而且也“斷”起來了。

回到了福岡，自然是繼續學業。醫科大學的課



程，頭兩年是基礎科學，後兩年是臨床科學。基礎科學的畢業試驗本在第二年年末舉行，但我當時沒有受，更跑回上海去了；要繼續學業便不能不補受試驗，因而我的時間便不能不為試驗準備而花費。但我從上海回來時還帶了好幾件工作。第一件是替穆木天修改那部王爾德的“童話集”，第二件是譯完“少年維特之煩惱”，第三件便是準備“創造季刊”的文章。這些工作我是在試驗準備和學課的餘暇中完成了的。還有那被扒手扒去了的那一百塊錢的買書費，算我自己是學醫的人，我把我自己的醫書拿了好些來抵充了。

“創造季刊”既已預告着在明年的正月一號出版，發稿至遲便當得在十二月以前。那第一期的稿件，除達夫的那篇“茫茫夜”之外，通是我集成的。我在十一月以前已經陸續把稿件集齊交給了達夫，只期待着到了正月一號便可以如期出版，但不料



第一期便愆了期，愆期的原因就是等達夫的那篇茫茫夜。達夫是心雄萬夫的人，如在一種刊物中，他自己的文章不能壓卷，他是不肯苟且的。他到二三月間才把稿子發出，發了稿之後便回到日本受畢業試驗，那第一期自然沒有經過他的勘校和指點，一直遲到五月一號才出了版。產生出來的結果倒還馬馬虎虎的可以過去，單是“茫茫夜”的一篇已經是拍案驚奇的大文字了。但是那排版的拙劣，校對的荒疏，在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刊物中怕要算是留着了一個紀錄。有一位熱心朋友替我們統計過，那“創造季刊”的創刊號錯誤在二千以上；還有同時出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錯誤在五百以上。

因為校對荒疏的關係，同時還惹起了一件小小的悲喜劇，便是田壽昌的抗議了。壽昌在第一期中發表了那篇“咖啡店之一夜”，使我們在紙上領略了一番“咖啡店情調”。他的原稿先是寄給我，由



我轉寄上海的。他沒用原稿紙，只是在隨便的紙頭上乘着自己的興趣揮寫出的，筆下的龍蛇已經飛舞得有點駭人，他那時做文章還沿着舊時刊物的習慣，凡有得意的文句要在字旁加以密圈胖點，因而是愈加滿紙的雲煙。那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草稿，塗抹添改不消說是很不少的，而他在紙上又是寫着兩面。我最初接到他的原稿時已經就在担心，怕一定弄不出好的結果。結果果然是不出所料，他的那篇文章錯處最多。壽昌在這兒便生了一個疑心，他疑達夫改竄了他的原稿，有意要陷落他，傷毀他在國內的名譽。他很嚴厲地叫我替他把原稿索回，要在別的刊物上再行發表，他說他可發表文章的地方很多。我是相信達夫決不做那樣卑劣的事體的，我把達夫不曾經過勘校的情形告訴了他，又告訴了他秦東的校對素來是荒謬絕倫，勸他不要疑心朋友，即使真有怎樣的改竄時，待我在暑假



期中回國去檢查原稿，查明之後再作理論。當時算好，壽昌聽信了我的話便沒有急切地和達夫絕裂。並且他還把在第二期所當發表的“午飯之前”寄給了我。

六月尾上學校放了暑假，泰東給我寄了一百塊錢的路費來，我在暑假期中便又回到上海。最先是在馬霍路的樓上把“創造季刊”第一期和“少年維特之煩惱”來校勘了一遍；壽昌的原稿自然是還保留着的，結果是證明了他的多疑。從那原稿上除掉為保持雜誌的統一上把那密圈胖點刪除了之外，絲毫也沒有更易。原稿我寄還了壽昌，他的疑團也就冰釋了。

回到上海最感受着驚異的是鄧均吾的進步。去年在上海同住時，只覺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的英文還好，對於舊式的詩詞也是有些教養的人，我走的時候曾經把我所有的一本英譯的“海涅



詩集”送給了他。隔了一年回來，看他把那“海涅詩集”已經讀得爛熟；他自己還寫了一冊新詩稿，他交給我時；他那詩品的清醇在我當時所曾接觸過的任誰那一位新詩人的新詩之上。在“創造季刊”二期和三期上所發表了的“白鷗吟”以及其它，便是經過我替他挑選過的作品。

因為馬霍路的狹隘的樓上又添了南公老板的兩位親眷，他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便頂下了一家一樓一底的房子來。我回上海不一個禮拜的光景，便搬到那兒去了。那兒比馬霍路要清靜得一些，起初是一個人住着，也覺得很舒適，我不久便把“創造季刊”的第二期編出了。

就在我移到民厚南里之後沒兩天，高夢旦先生和鄭心南同學又來訪問過我一次，適逢其會我又不在寓裏。那時候商務的編譯所已經改組成四部，心南在担任理化部的主任，何公敢在担任庶務



部的主任，凡是稿件上的交涉都是由公敢經手的。不久公敢也來談及，他說夢旦的意思是叫他和我訂下一個契約，凡是我的著譯可不經審查，售稿時著作千字五元，翻譯千字四元，據說這在商務印書館是最高的價格。公敢又說，這種優待是對於我的一種報酬：因為去年夢旦託過我為他的姪子調查過醫院的事情；但他的令姪在未能渡日之前是已在滬上病沒了的。我當時覺得自己並沒有怎樣盡力，沒有資格受這樣隆重的報酬；同時也覺得還沒有售稿的必要，所以把這項契約只在口頭聽了一番，並沒有寫在紙上。

達夫在春間把東大的畢業試驗通過了之後，早又回到了安慶服務，他利用着暑假也到上海來了，他便和我同住在民厚南里裏面。那時候肯到寓所裏來的有張聞天吳明汪馥泉諸人，他們當時似乎住在民厚北里，差不多每天都要來一次，來時談



話的對象多是達夫，和我是少有交涉的。文學研究會的詩人朱自清也來過一兩次，他完全像一位鄉先生，從他的手裏能寫出一些清新的詩，我覺得有些詫異。他那右側的顛頂部有一個很大的禿了髮的瘡痕，可更助長了他的鄉先生的風味。

在那時候文學研究會的人和我們已經是有些隔閡了。發起時的勸誘經了壽昌的不置答覆，去年夏間勸了我兩次參入，又經了我的謝絕，“創造季刊”出預告時又由達夫暗射了他們“壟斷文壇”的話，於是乎在不知不覺之間便結起了仇怨。“文學旬刊”上早就有好些文章在嘲罵我們，例如罵頽廢派的“肉慾描寫者”便是指郁達夫：罵“盲目的翻譯者”便是指我和壽昌。“創造季刊”出版之後更蒙沈雁冰以郎損的筆名加了一次酷評，所謂文學研究會是人生派，創造社是藝術派，頽廢派，便一時甚囂且塵上了起來。我們的刊物因為是季刊，又因為大



家都不住在上海，因此對於別人的攻擊，只有隱受的一途。但我們終竟還年青，一回到上海來，便逼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就在那樣的情形之下有達夫的“血與淚”的那篇小說寫出，那是嘲弄雁冰和振鐸諸人在當時所空吹的“血淚文學”的；我也有“論文學之研究與介紹”和“論國內評壇”的兩篇文章，在正式地和他們交綏。那時又是柯一岑在編輯學燈，達夫和我的文章都是在學燈上發表的。我們當時的主張，在現在批評起來自然是錯誤，但在當時的雁冰和振鐸也不見得有正確的認識。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並沒有根本的不同，所謂人生派與藝術派都只是鬥爭上使用的幌子。雁冰在當時雖有些比較進步的思想，他的思想便不見得和振鐸相同。文學研究會的幾位作家，如像魯迅，冰心，落華生，葉聖陶，王統照，似乎也不見得是一個葫蘆裏面的藥。雁冰在那時能夠同振鐸合作，倒是我們的



一種驚異。所以在我們現在看來，那時候的無聊的對立只是封建社會下培養成的舊式的文人氣習之相輕，更具體的說，便是行幫意識的表現而已。

這種意識，一方面促進了我們對外的抗爭，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我們的內心的哀感。我們感覺着寂寞，感覺着國內的文藝界就和沙漠一樣。有一天晚上似乎是在達夫把“血與淚”寫成之後，我們到四馬路泰東書局的門市部去。趙南公正在過癮，我們在他的房間裏坐了一下，問及“創造季刊”的銷路，他說“初版兩千部，還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這樣的一句話在那時使我們感覺着特別的悲哀。創刊號由五月一號出版已經有兩三個月了，才僅僅銷掉千五百部——其實這在當時已經要算是很好的成績了——我們感覺着同情於我們的人真是少，在那電光輝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我兩個孤另另的人一樣。



“沫若，”達夫叫着，我，“我們去嗑酒去罷！”

“好的，我們去嗑酒。”

兩個人挽着手走出店門，就在四馬路上一連吃了三家酒店。第一次是在一家麵館的樓上，我們嗑了兩壺酒，以後叫添酒菜，怎麼也叫不來，一座大樓上空空洞洞的也只有我們兩個人。把頭伸出樓外一望，那酒店的招燈上的紅字是用白紙貼了的，原來才是有喪事的人家。我們急忙下樓去付了錢，又跑進別一家館子裏去。第二處也因為堂官送來的酒接濟不上，飲了幾壺又衝出去了。最後一家是在那青蓮閣旁邊的一座酒樓上，兩人坐在一張方桌上吃嗑，嗑到酒壺擺滿了一方桌，順次移到鄰接的空桌上去，終於把鄰桌也擺滿了。兩個人怕足足吃了三十幾瓶酒。我們平時是沒有那樣大的酒量的，我就到現在也還有點懷疑，我恐怕嗑到後來的一些瓶數，堂官看見我們嗑醉了一定是作了假



的。有一輪滿月從街頭照進樓來，照着我們桌上的酒瓶的森林。我連說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結果是只有在首陽山上餓死的！”達夫紅着一雙眼睛就像要迸出火來的一樣，可他說過的一些話，我現在通不記憶了。我只記得我們決計請仿吾出來主持社務，便是在那天的席上。

兩人都嗑醉了，踉踉跄跄地彼此將扶着由四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了哈同花園的附近，那兒的靜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許多西洋人坐着汽車兜風的。因為街道僻靜，平坦，而又寬敞，那連續不斷的汽車們就像是在賽跑的一樣。那個情景觸動了我們的民族性，同時也好像觸動了一些流痞性，我們便罵起了西洋人來，罵起了資本家來。達夫突然從側道上跑到街心去，對着從前面跑來的汽車，把手舉起來叫道：“我要用手槍對待！”我連忙去把他



挽着，汽車從我們的身旁取了一個拋物線形跑去了。

雖然和文學研究會的人有些意見，但也並不曾怎樣的絕裂。記得在八月初頭上達夫發起過一次“女神會”，是紀念出版後滿了一週年的我的詩集“女神”，這種會合在日本是常有的，好事的達夫要把它輸入中國。在開會的頭一天晚上，達夫拉着我到閘北去找振鐸，請他們參加。振鐸那時候是一個人住在一層樓房裏，書架上陳列着不少的古書。在深處的一角，一張長條的書桌後面，有圓頂的羅紋帳子罩着一尊小巧的床，那床想來定是單人用的鋼絲床了。振鐸快興地答應了參加，並答應了要多多邀約些文學研究會的同人出席，想借這個機會來組織作家協會。

開會是在晚上，地點是在一品香，文學研究會的同人到的有振鐸，雁冰，謝六逸，和廬隱女士諸



人，日本帝大出身的同學到了不少。那回雁冰先生在席上確是含着敵愾地演說過一次，可是組織協會的事情却沒有提起。席終後在屋頂上還拍過照，但那次的照片我不曾看見過，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10

我對於政治問題發生了一些關心的，是在這個時候。那時商務編譯所裏有一批人，便是後來的“孤軍派”，集合了起來要出一種政治上的刊物。主腦是陳慎侯，此外大多是帝大出身的同學。他們的主張，起初是以“約法”爲中心，主張恢復“約法”以維繫中國的大局。他們說，這種主張是和當時主張“好人政府”的胡適派，主張勞農革命的共產黨成鼎足的。（國民黨當時正走着衰運，他們沒有把它加入。）他們的雜誌本可以在商務出版，因爲不便說話，便託我介紹由泰東刊行，因此我也被視爲了



準同人之例。在他們開會討論的時候，我也列過幾次席。我那時候的智識實在不足以參加他們的討論，我每次都是旁聽，並沒發言；不過我覺得他們的議論總是有點迂闊，他們主張護法，主張裁兵，在當時自然也誰都感着切要，但拿甚麼工具來實現呢？靠一本的雜誌的宣傳，幾個人的主張，要使當時破壞約法的擁着私兵的督軍們覺悟嗎？我對於他們的主張，出馬便有點懷疑，但那裏的同人大都是同學，而且多是專門研究政治經濟的人，特別是那位陳愼侯，我覺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所以我對於他們取的是好意中立。

愼侯是福建人，他在辛亥革命時是福建方面的首義的一個人物，以福建代表的資格參加過南京的參議院。到政權移到了北京，他自己却跑到上海，當了一個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專心在幹他的國語文法和國語整理的工作；他主張把中國通用的



字數限定，限成九千字的光景，就和日本人限定漢字的一樣，那在教育普及的過程上是必經的階段。他的生活很樸素，思想帶着些社會主義的色彩，明確地給他一個估定時，大概是一個社會民主派的光景。他是尊重法，他要以法來維持着國家的機構，在法的維繫之下再進行着社會的改革，以達到將來的“大同”。他是反對個人主義的，因而也就反對戀愛神聖說。因為我翻譯了“少年維特”，那裏便有些神聖戀愛的話頭，在有一次他們的討論會終結了之後便談到了這個問題來。

他說，“戀愛最是自私自利的一種衝動，結局是要把對方佔有。這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根本矛盾的。你是‘願意成爲共產主義者’的人，爲甚麼又主張戀愛神聖呢？”

他這句話實在是把我問窮了的。我自己雖不曾主張過戀愛神聖，但翻譯了歌德的東西，自己便



不覺得要負一番責任，我便取了一種解釋的態度。我說，“凡是我們在戀愛中是要陷到一種無我的態度，假如是文人，在這時候每每有平時想不出的思想可以湧出，平時做不出的文章可以做出，合乎詩人們的所謂神興，所以詩人們便神聖視之。這種感情雖然結局是在佔有，但因兩情相得，反可以增加替社會服務的精神，我覺得在理想的社會之下是不會矛盾的。”

他反對我這種說法，始終強調着那佔有排他的一面，並且說自古的帝王因為戀愛，因為女色而亡國敗家的不計其數，無論怎樣不能認為神聖的感情。特別是年青人，對於這種感情尤當極力的控制。

他的話我不大心服，但我也不能駁他，只是說戀愛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想這樣含糊了事；但他並不肯放鬆。他說：“你既認明戀愛有壞的



一面，那就不能認爲神聖了。”

結果是他佔了勝利，我沒有再說甚麼。我現在想到這個問題，我覺得他的話是對的，他是怕戀愛神聖說一出會使得中國的青年都陶醉於戀愛，把正當的工作拋掉。這是他淑世精神的一端的表現。但我現在可以增加幾句：戀愛和吃飯睡覺是一樣，在人生是一種不能缺少的衝動，用不着神聖視，也用不着罪惡視。飯吃多了要生病，覺睡過了要惰業，戀愛失掉了節度自然也有他的害處。並且理想的戀愛，只有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之下才能夠完成，這也是可以斷言的一個公例。

慎侯就在那年的八月，在“孤軍”尙未出版之前便中了丹毒死了。我當時做過一篇“月光”的短劇來紀念他，那是收在“星空”裏面的。

“孤軍”把主宰失掉了，一時很有中止的形勢，後來在何公敢的領導之下，仍然繼續着出了版；他



們在第一期上請我做過一首歌，便是那首“前進曲”，那後來雖是略略點竄過一下，但大體的意思是照着原樣的。

中國的積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認為是因為沒有近代的國家形體，沒有近代的產業，所以在我們的幼年時代，才有變法維新富國強兵的口號。就在那種種口號之下鬧了幾十年，中國在形式上也算是成了新式的共和國，然而產業仍然不能夠振興，國度仍然不能夠富強，而且愈趨愈下。在這兒大家的解釋又是趨向到唯心的方面，便是說中國民族的墮落，或者是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或者是法制的觀念，國家的觀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門也就趨重在這一方面了。我自己的想法是傾向在革命的，覺得中國的現狀無論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現狀就要採取積極的流血手段。這種想法，在基調上也還是一種唯心的想法，因為是想把中國的惡人



剷除乾淨，自然便會有好的局面出來，這和胡適所主張的好人政府，其實是並無二致。孤軍派主張護法，不贊成用流血手段，他們同時也在反對好人政府的主張，但其實護法的主張也不過替好人政府的主張提出了一個具體的辦法。約法一恢復了，人人能遵守約法，那不就是“好人”嗎？但要主張恢復約法，却怎樣去恢復呢？沒有流血手段可以辦到嗎？

在政治上我雖然有些比較進步的想法，但在文學的活動上和這種想法並未怎樣有機地連絡得起來。“女神”的序詩上，我說“我是一個無產者”，又說“我願意成爲一個共產主義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遊戲，實際上連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的概念都還沒有認識明白。在“棠棣之花”裏面我表示過一些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誅鋤惡人的思想，很濃重地是帶着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色彩。



要主張流血，那先決的條件便是武力的問題。空洞地主張流血的人逢着這個實際上的問題，便沒有方法解決的。他要爲自己解嘲，那空想者便不能不抱着“獨善其身”的態度，而率性高蹈。暑假期中，我在上海譯出了“卷耳集”，暑假過後回到日本又譯出了“魯拜集”，做了一篇“孤竹君之二子”的戲劇，完全就是那種態度的表現。“孤竹君之二子”的那篇東西尤其是帶着虛無主義的色彩，記得是鄧中夏批評過，他希望我少做那一類的文章，多做“棠棣之花”一類的東西，其實兩篇都是一種傾向，只多少有些消極和積極的不同罷了。

日本的資本主義在歐戰期中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但在歐戰過後便遇着了恐慌的危機。重要的原因便是歐洲的資本主義又捲土重來，要在世界商場——很榮幸的事幾乎就是我們貴大中華民國的別名，——繼續他們的經濟戰了。日本產業界中所



必然發生的傾向便是資本的集中，表現在外面的現象便是小資本家的破產，零碎事業的中斷，猖獗的“成金風”之平息。這個現象從在那博多灣的一角上也很鮮明地表現出來了。博多灣中的築港工事中止了，那座像王宮一樣的“抱洋閣”，漸漸蕭條了起來，終至不能經營，在1922年的春間，全部拍賣了。

把抱洋閣買了的是新起的博多灣沿海鐵道會社，買來打算改成公司的辦事所。但在未改造之前，空了有半年的光景，公司是命令了一位技師看守的，但那技師和福岡市上的一位伎女拚上了，兼顧不到抱洋閣來。他便托了一位在抱洋閣附近住着的工頭替他代理。工頭的家和我們的寓所相隔不遠，我們在那箱崎町上住了已經三年，自然是相認識的，逢年過節的時候也時而有些往還。那工頭的老板娘想到自己一家人住在那王宮一樣的抱洋



閣裏，在掃除上要大感困難；同時她的經綸似乎也很不弱，她利用那技師的弱點，便私自把抱洋閣的一部分向我們開放了出來，她請我的女人和他們同住。於是在那暑假前後的幾個月中，那臨海的幾層樓房便成爲了我們的居室。在三年前我在岸上羨慕着樓上的人如天上人一樣的，在三年後的我自己却成了被岸上的遊人所羨慕爲天上的人了。

臨海的第三樓上是六十鋪席面的大房間——這“六十鋪席面”假使日本人聽了立地便要吃一驚的：因爲日本式的房屋通用席面計算，席面的廣袤是有一定的，寬約三尺，長約六尺，普通的居室大抵是八鋪六鋪四鋪半的規定。那樣大的房間不知道在前是作爲什麼用的。臨海的東北兩面都有迴廊，廊外有欄干，博多灣全面的景色毫不吝惜地裸示出來。大房間的西南角上又還有一間三鋪席面的小屋，這也不知道在前是作爲甚麼用的。



我在迴廊上擺了兩張由上海買去的藤製的睡椅，安了一張短桌在那大房間裏面，那兒便成爲了我臨時的書齋。有時海風太大時，我又把短桌移到後邊的小室裏去。

就在那樣的廣居之中，我譯出了“魯拜集”，做成了“孤竹君之二子”。那“孤竹君之二子”在初本是想寫達夫和我在四馬路上醉酒的那一晚上的事情，是想用寫實的手法寫成小說的。但我對於現實的逃避癖，却又逼着我把伯夷叔齊寫成了那樣一篇不成名器的作品。我寫那篇作品的時候，本打算寫出伯夷叔齊在首陽山上挨餓時的心理，我爲求得實感起見，有一天我自己實行地餓過一次，早飯午飯通沒吃，睡在迴廊上的長椅上，等待着飢餓心理的到來。早飯不吃，倒還沒有甚麼；到不吃午飯，那真是受了點煎熬。餓着肚子幻想着伯夷叔齊，同時是想借伯夷叔齊的史影來暗射當世，因此



在“孤竹君之二子”尚未構成之前，我却得着了哀世古調九首的副產物。那幾首是用古詩格調寫出來的，那自然只是一些歪詩，但在可以暗示出當時中國的大勢和我自己的心理上，它對於我比“孤竹君之二子”是還要更有意義的，我現在把它揭在這兒，自己來加一番注腳。

——悲時古調九首——

阮嗣宗，哭途窮，
劉伶欲醉酒，揮袖兩清風，
嵇康對日撫鳴琴，腹中飢火正熊熊。
一東，二冬，
人賤不如銅。

阮嗣宗，劉伶，自然是夫子自道。對日撫琴的嵇康是在二樓的一室裏彈着鋼琴的陶品孫。品孫



先生本來要遲我一年，但因為我回上海去停了半年的學，我們便同在一班了。他花了六百塊錢買了一架鋼琴，一有空閑便在一東二冬地彈奏。我們遷進抱洋閣之後，他也一同搬了來，寄居在二樓的臨海的一室裏。他那一東二冬的琴聲正在伴奏着我的飢腸的跳舞。

一碗飯，五羊皮，
養活淮陰侯，買死百里奚。
伯夷叔齊首陽山，不合時宜該餓死。
四支，五微，
秋高馬正肥。

這是那晚和達夫醉酒時的情緒。泰東老板對於我們採取的便是“一碗飯，五羊皮”的主義。他知道我們都窮，自然有一碗飯給我們吃，時而也把些



零用錢給我們用；但這些飯和這些錢是主人的恩惠，我們受着他的買活便不能不盡我們的奴隸的勞力。我們不會受過他的聘，也不會正式地受過他的月薪；我們出的書不會受過稿費，也不會核算過版稅；他以類似友情的主奴關係來羈縻着我們。我們所受的恩惠雖是有限，而所盡的義務却沒有可言滿足的一天，因為這兒的尺度是精神上的尺度。我們的自由無形中是受着束縛的，譬如商務印書館要聘請我們，我們便不好向高處飛去。受着這樣的束縛，善於自行解嘲的人，自然可以美其名曰“高潔”，曰“不合時宜”，自然也就可以自比為伯夷叔齊了。這些正是我們那時候還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縛的鐵證，並不是秦東能夠束縛我們，是我們被舊社會陶鑄成了十足的奴性。我們出馬的時候假使是亞東，是羣益，它們都可以一樣地做我們的主子的！

創造十年。



羨殺人，黃金印，
順口說合縱，橫目說連衡。
富貴在天生有命，一朝尸被五牛奔。
酒醴，三牲，
準備哭蘇秦。

這指的是當時的一批政客，特別是那時的一位“小徐”。

唐藩鎮，勢絕倫。
當年熾手熱，今日何人存？
河朔淮西一宵盡，滿池鵝鴨可成兵。
虎口，當心，
驪龍有逆鱗。

這指的自然是當時的軍閥。



白居易，琵琶行。

徐娘已老大，猶自嫁商人，

懷抱琵琶隣舟去，贏得青衫淚滿襟。

五鼓，三更，

關公走麥城。

這兒所說的徐娘是指當時的徐世昌。那位老頭子賣名賣到晚年，不料他的權勢慾是很大的。苦心孤詣地運動着做了一次大總統，後來被段祺瑞趕跑了，跑向天津。

孫悟空，齊天聖，

十萬八千里，只消一翻身，

才聞魯肅拜曹公，又見三桂揖清廷。

三正，五行，

相尅還相生。



這位“齊天大聖”是誰？想來用不着我來下注脚了。當時的國民黨派了兩位專使，一位姓張的去聯絡曹錕，一位姓汪的去聯絡滿州的張作霖，那怎麼也要令人想到相生相尅的觀念。“三正”是甚麼？“五行”是甚麼？ $3+5=X$ ——這在我們中國是極陳腐，也極時髦的一個公式。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三綱五常？三令五申？三墳五典？三光五星？三焦五腑？三老五更？三星拱照五福臨門？三鮮大麵五香豆腐？……

楚狂人，笑孔丘，
七十二大賢，三千小獼猴，
包辦中華教育界，老莊無分吃豬頭。
三跪，九叩，
緣木把魚求。



中國的教育界有這樣包辦的一羣人，這是無須乎再來加注的。只是那一羣人在當時正叩頭百拜的向北政府請發薪水。

博浪錐，何處有？

荆軻今已死，狗屠不可留。

陳涉吳廣起田間，農民之中今在否？

一筆，全勾，

醉死夢生儔！

這仍然是做“棠棣之花”時的情緒。

天風吹，海浪流，

滿懷悲憤事，聊以寄筌篲。

神州原來號赤縣，會看赤幟滿神州。

朋友，朋友，



努力事耕耨！

這兒明白地露出了一個“赤”字，但奇怪的是這幾首詩裏面罵了政客，軍閥，官僚，黨人，教育家，却沒有提到在這些傀儡之後牽着線子的人物；追慕了些 Lumpen-proletariat，一躍便想把中國赤化了。橫陳在藤睡椅上想赤化，這便是我當時的一個如實的寫照。——

肚子實在餓得難以煎熬，在那六十鋪席面的三層樓上當着海風，熬出了這幾首哀時古調，把赤化問題，飢餓心理，“孤竹君之二子”拋在一邊，自己跑下樓去把冷飯來填了一肚子。

11

在回福岡不久的時候，達夫從安慶寄了一封很悲哀的信來，“同時寄來了一份胡適編的努力週報”。胡適在“罵人”的一段雜記裏面，罵了達夫，同時不用說是連帶着我們。罵我們是“淺薄無聊而不自覺”。達夫挨了罵，他便異常的悲憤，寫來的信上說，他要跳黃浦江而死。我得了信，又看見了胡適的那段雜記，不用說也很悲憤，我尤其怕的是我的朋友會真個跳進黃浦江裏面去了。

先是達夫在“創造季刊”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夕陽樓日記”，指摘了“少年中國學會”的余家



菊由英文重譯出的“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的錯誤。余譯的錯誤委實很厲害，但不幸達夫所指摘的開首的幾句中有“establish”的一個字應該是“證實”或“證明”一類的意思，達夫又譯成了“建設”（恐怕是“建說”的誤排）。胡適大博士便抓定了這一個字，又把達夫所指摘的幾句重譯了一遍。但我們大博士的翻譯更錯得一塌糊塗，連“while”這個極普通的英文，都譯成“雖然”去了。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是德國哲學家威鐸的著書，因而要求本問題的最後的決定，自然是要看德文的原文。德文的原文我所有的是第四版，和英譯本的內容完全不同，達夫所指摘的那幾句是被刪除了的。英譯本所據的是初版，在這兒却出於不意之間得到了一個重譯之不可靠的一個實證。便是在著者本人已經是廢棄了的文字，由別一國的舊譯裏又珍重地把它介紹了過來，這個事實就讓我



們的大小說家尊重重譯的魯迅先生，無論怎樣把他手中的一隻筆自由自在地曲得就像卓別麟手中的一根手杖，也是難於曲護的。但這是別論，我們要駁倒胡大博士的“罵人”，自然是又當去找尋威鏗的初版。這却是難事，因為問題不是買書，而是買骨董了。

很可感謝的是仿吾的意思和我不期然地兩相契合了。他那時候已經到了上海，同時田壽昌應中華書局的聘也回到了上海，仿吾便在壽昌的藏書中找尋到了一本初版，他給我寄了來。結果是連初版的原文和英譯文都很有距離，原文只是半句話的文章，英譯者意譯成了好幾句，胡大博士的重譯不用說和原文是更隔了十萬八千里了。胡大博士結果仍然是錯了的。（參看創造季刊第三期中“反響的反響”。）

全書譯得不成名器（即是本無譯書的能力，因



投機而不負責任的亂翻)與偶爾有一二字的誤譯，這本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達夫的誤是屬於後者的。然而胡大博士的身分却拿得十足，他指摘了達夫的錯誤，罵了我們“淺薄無聊而不覺”，又還說了一句便是“彼此都是初出學堂門的人，相差也是有限”(大意如此)。他的意思就是說：你達夫和余家菊都是才畢業的學生子，有好深一點水水，落到我大博士手裏，你看，怎樣了，不空樂得一個“淺薄無聊而不自覺”的罵名嗎？是的，可憐那大博士的罵語却不折不扣地落在了他自己的頭上！

我們這位博士只是一位有些常識的啓蒙家，而他的常識也不是怎樣的高級的。我這樣空空洞洞的說來，顯然也有些心存報復的在罵人，讓我在這兒把他的文章來舉個例罷。

我手裏有一本“新月月刊”二卷十號，那裏面有我們胡大博士的一篇高文，便是“我們走那條



路？”那篇大文章開端處引了一句淮南子上的話；他說“這正是我們中國人今日的狀態。”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今本作“則易道”），遇小人則蹈于溝壑。（今本作“則陷溝壑”）”（原注：淮南“汜論訓”，文字依“意林”引）

我們的大博士引用了這一句古語，十足地表示他是一位學者；而且他的標注更表示出他是一位精細周到的攷據家（可惜“蹈于溝壑”四個字似乎是依據御覽，“于”是作“於”的），不是尋常的學者；這樣一位大學者的高論你還不好信嗎？所以博士先生的引古是有意義的，便是標注也是有意義的。但可恨我們多生了一副腦筋。我們只要讓我們自己的腦筋來想一下，便會知道淮南子的話完全是睜眼子說的瞎話，世間上絕沒有那樣無聊的瞎



瞎子。我們知道瞎了眼睛的人，他的視官雖然失了，在視官以外的聽官觸官乃至所謂第六官是比睜瞎子更銳敏得許多。他能夠以聽官觸官來補足視官的缺陷，他能夠因絲微的氣流而辨別方向，他能夠依杖梢的點觸而辨別高低，他的耳朵上有眼睛，竹杖上有眼睛，足上有眼睛，全身的皮膚上都有眼睛。所以我們在極繁華的都市上，每每能夠看見有獨自一個人能夠上下電車的瞎瞎子。瞎子走路，絕不是“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的。淮南王劉安是兩千年前的人，那樣的話作為兩千年前的常識倒還沒有甚麼；而我們胡大博士就好像從前的闡墨文章愛引“子曰”“詩云”的一樣，引用來做了自己的木鐸（motto），那是證明了胡大博士的常識至少是落後了兩千年的。

學學博士的筆調：“古人說得好：文章爭一起。”胡博士在一起上想以學者的資格來釣人，可



惜我們在這一起上已經看穿了他的落後，他以後的文章，除非是好事家或者同是愛說瞎話的睜眼子，是可以不必看的了。但我們爲忠厚起見，不妨再看一下他的下文。

博士說：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污。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爲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爲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爲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爲



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爲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爲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爲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加圈照原樣）故卽爲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剷除這五大敵人。”

胡大博士真可說是見了鬼。他像巫師一樣一里招來，二里招來的所招來的五個鬼，其實通是些病的徵候，並不是病的根源。要專門談病的徵候，那中國豈只五鬼，簡直是百鬼臨門。重要的是要看這些徵候，這些鬼，是從甚麼地方起來。

胡大博士在疾病的項下舉了一項瘡疾，他把瘡疾說成亡國滅種的大病，說“我們不得不承認瘡疾的可怕甚于肺結核，甚于花柳，甚于鴉片。”這位先生假如多少學過兩天近代的醫學，我想他斷不會這樣的誇張；同時凡是多少學過兩天近代醫學



的人也立地會知道他張皇得真有點程度。我們暫且就把瘧疾來做譬比罷。這是由於病源蟲 *Plasmodium* 所喚起的疾病，有間日瘧，三日瘧，四日瘧等的種別，但假如這幾種瘧疾的病源蟲同時侵犯了一位病人時，由時間的組合上可以形成不規則的瘧形。這種病是有特效藥的，便是雞納霜 (Chinine)，用得得法時可以藥到病除。古時候沒有這樣明確的智識，故也苦於無法治療，在中國更是當成鬼病在處治。說起那鬼狀來要舉出“五大仇敵”可以俯拾即是。第一大敵是寒熱間作，第二大敵是肝脾浮腫，第三大敵是譫嚙迷離，第四大敵是食慾不進，第五大敵是衰弱無力。假使不顧惜紙面，還可以舉出好些。在古時當鬼病治的時候，便是對於這些徵候“一點一滴”的想方法，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照着那樣辦去，或者也怕會弄到胡大博士所誇張的那樣，亡國滅種了。但到現在已經不是



再見鬼的時候了！現在有特效藥來撲滅病源蟲（古時瘧疾也每服藥而癒，是因藥中含有雞納成分。）有豫防的智識來撲滅那傳播病源蟲的媒介。（這是一種花腳蚊子，立在壁上後體斜翹與壁面形成一種角度，學名爲 anopheles，見了這種蚊子務請打倒，千切不要懷疑說這蚊子並不在瘧疾之內！）而且還有一項新奇的智識，便是利用瘧疾來醫治淋病梅毒，因為那些病源菌是不能耐高熱的，瘧疾有四十度至四十一度的高熱，可以撲滅那些病源菌；去了虎再來驅狼，這可以說是以毒攻毒，但是要有明確的醫學智識的人才行，徒是見鬼醫生，聽了都是會驚駭的。

說到了梅毒，再來談談梅毒罷。從前在上海的小報“晶報”上看見過一篇文章，說胡適博士是害過梅毒，這事情的確否雖不得而知，但好在博士是把花柳病看來比瘧疾還輕的人，而在我們學過醫



的人看來，梅毒患者和瘧疾患者是一視同仁的患者，倒沒有甚麼名譽不名譽。即使說胡適博士害過梅毒是訛傳，也就如說胡適博士是得過瘧疾一樣，倒也不會發生毀壞名譽的訴訟。而且我們還要知道，梅毒單由簡單的接吻都是可以受傳染的！好了，還是來談談梅毒。博士先生把梅毒看得來比瘧疾還輕的，我想這是因為知道了有“六〇六號”的特效藥的原故。但其實這病依然是可怕的。病由驅梅的療治即使斷了根，便是把病原菌的 *Spirochaeta Balida* 撲滅了，但那病菌的屍骸留在人體裏，在神經系統中有時仍然要發出種種不愉快的腦症和脊髓癆，那究竟不是瘧疾可比的。但就有這樣稀罕的例症也還是要用根本的驅梅療法，不能夠委棄梅毒而不治，或者是在梅毒的徵候中舉出五大仇敵來打倒，趕第三期的梅毒來說罷：第一大敵是毛髮禿落，第二大敵是鼻頭腐爛，第三大敵是聲音變



啞，第四大敵是骨髓疼痛，第五大敵是運動不靈。此外還多，還多，讓你去一點一滴地去打倒！

哼哼，我們的博士先生“淺薄”得真是有點可愛。他說“資本主義不在內……資產階產也不在內，”是的，內或者是不在，外呢？中國的金融·交通·礦山·紗廠·等等是在貴何國度的貴何主義貴何階級的手裏呀？他說“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這只是在名詞上玩把戲。他說的“封建制度”是秦以前的封功臣建同姓的說法（但那種說法已經靠不住，周代的諸侯大多數是自然生長的國家，當時的社會還是奴隸制度），現在所談的“封建勢力”是指在行幫制下的各種舊式產業，在地方上割據着的軍閥·官僚·地主的那個連鎖，以及因之而發生的各種痼弊的迷信與腐化（胡博士所說的五大仇敵都包含在這裏面），這些是崩壞了的嗎？問題不是徒逞唯名

的 (nominalistic) 詭辯，而是要你看着事實！更可愛的是我們的博士問“帝國主義爲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這該不是多喝了兩杯洋酒的時候說的話罷？因爲這等於在問：“瘧疾的病源蟲爲什麼不侵害 Plasmodium，梅毒的病源菌爲什麼不侵害 Spirochaeta Balida？”先生是無智呢，那倒還可恕，因爲他究竟還年青，還可以再讀幾年書來再談。雖不能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胡博士的原文很嚴正地引用了這兩句，其實世界上並沒有這樣大的牛屁），至少是可以說“一言可以留芳，一言可以遺臭”。

其實中國積弱的病源，就給盲目者依然有方法找尋正確的道路一樣，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在暗中摸索了一百年，畢竟是早已摸着了的。只可惜有好些狂牛不跟循着民衆所找尋到了的正確的道路，只是像五牛奔屍一樣亂跑。弄到現在來還要



讓我們的博士問“我們走那條路？”

博士先生，老實不客氣的向你說一句話：其實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個微菌，你是中國的封建勢力和外國的資本主義的私生子。中國沒有封建勢力，沒有外來的資本主義，不會有你那樣的一種博士存在。要舉實證嗎？好的，譬如擁戴你的一羣徒子徒孫，那便是你一門的封建勢力；替你捧場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們所說的帝國主義者。你便是跨在這兩個肩頭上的人，沒有這兩個跨足地，像你那樣個學者，無論在新舊的那一方面，中國雖不興，實在是車載斗量的呀！

這一個例證舉得未免太長了，還是收回本題來，便是我們的博士始終是一位稍稍有點常識的啓蒙家，在五四運動的前後他這個啓蒙家是有過相當的效用的，所以他當年罵起人來也很有使我們達夫先生想跳黃浦江的力量；但我想假如達夫



現在肯來罵罵胡適，那或者怕會使我們的博士去跳瓦兒池罷——注，瓦兒池者德國的跳舞 Walz 之音譯也。

由達夫的“夕陽樓”惹起了胡適的罵人，由胡適的罵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後便愈扯愈遠了。張東蓀來參加過這場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的“形而上學序論”的指摘；張東蓀的“手式戲”喧傳了一時，成仿吾的“黑旋風”也就因而名滿天下。吳稚暉也來參加過這場官司，接着是惹出了陳西滢對於“茵夢湖”的指摘。還有是“詩哲”徐志摩在“努力週報”上罵了我的“淚浪滔滔”。這場事件的因果文字，如有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來，儘可以成爲一部“夕陽樓外傳”。但我們那聰明的夕陽樓主，他是最先把兵馬收了的。這是後話，在下邊自然要慢慢地談到。



仿吾由長沙再到上海是在我們離開了上海以後，他便住在我們住過的民厚南里裏面。在他到上海之後不久，田壽昌受了中華書局的聘，也由東京到了上海，壽昌是住在民厚北里。同在民厚里裏面，一南一北地住着我們的兩位同人，在局外人或者會想到創造社的進行是會要更加圓活的。但不料在這兒有小小的一點意見，使壽昌和仿吾決裂了，並因而和我們斷絕了關係。

事情是“創造季刊”二期出版之後，仿吾由長沙寫了一封信給我，信是在季刊三號上發表了的。信中批評了第二期裏面的作品，批評了達夫，資平和我。中間有一筆帶說到了壽昌的“薔薇之路”。仿吾說他不知道壽昌爲甚麼要把那樣的文字來出版，他對於他的前途真是絕望了。這封信我留在上海，留給仿吾編入第三期，是用紅筆把那兩句勾了的。壽昌和仿吾起初自然是時相過從，不幸有一次



壽昌在仿吾的抽屜中便看見了那封信，自然也就看見了那用紅筆勾了的兩句。那使壽昌感覺着很大的不快，中間雖也經過我的函件的調解，但是兩人終至於決裂了。但我早就在這樣想，壽昌的決裂雖以仿吾的信爲其近因，其實也是早有遠因埋伏在那兒的。壽昌是“少年中國學會”的人，那個學會起初本來就是帶着有很濃厚的國家主義的色彩的。壽昌在前雖不必便是怎樣鮮明的國家主義者，但他在那一方面的朋友特別多。一種團體無論是怎樣自由的集合，多少總是有點立場的；一個人無論是怎樣超脫的性格，入了一種團體也自會帶着那個團體的意識，可以說就是行幫意識。壽昌以“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而參加創造社，他在出馬的時候便不是怎樣的熱心，可說僅是出於對我個人的友誼。創造社在前在積極一方面本沒有甚麼主義，但在消極的一方面至少可以說是非國家主

創造十年。



義的。這種意識和“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隱隱成爲對蹠。使壽昌因些小的意見便和仿吾決裂了的，是這種對蹠的意識在作怪的！

12

1923年的三月，在福岡足足住了四年零七個月的我，算把大學弄畢業了。自己對於醫學，就像費了幾年的工夫把世界漫遊了的一樣，但終因自己的聽覺的不靈，做醫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拋棄的。

張鳳舉那時候在担任北大教授，他寫過一封信給我，勸我到北京，說是周作人先生也有這個意思。他說北大不久要開設東洋文學部，勸我去担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計較。他又說，知道我的周圍有一位陶晶孫，他希望我介紹給他做朋友。晶



孫我自然是介紹了，但是北京我却沒有意思去。我在日本雖然留了八九年的學，但學的並不是文學，所謂東洋文學尤其外行，我當然沒有去教人的資格。

北京沒有去，帶着家眷仍然回到了上海，動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在我自己是回國，並回到已經走熟了的上海，倒也沒有甚麼；但是我的老婆，她是初次跟着我跑向未知的國土的，在她當然是別有一番的感慨。——我現在問了她，問她當時的感慨怎樣；她說，“好像感覺着幸福，因為你已經畢了業，以後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處走的一樣。”她當時如果是這樣作想，那她不久便要受欺騙了。

回到上海仍然住在民厚南里，仿吾移住亭子間，把前樓讓給了我們。均吾又搬回馬霍路去了。那時候我已經有三個兒子，第三子的佛孫生後剛



滿兩月。我畢了業了，家裏給我匯了三百塊錢來，要我回四川，那三百塊錢便是我唯一的財產。我最初的計算是，回國之後暫時到上海附近的鄉下去，把我的“浮士德”譯稿整理出來，以了結一重公案。譯好之後或回四川，或到什麼地方去，再定行止。

仿吾住在泰東編輯所裏，也和我向來是一樣：他沒有正式受過聘書，也沒有領過一次薪水。他人又厚道——雖然蒙我們的魯迅先生把他歸之於“流氓痞棍”之例，更斥之為“極左的兇惡的”，但我在這兒是要為他嚴重抗議的——自從去年十月到了泰東，住了半年，除吃飯而外，也沒用過泰東一個錢，弄到連坐電車的錢都是沒有的。那時候他的大哥劭吾，在廣東擔任第二軍的軍需處長，託他們的軍長譚組庵先生為仿吾寫了一封介紹書，介紹給商務印書館的張菊笙先生，求在商務的編輯所裏面謀個位置。菊笙先生是商務的元老，組庵先生



是軍長，他們又是同年（是由信中稱“年兄”而知道的），那封信假如投寄了，我想仿吾至少是可以做個二等編輯，每月拿他一百五十塊錢，或者截到今年的日本兵的爆擊為止，他都還安閑地吃着一碗安樂飯的罷？

回到上海之後，商務的同學們多肯來訪問我們。庶務主任的何公敢又來提起了著譯契約的事情，還是著則千字五元，譯則千字四元，不經審查的舊議。我當時談過一次笑話，我說，“著譯未免太勞苦了，能夠每個月送我幾百塊錢，我倒一定要拜領的。”公敢說，“你的資格可惜還不夠啦，你要想鬧到梁任公胡適之一流的資格，總怕還要等幾年。”自然我們彼此都是一笑，因為公敢並不是崇拜梁胡的人，他的話只是含着滑稽的意義。契約的事情依然保留着了，也沒有說訂，也沒有說不訂。

不久達夫帶着他的夫人和龍兒和一個丫頭由



安慶回到上海來了，他是因爲甚麼事情卸了職，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所以那時的達夫要算是失了業的人，我們覺得他是很可同情的一樣。說也奇怪，我自有生以來不知道就過甚麼業，偏在同情達夫的“失業”。有一天我們三個人聚集在民厚南里，在談笑之間決定了一個路線，便是過“籠城的生活”：仿吾的那封介紹信不去投交，我的著譯契約也不用去締訂。可憐的那幾個封建餘孽！他們竟想把民厚南里當成首陽山；不過那時候已經不止是伯夷叔齊，而是加上了仲雍的。

決定了過籠城生活之後，第二步的便是出“創造週報”。這次商議的地點是在馬霍路的樓上，達夫那時是住在那兒的，寫出了他那篇不朽的“薦蘿行”。那個提議的首倡者是達夫，還是仿吾，我現在不記得了，至少不是我，我是可以斷言的。只是一決定了之後執行得却很勇猛。達夫在四月下旬回



到富春去了，我們沒有等他，趕着在五月一號裏便把第一期的週報刊佈了出來。所以要趕着在五月一號出版的，與其說是爲要紀念勞動節，甯可說是爲要紀念創造社的滿了一個週年——創造季刊的創刊號千巧萬巧地是挨到了1922年的勞動節日才出了版的，却成了創造社的意識以外的一個光榮的紀念，特別是仿吾，他把這個日期看得是分外輝耀。仿吾異常的猛勇，在週報第一期上便投出了“詩之防禦戰”的那個爆擊彈，把當時築在閘北的中國的所謂詩壇，爆擊得比今年的閘北怕還要厲害。那篇文章除掉仿吾之外是誰也不會做的，因爲凡是多少要顧慮一下飯碗問題的人，誰個敢於做出那樣的文章？至少連我自己就是不敢做的一個人，在我們目前這個先生長先生短的黃金世界裏，少稱了一個“先生”都可以得罪人，那個敢有那樣天大的膽量再來言“戰”？仿吾因爲那篇文章便得



罪了胡適大博士，周作人大導師，以及文學研究會裏面的一些大賢小賢。然而仿吾的報應也靚面了。他在用爆擊彈，而在敵人方面却用的是毒瓦斯。時事新報上的瀾天漫野的綠氣把他化成了一陣“黑旋風”，就在1931年的魯迅先生的“一瞥”中都還說他是帶着一個“極左的兇惡的面像”——仿吾，你知道了好歹麼？我看你是永遠不能超生的罷。

因為有了那場“防禦戰”在敵人的陣營裏並沒有損得分毫，把自己却弄得一個焦頭爛額，在自己的本陣營裏也崩潰了一角。創造社的醞釀期中曾經參與過的張鳳舉和徐祖正的兩位先生，他們在“創造季刊”四期的“雪萊紀念號”上是做過文章的，鳳舉在那一期上還發表過一篇小說叫“途上”，但在週報創刊以後，他們說仿吾改了他們的文章，因此便和創造社斷絕了關係，屢次請他們把那未完成的稿子繼續下去，他們也謝絕了。彼此改改



文章，在我想來，在朋友之間，斷不會便成爲“廣絕交”的資料；重要的原因怕還是那一“戰”罷？那一“戰”把我們北大教授周作人導師得罪了，倒是千真萬確的。

出了二期之後達夫由鄉裏出來，第三期上他便出馬上陣。他的勇猛也不亞於仿吾，最初在中國的文藝界提出了“階級鬥爭”這個名詞的怕就是我們達夫先生。不過達夫的那篇“文藝上的階級鬥爭”，結果只是說了些鬥爭，並不會說到階級，離題自然是很遠的。

正在那出週報的前後，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的駐滬特派員M來找過我，說他們的新聞社要在英文版的每日新聞上出一期“中國專號”，要我代表着中國的文藝界做一篇文章。現在想起來真是有點僭妄，也真是有點滑稽，我便做了那篇“我們的文藝新運動”，由仿吾英譯了出來交了去。在日本布



爾佐亞治的大新聞上發表我那篇似是而非的普羅列搭利特的文藝論，新聞的編輯者怕定然是感着苦笑的罷？那篇文章是得過二十塊錢的稿費的，不過自從那篇文章發表過後，日本的新聞界也就沒人再找過我了。

一鼓的作氣的確是很勇猛，使敵人對於我們也隱隱的生了一種畏懼。週報發刊不久，季刊的四期又出版了，那裏面有我的“卓文君”，達夫的“采石磯”，不期然地同時刻薄了攷據家，把胡博士罵我們“淺薄無聊”的話來發揮過一下。就在那時候胡大博士到了上海，他對於我們的反攻取出了一種求和的態度，他由亞東書局送了一封寫給我和達夫的信來。信中的文句塗抹得異常厲害，大部分是對於我的說話。他說攷據家有當罵的與不當罵的，像我譯“魯拜集”的時候如肯多攷據一下，有些地方便不會弄出錯誤來了。



我們得了他的信，同時也就回了他一封。我是勸他把提倡白話文那時的精神恢復起來提倡氣節。達夫是怎樣寫的，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達夫口頭說過這樣的話：“我的‘采石磯’把他比成了戴東原，他一定是在暗暗得意的。”

我們的回信去後，胡大博士畢竟是非凡的人物，他公然到民厚南里來看望我們。一年不見的他，是憔悴多了，他說他在生病，得了痔瘡；又說是肺尖也不好。我看他真有點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識，罵人的一筆官司就像是從來沒有的光景。他那時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國人的貸間裏，我們，仿吾達夫和我，也去回拜過他一次。我們被引進了一間三樓的屋頂室，室中只擺着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似乎不是我們博士先生的寢室。博士先生從另一間鄰室裏走來，比他來訪問時，更覺得有些病體支離的情景。那一次他送了我們一



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的創刊號，可惜那一本雜誌丟在泰東的編輯所裏，我們連一個字都不曾看過。

週報在開始創辦的時候本很有趣，因為人扣手，又都還是些生力軍：但辦到十幾期上來的時候便覺得有點筋疲力盡了。每週要發一次稿，我們最爭的是頭一篇，所謂“Haupt”，三個人輪流起做都感覺着有點青黃不及的恐慌。又要由自己校對，自己跑印刷所。禮拜一發稿之後。禮拜三送初校，禮拜五送二校，禮拜六送三校，禮拜日出版，弄得整整一個禮拜全沒有空閑的時候，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隸一樣，動也不能動一步。我想到鄉下去整理“浮士德”譯稿的計畫，在無形之中是被拋棄了。還有最感痛苦的便是沒有錢用。泰東依然沒有和我們議正式的薪水，在初我還有錢的時候是用着自己的錢；但我自己的錢因為初帶家眷回上海，不



免要新置些東西，用不許久也就告罄了。到那時候自然也跑到泰東去，十塊五塊地要。說起要錢，雖然是自己應得的報酬，總覺得在討口的一樣，有些可恥。十塊五塊的錢，在上海的幾個人是用不上幾天的。達夫和仿吾的潔癖比我更還厲害，要錢時大概是叫我去破臉，我的腳自然也就有些羞澀，當去三次的至多只去得兩次。在這兒便誘導出了一個重大的龜裂。

是在九月初旬的時候，上海有一部分的同學們在“消閒別墅”燕集，席上有中華新報的主筆張季鸞，他從前是住過一高的人，所以在我們要算是先後同學。他在席上對我說，要我們分點餘力來替中華新報每天編一項文學副刊，編輯費每月一百元，編輯的篇幅是半面報紙的二分之一，編輯的全權全盤委託給我們。我當場保留着了考慮的餘地，只是答應回去同達夫仿吾商量好之後再作正式的



答覆。

在民厚南里商議的時候是在晚上，除我們三個人之外，有陶晶孫和何畏，他們是在暑假中回國來，不久便要轉到日本去的。

我的意思是拒絕。理由是中華新報是政學系的機關報，政治上的色彩不好；中華新報的銷路當時在上海市面上只能銷得三兩百份，而我們創造社的週報初出版時每版三千，後增印至六千，還要屢次地再版，犯不出去替他們推廣銷路；還有是我們編週報和季刊已經疲於奔命，再添上日刊，終是沒有力量顧及的。

仿吾和達夫是贊成接受。他們的意思是文學研究會有時事新報上的學燈，在旁系上有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我們總得有一種日刊來對抗。其次是季刊和週報的標準太高，外來的投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能採用，因而失



掉不少的讀者，應該要有一種日刊來做尾閘，以銷納外來的投稿。其三是編輯的全權在我們，他們的政治色彩自然把我們沾染不到，並且有一百元的編輯費也是些少的生活上的補助。

晶孫和何畏是要往日本的人，他們客氣着沒有發表甚麼積極的意見，但在意氣之間是贊成接受的。

就這樣在五個同人中的會議就剩下我一個人，在反對，結果是我服從了多數，但同時的決議是日刊由達夫仿吾均吾負責，我的力量多用些在週報方面。日刊又定名為“創造日”，這是我提議的名字，那標題畫的木版畫在黑暗之中閃出了一些電光的，也是我畫的。

就這樣在那九月中旬便有“創造日”的誕生。

在這兒又要加上一段光榮的插話。“創造日”誕生的預告是在中華新報上登了出來的。在那要



出版的前一天，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先生又請我到他公館裏去晚餐。男客有楊端六鄭心南何公敢周頌久諸先生，都是在商務任着職務的同學。端六先生誰都知道是英國留學生，在商務管着銀櫃子的人，但他在前是在日本留過學的，而且是岡山六高的出身，照着西洋的話來說，我們是同一個“母校”。女客有端六夫人，還有兩位女士我不記得名姓。主人除夢旦先生之外有振鐸和振鐸的未婚妻，夢旦先生的第二女公子。我由夢旦先生的介紹才知道振鐸“招了駙馬”，或者那天的晚餐，就是婚約的披露燕罷？

夢旦先生把我和端六夫人坐在首席上，夫人坐在我的左邊，因為要和坐在她左邊的端六先生連席。我的右邊又坐着兩位未知的女士。夢旦先生大約是看見我是名詩集以“女神”，並做過“卓文君”一類的作品的人以為定是一位女性崇拜者，所



以才那樣安置我的罷？但我的位置一挪起來——這個奇字是我新造的，暫且假定它爲𦉳字的異體罷——委實是有點左右做人難的苦況。

席散之後心南邀我到他的寓所裏去，他對我說，振鐸是他族上的一位族孫，人很聰明，也很用功，目前雖然幼稚得一些，將來是很有希望的。又說，這次的婚約是振鐸請他去說合的，夢旦也很喜歡振鐸，說他的女兒配不上他，只要振鐸喜歡，自然是情願。又說夢旦的幾位女公子中，長女公子最有學問，見識也很高。其它的便遠遠不如。心南以他那族祖而兼月老的資格向我委委婉婉的說，我雖然呆笨，但同時是感覺着高夢旦先生的一席晚餐，是對於我的一個箝口令。物質的通性有一項是：一個空間不能容兩個物。夢旦先生把那很可口的福建菜充滿了我的口腹，自然會把我口腹中的話從反對的孔穴裏逼進毛房裏去的。但無如夢旦



先生對我的估計，是作了過高的評價。夢旦先生以爲我是創造社的代表，創造社同人的主張我是可以左右的。其實我並沒有那樣大的本領。拿學級來說，仿吾是早我一級的，日本人的習慣是稱爲“先輩”。達夫資平雖和我同級，但我因回上海鬧創造社的事情停了半年的學，畢業在他們之後，所以他們也要算是我的“先輩”。我以後來者而居上，是因爲我在國內的文藝界上比他們早出了一兩年的風頭，在創造社的醞釀期中，我比他們多跑了一些路子。因此外界的人通有一種錯覺，以爲我是創造社的“領袖”，其實像創造社的那一批“天才”，除掉以友情爲聯繫之外，絕沒有任何人能以“領袖”的資格來統率的。在我自己始終是只有犧牲我自己的主張去服從友誼，我決不會以我自己的意見來壓迫過朋友，我們的朋友中任誰那一位也都是不甘願受壓迫的人。我從前說過些唯美派般的話頭，說



“毒草有美麗的色彩，也可以娛目暢懷”(創造季刊三期上的一段漫衍言)，那是達夫在受着京滬兩地的批評家責罵，我說來擁護他的；在我自己實在並沒有那樣的資格。又譬如仿吾，他是心直口直筆直手直的人，我假如要勸他稍稍妥協一下，那他一定會先把我罵倒。所以我雖然多謝了夢旦先生的極誠懇的兩次的晚餐，我自己的口雖然可以箱——我自己從不曾罵過振鐸，雖然也不曾恭維過他——無如夢旦先生沒有同時請我的朋友。

13

“創造日”出版了，照着最初的決議是達夫，仿吾，均吾，三人主持，一百元的編輯費也是由他們三人分用的，達夫用六十，仿吾和均吾各用二十。達夫有了那每月的六十塊錢，算好，使他產生了那“還鄉記”，“還鄉後記”，以及未完成的“蘇州煙雨記”的傑作。達夫那時候怕是創作慾最旺盛的時候，他的筆調很快，仿着日本式的新聞連載小說的辦法，文稿是每天寫一段，寫好便拿去付排。在他的“蘇州煙雨記”剛好寫了兩次(?)的時候，北京有電報來了。



北京大學的陳啓修先生——就是近年的陳豹隱——要到俄國去留學，在北大所任的有兩個鐘頭的統計學要請達夫先生去担任。

達夫接着這個電報的時候我們又在馬霍路的樓上商議過一次。我的意思是勸他沒去，因為到北大去當講師，在那兒的分門別戶的幾種既成的勢力之下沒有發展他的才力的可能；又因為他是創造社的一根撐天柱，他一走了，季刊，週報，創造日便很難維持。但是仿吾是贊成他去，他說：“我們通集中在這兒也沒辦法，現在要用散兵線，散到各處去開拓。”

我說“那嗎，幾種刊物怎麼辦呢？”

出乎意外的是達夫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最好是停辦！”

我聽了覺得有點傷心，就好像費了幾年的心血養成了幾個兒子，要一刀把他們斫成兩段的一



樣。

我又說，“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來嗎？”

達夫更決絕地說了一句，“不停辦我是不寄稿的！”說得有點聲色俱厲的程度。

我碰了一個大釘子，才感覺到我自己招了朋友的厭棄。仿吾沒有說話，我自己也就沒有再說了。

那時候我大的兩個兒子正在過麻關，第三個幼兒也得着痢症，我和我的老婆在民厚南里的前樓上守着三個病兒，有好幾晚上是沒有睡覺的。達夫在要動身的前夜，泰東書局替他餞行，晚間幾位朋友更在振華旅館裏開了房間爲他惜別，我守着病兒沒有出席。但到第二天要開船的時候，我是跑到船上去和達夫握了別的，他拿了幾個金山橙子給我，說“拿回去給孩子們吃。”我聽了幾乎流出了眼淚來。

達夫在要動身之前，還做過一篇小說叫“離散



之前”，那是達夫最得意的文章，他自己說過是他平生的傑作。那篇小說是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過的。也要算是在創造社同人中開了賣稿的風氣之先。那是預言着創造社之將離散而當成事實寫着的。預言在幾年後自然是的中了，但事實和小說却是兩樣。那裏面的鄭海如，誰都知道就是郭沫若的漫畫化，他把他描寫得十分忠厚——在民厚南里的樓下一張方桌上，把出了幾期的季刊供奉起來，點了一對紅燭，鄭海如跪在地下，大呼“藝術之神”，磕了幾個響頭。原來我在朋友的眼中看來才是那樣的一位忠厚長者——我想魯迅先生一定是要大反對的。不過在達夫走後，創造社還沒有即行分散，因而那篇“離散之前”在還沒有機會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發表之前，便已經離散到“東方”去了。

達夫一接了北大的聘，於是乎那篇“蘇州煙雨記”也就因“作者臥病”而中輟。以後的“創造日”是



仿吾和均吾負責的，一百塊錢也就由他們兩人分用。“創造日”經達夫一走自然是減色不少，又因我沒有本事兼顧，惹得張季鸞說是“大將不出馬”，然而政學系的大將章秋桐却到上海來出馬了。

那位紙老虎在十月尾上到了上海，在時報上做了些抨擊白話文的文章，又在研究甚麼“墨經”，把上海的文藝界弄得有點稍稍的墨而且黑。中華新報和泰東圖書局是政學系的兩個私生子，不消說也是章老虎的勢力範圍。在泰東方面受着他的意旨，便有出文言的中小學教科書的計畫——這個計畫似乎是因爲沒錢的關係，沒有實現。中華新報出着白話文的“創造日”，在我的揣想中早遲是難免要停刊的了。

說起辦“創造日”，仿吾委實是費了不少的心血。中華新報的排字工友和校對員的程度太低，仿吾每天晚上都要親自去校對，遇着有外國文字的



地方還要親自去檢字排字。仿吾的右膝關節是患着柳麻迭斯的人，他走起路來都不大自由，自從達夫走後，天氣漸漸寒冷了起來，看着他在晚上一個人去登報館，覺得有幾分悲壯，同時也覺得有些難忍。我到後來，有時候也陪着他去，在我最初說出這樣的話時，他很淒切地笑着說，“你也去嗎？”——他那簡單的一句使我覺悟到，我以前沒有陪伴他們同去，大約就是使朋友厭棄我的原因，我自己是失悔莫及的。

達夫去後，委實是言能顧行，他一直便沒有文稿寄來。他有工夫在晨報副刊上投稿，在太平洋雜誌上投稿，但是創造社的幾種刊物似乎已經被他忘在腦後了。三個人分担着都感覺着吃力的工作，剩着兩個人來做，自然是愈見捉襟見肘的。每天要文稿的“創造日”，起初是視為銷納外來稿件的尾閘，其實才是一個愛吃甘旨的饕餮，外來稿件不加



減一下鹽梅，它是不肯入口的。爲我們驅除了這個饕餮的，怕應該還是要感謝我們的老虎。

十二月的中旬的一天清早，中華新報的總理殷柱夫先生到了民厚南里的我們的寓所裏來。他講到報館的經費支絀，能夠的時候希望我們把“創造日”結束起來。殷先生說這話時很客氣，怕的得罪了我們，其實他不曾知道他的話正是救命的符籙。我保留着攷慮的意思，在第二天清早回答，他回頭便告辭走了。在他走了之後我和仿吾商量起來，仿吾也贊成停刊。剛好“創造日”滿了百期，於是乎那個孩子便在一零一號上天折了。

“創造日”停刊後，可算鬆得一口氣，但說也奇怪，那一停刊却也增加了創造社的蕭條的氣象——至少在主觀上是這樣感覺着。“創造週報”已成了強弩之末，失掉了它從前的刺激性。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後便很難繼續。有些人勸我們改改口味。



仿吾的大哥在那時候由廣東到過上海來一次，也勸我們把方向轉換到政治方面。這是當時社會上的一般的要求。在歐戰期中中國的資本主義雖蒙受着頻年的內亂，但也看到了它的暢茂的發芽，上海天津的紗廠有一個時期如像雨後的春筍一樣簇生了起來。但自歐戰結束了以後，歐洲資本主義的勢力又捲土重來，把那簇生起來的春筍幾乎全部都拔了起來進了油鍋。中國的覺悟了的人在這兒明白地看見了那無形的帝國主義的勢力，覺悟到中國如不抗拒帝國主義，就連民族資本主義都不能夠發展。便是一般近視眼的人們也看到中國的內亂妨害了中國的產業。因而政治問題便成爲一般社會人的意識的焦點。這在我們身上所生的影響，便是社會的要求不再容許我們籠在假充象牙的宮殿裏面談純文藝了。我們自己也感覺着這種必要，但我們却沒有轉換的能力。



在這時候達夫從北京寄了一個消息來，便是“太平洋社”的人想和我們合作，打算把“太平洋雜誌”停刊，和我們同辦“創造週報”，前半政治，後半文藝，政治的一半由北京編好寄來，由我們在上海加上文藝的一半，付印出版。這個求婚的提議本是極投時好的，而且也特別看重了我們，我們如稍稍聰明一點，一定是無條件地接受了。但在這兒又是我和仿吾的潔癖誤了事，太平洋社的那些英國回來的學者，我們總覺得他們是太紳士了一點，說壞些便是官僚氣味太重，一時好像合作不來；又加以用文藝來做政論的附屬品，是我們出馬時所最反對的辦法，雖然時勢變了，也覺得不好立地拋棄。在這兩種的顧慮之下，我們提出的辦法是，週報由兩社的人輪流編輯，一期政治，一期文藝。但這個提議却失掉了合作的主要意義，想借文藝做調劑以推廣政論的，因而便沒有得北京方面的同



意，事情也就擱置了。

合作不成，轉換方向又沒有能力，週報的出版只是在一種惰性的習慣之下維持着。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已經是意思索然的仿吾，因為他的大哥在廣東，早便存着了南下的心事。而在我自己更要加上一層家小的束縛。

我的日本老婆自從回到上海以後，她便很少開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像的“幸福”完全背馳，第三個幼兒的消化系統的疾患，實在是最大的累贅。住在日本時小兒一有病痛便抱進大學病院去。醫生是最可信認的先生，醫費是一文不取的（因為是學生的眷屬可以免費）。回到上海以後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中外的醫生沒有一個敢信認，醫費也貴得驚人。假使是有錢倒還沒有什麼，但在過着奴隸加討日子生活的人，連坐電車的車費都時常打着飢荒的。老婆因此便時常吵着要回日本，



她要顧着幾個肉體上的兒子們，我同時也不能不兼顧着幾個精神上的兒子們。她帶着三個兒子們回日本，獨立地是不能生活的，除非實際地討口，所以那便是要逼着我把創造社的全部拋棄。這是一個重大的衝突，因此在家庭中便免不了時常在鬧着風波。

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感受着一種進退維谷的苦悶。我自己在初便是有些左傾病的人，在出週報時又吼過些激越的詩調，說要“到兵間去”，要“到民間去”，然而吼了一陣還是在民厚南里的樓上。吼了出來，做不出去，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着無限的苛責。我從前的一些汎神論的思想，所謂個性的發展，所謂自由，所謂表現，無形無影間在我的腦筋中已經遭了清算。從前在意識邊際上的馬克思列甯不知道幾時把斯賓諾若歌德擠掉了，佔據着了意識的中心。在1924年的初頭列甯死的



時候，我着實地感着悲哀，就好像失掉了太陽的一樣。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是並沒有明確的認識的，想要檢討那種思想的內容是我當時所感受着的一種憧憬。

年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那時正在熱心着他所提倡的“國民文學”。那個概念是很模糊的，他自己也很模糊，但在仿吾和我已經是筋疲力盡的時候，便率性讓他編輯了幾期。那幾期，我現在可以明白地說，要算是“創造週報”的最消沈的時候。伯奇在二月底才回日本，我便起了一個決心請他把我的家小送回福岡去。我待把週報辦滿了一年之後再往日本，也好讓仿吾決心南下。

在那時我自己的確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我把妻子送走了之後，寫了那“歧路”三部曲，盡性地
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冑通通剝脫了。人到
決了死心，唯物地說時，人到不要了面孔，那的確



是一種可怕的力量。讀了我那三部曲的人聽說有好些人爲我流了眼淚。就是我們的達夫也受了感動，他把我們的舊誼又恢復了起來，他從北京寄來了他那篇“北國的微音”，那是他去上海以後在週報上所發表的唯一的作品。

我們一決定要分離了，泰東自不免起過一下恐慌，南公老板也費了好些脣舌來挽留我們。他說以後要爲我們定薪水，我是有家眷的人自然要多用些，定一百五十；仿吾是單身，只定一百。以前的積欠作爲股票，我一千，達夫六百，仿吾四百。這樣的話他不只說過一次，但從不曾見諸實行。像那一千，六百，四百的話待我去了日本之後，他在寫給我的一封長信上都明白地提起過的。——在這兒我算又替魯迅先生輩提供出了一項史料：便是郭沫若輩還是泰東書局的大股東呢！南公的那封信，我的老婆還很鄭重地替他保存着的，大約她是想



借她的帝國主義的背景來收回那筆陳賤的罷？所以假如有人見了我這項史料還要懷疑，以為我是在自由創作，我隨時都可以破點鈔，把那原信的照片提供出來的。

烽火台的諸侯畢竟只能戲弄得一次。更公平地說，我們之為泰東服務，其實又何嘗不是想利用泰東。像孤軍社的人想出雜誌，不怕他們都是商務的編輯，並且還有些是佔着重要位置的人，却不找商務而要找泰東，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多說幾句硬話。替商務辦雜誌的人，是連半句硬話都不敢說的，如有人肯高興去問問雁冰先生，他便知道得最明白，他為這件事情便是上過當來的人。我們在創造社的刊物上也算說了不少的硬話來，那些刊物假如是出在商務是怎麼也不能辦到的，所以這些地方也正應該感謝泰東。創造社的人要表現自我，要本着內在的衝動以從事創作；創作了，表現了，



不能不要發表的地方，所以在他們的那種迷夢正酣的時候，泰東書局無論怎樣苛刻他們，對於他們是有效用的：夢一醒來，暫時不想那樣去表現，不想那樣去創作了，失掉了效用的泰東便只留下苛刻。那是沒有什麼方法再可以來挽留他們的。

創造社的決計和泰東脫離，可以說是一種革命，是奴隸對於奴隸主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達夫要算是最先覺，我是足足後了他半年，仿吾又是爲着我而後到了半年以上。本打算辦滿週年才走的我，但在路向一決定了之後，終耐不過再作勾留，便率性提前了一個月，在四月初頭上便離開了上海。

我走了，暫時沒有發喪，週報還由仿吾一個人支持了一個月。但是停刊的消息是早報告了達夫的。達夫在我離開了上海之後，他在四月尾上由北京趕到了上海，趕着在週報的最終號中挾了一張



預告，是太平洋社和創造社的共同的預告。預告着兩社將合辦一種週刊，就是後來的“現代評論”，在最短期內將與讀者見面的話。這個預告當然是得到仿吾的同意的，事後我也得到達夫的一封信來向我提及。但我在福岡接着了最終號的週報並同時接着了那張預告的時候，我痛痛快快地把我從前的不值錢的眼淚清算了一場。在這兒我和達夫的感情自不能不取着對蹠的方向：在達夫方面或者會說，我們的密斯創造臨到彌留的時候，由他度了一口氣便復活了轉來，更嫁給了高門；而在我的方面，始終是覺得那位可憐的姑娘夭折了還受了一次屍姦。

作者附白

本書只寫完了創造社的前期，因此和“十年”的名目便稍稍有點不符，“發端”中所寄放在那兒的問題也還沒有結束，後期的事情是想在最短期中，把它記錄出來的。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一日 校後誌此。

• 272 •

上海圖書館

W. H. S. 50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2.9.20. 初版

1—6000册

分店

漢口 福州 開封 九江
南京 廈門 鄭州 成都
北平 廣州 南陽 汕頭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郭沫若

創造十年

實價九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7855B

